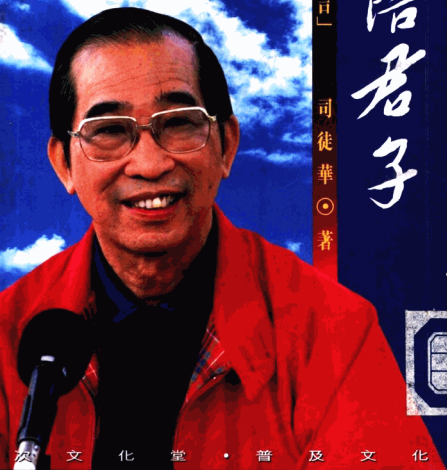


捨命陪君子

《三言堂》的「一言」

司徒華◎著



次文化堂 · 普及文化

- 這是在《明報》的專欄《三言堂》，所寫的文字的結集。
- 寫的期間，正橫跨回歸前後，可以說，這是這個歷史大轉折的一個側面的記錄。
- 我寫得很雜，希望藉此把一個較有立體感的我，展示在讀者面前。
- 人們大多都只從我的政治活動，得到對我的印象。倘能從這本小冊子頗「雜」而又統一的各個方面去看我，這才會較真確地了解和認識我。

—— 司徒華



SCB 331 \$70
ISBN 962•7420•07•29
Printed in Hong Kong



次文化堂

普及文化叢書 ①

捨命陪君子

作者／司徒華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②

捨命陪君子

作 者：司徒華

社 長：彭志銘

發行人：黃世兼

出版顧問：史亦書

發行經理：鄭偉龍

編 輯：穆 言

執行編輯：梁國基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網 址：www.sub-culture.com

電 話：27805625

印 刷：彩迅印務有限公司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1998 年 7 月初版

書 號：SCB331

I S B N：962-7420-07-29

定 價：HK\$70

©一九九八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
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前言

由九七年五月一日，至本年二月底，這整整十個月中，每三天一次，我在《明報》副刊《三言堂》這個專欄，所寫的文字，全部都收集在這本小冊子裏，共一百零一篇。此外，在約略相同的期間，發表在《明報》的《世紀》和《論壇》兩版的幾篇文章，也放在了裏面，作為附錄。可以說，這是我這十個月來，與《明報》及其讀者的交往的記錄。

我填補二缺一的空檔，成爲了《三言堂》的「一言」，那原委在所寫的第一篇開場白——《捨命陪君子》作了交代。因此，我以此作爲書名和代序。

在這個專欄，我寫得很難。除了因爲想到甚麼就寫甚麼外，還有希望藉此把一個較爲有立體感的我，展示在讀者面前之意。一般港人，大多都只從我的政治活動，得到對我的印像。其實，這只是我的一面，只是平面的。倘若

能從這頗「雜」而又統一的各個方面去看我，這才會較真確地認識和了解我。

出版社曾建議：把這一百零一篇的文字，分爲世情、政情、人物、讀書、教學等類，分類而編排。我以爲不必，因爲「雜」，不少篇文章不易將其一刀切歸屬於某一類裏。於是，就按見報的先後次序而編排，這也較顯現其「雜」的特色。

出版社又曾建議：抽起了某幾篇時間性較強的文字。我也以爲不必，並以爲時間性也就是歷史性，尤其是在這回歸前後之際。而且，有了缺少，就不是完整的記錄——甚至或會有人猜測，這些文字是因爲某些原因而抽起了。在每篇文章的最後，附記的年月日，就是見報的日期。上面說過，「時間性也就是歷史性」，未知這日期的附記，加強了文字的時間性，是否也給以其中一些些歷史性？

出版社這兩個建議，我都沒有接納，尙祈見諒！

《三言堂》這個專欄，目前我還在每三天一次地寫，但不知被容許，或自己願意寫到甚麼時候。假如被容許而又願意繼續寫下去，過了一段時間，我又或會把這些文字結集，另擬書名，而以「《三言堂》的「一言」之二」，作為副題去出版。

一些朋友，沒有或再沒有看《明報》，所以，沒有讀到我在《三言堂》的文字；也有一些朋友，因為每三天一次，常常漏讀了好一部份。我希望他們能讀到這本小冊子，提出意見！這也是我出版這本小冊子，順帶的一點小小的心意。

九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在「落車」快滿一年而又即將再「上車」之際

代序

捨命陪君子

爲民主黨往美加籌款，在第一站溫哥華，從阿濃口中，得悉《明報》副刊改版，刪掉了好幾個專欄，很招一些風雨。

返港後，在《蘋果日報》張無忌的專欄，讀到張健波兄在《傳媒春秋》以曾約我寫稿來否認轉軋。

的確，年來張健波、馮成章、劉進圖諸兄，多次約我寫稿，我都婉拒了。原因之一，是不想自己太辛勞；當然，還有其他的考慮。

我常常說：不承認人會老會死，是既不唯物，也不辯證的。但一些滿口唯物論、辯證法的人，總避諱這回事。年紀越來越大，精神和體力都無復當年，自己是最清楚的。不自覺，不正視，就是自欺欺人。我不想自己太辛勞，就是不去自欺欺人。

這次，除了張、馮、劉諸兄外，還加上馬家輝兄，又

來約我寫稿。馬兄，是我一九八九年在芝加哥認識的，可算是老朋友。稍後，胡菊人兄隔洋傳真，促我接上《三言堂》二缺一的空檔，甚至說到，以能與我同寫一專欄為榮。我一直很敬重胡兄，因而感到壓力。

我這次其他考慮之一是：《明報》是否想利用我作為盾牌，去抵擋轉軌的指責呢？

好些聞訊的朋友，都勸我上馬，認為佔得一地盤，去突破自律，是好的。

反覆思量了多日，我終於決定不辭更辛勞一點——捨命陪君子！胡兄和那些朋友，都是君子；當然，我更希望張、馮、劉、馬諸兄，也是君子。

這是我在《三言堂》的開場白。

一九九七年五月一日

司徒華，一九三一年於香港出生，原籍廣東開平，五一年於皇仁書院，五二年於葛量洪教育學院，畢業。五二年開始從事教育工作，九二年退休，凡整整四十年。七三年，抗議政府削減教師薪酬，領導罷課，創建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並任會長至九零年。八五年，八八年，當選為立法局教學界功能組別議員；九一年、九五年，當選為立法局直選議員；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任期未滿而被迫「落車」。九八年再度當選為特區首屆立法會直選議員。八五年，被委任為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八九年，因抗議六四鎮壓而被開除。八九年，籌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並任主席至今。九零年，籌組香港民主同盟，九四年籌組民主黨；前者至九四年，後者至今，均任中央常務委員及黨鞭。八九年，獲美國「中國民主教育基金」的「傑出民主人士獎」；九七年，獲捷克「人民需求基金」的人權獎。

目錄

前言

代序（捨命陪君子）

魯平與烈士 3

香港張春橋 5

羅曼·羅蘭遺作 7

董橋勸讀閒書 9

「睇吓邊個立法」 11

香港四人幫兩餘孽 13

楊度與王孝和 15

季羨林自傳 17

種種的失戀者 19

「觸目驚心！」 21

明晚維園見 23

關於《莫斯科日記》 25

古來聖賢皆寂寞 27

我所知道的林則徐 29

回歸熱 31

最美麗的名字 33

「波心蕩，冷月無聲」 35

答董橋談讀書與冷酷 37

小人的怨和不遜 39

七一這個大日子 41

我們還要不要「勇敢」？ 43

憶半世紀前的一位同學 45

我在回歸日 47

我感到驕傲 49

隨風入夜，潤物無聲 51

「形左實右」派 53

弱水三千，飲只一瓢 55

由避彈衣想開去 57

- 劉節叩跪陳寅恪 59
- 「小商人」的劉迺強 61
- 不當別人是人的人 63
- 再談梁富華 65
- 題外的兩件小事 67
- 「斬無明，起智慧」 69
- 我「大展露」了甚麼？ 71
- 「鞭」與「也」 73
- 另類的「及身而散」 75
- 「一槍竟何能？」 77
- 讀書與閑 79
- 「百勝」與「不死」 81
- 工業行動是「兵」 83
- 西南聯大名師風貌 85
- 「紅色童貞女」 87
- 彭亨利修士和彭湃 89
- 宴之敖者就是魯迅 91
- 被斥罵的兩次作文 93
- 〈李陵答蘇武書〉 95
- 李廣三代悲劇 97
- 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 99
- 職工會的兩大標誌 101
- 回應葉國華 103
- 聽到了朱鎔基這樣說 105
- 金聖嘆的「不亦快哉」 107
- 高爾基自殺 109
- 「有理、有利、有節」 111
- 勝利和休戰的原則 113
- 我愛讀的一類閒書 115
- 錢鍾書、楊絳的雋語 117

- 本非司令，何故掌兵？ 119
- 消極修辭看〈施政報告〉 121
- 「以致」和「以至」等等 123
- 督轅設宴與毛禁菸講 125
- 從阿Q精神到活命哲學 127
- 「戒之在得」的「得」 129
- 「校長，昇次機會我！」 131
- 吳宓的第三個二十八年 133
- 魯迅和傅雷的譯文比較 135
- 從「鼓掌通過」看董特首 137
- 微瀾中的「惻隱」之心 139
- 兩姊妹的故事 141
- 胡志明的老實 143
- 我怎樣教小學生作文 145
- 一篇九十五分的習作 147
- 聖誕老人送洗衣粉 149
- 笑中有淚的街頭一幕 151
- 我今年的聖誕卡 153
- 魯迅講性教育 155
- 一個難忘的聖誕節 157
- 「貧賤行樂」之一 159
- 關於張中行 161
- 張中行談周作人 163
- 〈岳飛〉和〈希臘〉 165
- 按本子辦事？ 167
- 「殺雞有卵取」 169
- 董特首是希特勒？ 171
- 三個頑劣的學生 173
- 我對他們的期望 175
- 三十二年後的聖誕 177

寫揮春，迎新歲 179

寫揮春瑣記 181

我的一篇文章習作 183

李樹厂老師 185

〈第三帝國的興亡〉 187

一篇畢業告別辭 189

蘇格拉底的生死觀 191

四字成語的趣劇 193

〈水滸傳〉的沒毛大蟲 195

喬石說的兩句話 197

退休的故事和制度 199

大事小事與緩辦急辦 201

附錄

北美籌款之行雜記 205

老國王的最後抉擇

——在「北美」籌款之行所說的故事 220

我所認識的彭定康 228

必須澄清的一面之詞

——答某女權組織和先驅社 237

對權力的無限戀棧？

——答劉健威先生 243

誰要誰讓路 248

中學畢業後的我 250

扣帽子與送帽子 252

〈國歌〉應該是莊嚴的

——香港電台「九十年代」之〈香港家書〉 254

誰想做武林盟主？

——劉廷強的「魯冠周戴」 256

我太抬舉了陳財喜

——兼答魯凡之 263

作者小檔案

捨命陪君子

魯平與烈士

奧爾布賴特、戈爾和克林頓，接見了民主黨主席李柱銘。港澳辦主任魯平，隨即對此發表評論說：「我們不會讓李柱銘當烈士。」

錢其琛的「米已成炊」和江澤民的「言不及義」，雖然都有語病，但只昧於詞語含義有褒貶之分而已。魯平的錯誤卻頗為嚴重，可以說是政治上的錯誤，亦即目下時興的所謂「政治不正確」。

美國政要的接見，到底與烈士有甚麼關係呢？

為甚麼扯到烈士上去呢？

莫非這是一項可判死刑的滔天大罪？

烈士是甚麼？是為正義事業而犧牲的人，大抵無人敢把江青和張春橋封為烈士的罷？魯平

的話，從邏輯上來說，是肯定了李柱銘所從事的是正義的事業。

烈士的對立面是甚麼？是反對正義事業的人，不單是反對，而且用殘酷的手段去迫害。魯平很顯明地把他的「我們」，放在烈士的對立面之上。

「不會讓」，不是不可能，不是沒有道理，不是沒有這樣的權勢；那語調只不過是「不屑」，暫時還可容忍，「費事益咗你」名留青史而已。

我在街頭為民主黨籌募經費，推銷獎券。一位衣著普通的女街坊走上前來，捐了一百元，在我耳邊悄悄地說：「叫李柱銘小心！魯平提到了烈士這兩個字呀！」魯平的話，對一般人確實有恫嚇力。

「米已成炊」、「言不及義」、「烈士」等等，一方面反映了中國高官的語文修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們的潛意識。

一九九七年五月四日

香港張春橋

《公民自由和社會秩序》的諮詢期，已經結束了。我最感興趣的，是曾鈺成再三向新聞界強調：「支聯會應列為政治團體」，大有心有不甘、憤憤不平之概。他為甚麼這樣「厚愛」支聯會呢？

我的回應是：

支聯會豈止是政治團體，它不是早已被定性為顛覆組織了嗎？

不過，我還要提醒他：他曾作為領導人的教聯會，便是支聯會的第一批成員團體；他的親密戰友程介南，曾經是支聯會的第一屆常委。

天安門廣場被坦克車機關槍洗禮過後，他們來了一封文情並茂的退會信。這一封信，還保留着，在適當的時候或會公諸於世。

我還要提醒他：九零年六月四日的清晨，他和我同被邀請到北角的寶血女子中學演講。他稍遲到了，解釋說，因為校裏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他作為校長，認為在這「六四」的一周年紀念日，培僑中學不應該升旗，因為這一天是「國殤日」。但作為校監的吳康民，卻說，他行使校監的行政權力，一定要升旗。校監是校長的上司，結果旗終於升了。

提及吳康民，我記得在「六四」當天的螢光幕上，他老淚縱橫地說：解放前，他在廣州從事地下學生運動，那時候，國民黨對進步學生的鎮壓，也沒有這一次這麼殘酷！

香港江青，已家知戶曉。坊間有好事者，為其湊足四人幫。張春橋個子矮矮瘦瘦，臉色陰沉，是四人幫中的軍師。此刻，香港張春橋大可呼之欲出；讀者去猜猜，雖不中亦不遠矣。其餘兩人，有機會再談。

一九九七年五月七日

羅曼·羅蘭遺作

從九七年三月份（讀書）得悉，羅曼·羅蘭的遺作《莫斯科日記》中譯本，原來兩年多前早已在國內出版了（瀟江出版社）。

甚麼時候，香港才可以買到此書呢？

一九三五年，他訪問蘇聯，寫下了六月十七日到七月廿八日一個多月的日記。但他同時決定：由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算起，不論是全部或其中片斷，五十年內不得發表。

他以敏銳的觀察力和知識分子的良知，寫下了所見所聞的陰暗面，並表達了深重的憂慮。他的觀察力和良知，成爲了偉大的歷史預見。但是，他爲甚麼要禁止這部日記在五十年之內發表呢？

這使我感到，他的偉大還不是很偉大。

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另一位法國著名作家紀德，訪蘇後寫了同樣的遊記，卻即時發表，

雖然被圍攻直至死去，但絕不畏縮後悔。

羅曼·羅蘭，是不是害怕秋後算賬呢？他大抵不會至於如此罷？那麼，是甚麼緣故呢？我很想了一想，想出了一個不太恰切的比喻。

一個失戀者，自殺了。雖然深知拋棄自己的異性，是一個薄倖無情、淫亂無恥的負心人，不值再去愛，但爲甚麼還要付出最寶貴的生命呢？這是不是太愚蠢了呢？

其實，他要爲之而犧牲的，並不是那一個異性，而是曾經爲之神祭夢繞的一個憧憬，而是曾經爲此憧憬而奉獻出的竭盡的感情。那憧憬和感情，都幻滅了，自己一無所有，因而失去了生存的意志。

羅曼·羅蘭沒有自殺，但不久便逝世。他的憧憬和感情，有沒有幻滅呢？大抵他是很憐憫，很多很多人的憧憬和感情的幻滅的。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日

董橋勸讀閒書

董橋在《明報》英文版的專欄《英華沉浮錄》，勸他的同姓兄弟——董特首，該讀幾本閒書了。董特首已有一七·十一」的綽號，每天辛勞十六小時，難道董橋還想他變為「六·十二」，再加兩個鐘頭去讀閒書嗎？這莫非想要了他的命！

董橋是從彭定康的《給香港的信》談起的。他引述彭信，說在一個雨天的周末，不能出外運動，就留在家裏，讀了一本叫做《歷史的終結》的書。他接着說彭：「冷酷果斷，信心十足，能言善辯，而且博覽羣書，文史修養深厚，順口引經據典，永遠不在人家面前流露絲毫猶豫神情，明明是空泛的內容都會包裝成燦爛的言詞。這是讀書讀出來的。」

我的英文程度，退步到不及中五學生，所以對他這樣的評價，難置可否。但是，我卻不明白，「冷酷果斷」、「猶豫神情」，為甚麼與讀不讀書有關？知識分子是讀書的，但不是曾被

判定有先天的動搖性嗎？

董橋的話，向來都是說得很委婉的。他一方面稱許彭定康「博覽羣書，文史修養深厚」，另一方面卻又勸董特首，該讀幾本閒書了。這豈不是拿出彭來，把董比下去嗎？這豈不是有一點為「千古罪人」張目的味道嗎？不論話說得多麼委婉，明眼人還是輕易地看出來的。

我也讀一點閒書的，但只限中文。我的經驗是，讀閒書要有閒心。這閒心不等同空暇，不必在「春雨綿綿的時節」才有。即使很忙，也可以培養出閒心來的。只要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以心為形役，樂天知命，在怎樣忙碌緊張的生活中，總可以有些時間讓心閒下來。

其實這閒心就是心境的寧靜，「寧靜致遠」的寧靜。「寧靜致遠」的上一句，是「淡泊明志」。

董橋勸董特首，讀幾本閒書，我卻希望董特首，能讓心閒下來。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三日

「睇吓邊個立法」

在美加籌款途中，香港這邊每天都把剪報傳真給我們，使我們雖遠隔重洋，仍能感受到香港的脈搏。傳真一到，馬丁、阿富和我，都如饑如渴地，分派每人一頁來傳閱。

一天，收到了唐英年因成衣出口，在英美兩地惹上官司的剪報。這消息，美加的報章也有報道，所以，本港人士對此事的反應，才是我們關注的。當我們讀到了，身兼立法局和臨時立法會議員的陳鑑林說：

「合唔合法，睇吓邊個立法！」

三人都一齊拍案叫絕，捧腹大笑。

這兩句話，不但琅琅上口，通俗簡明、一針見血、神氣十足，而且還可以說是大有來頭的，絕不能置之以拍案、捧腹。

我不知道，陳鑑林是否讀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這是一本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假如

他沒有讀過，那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了。

《國家與革命》的最重要論點是：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由這個國家機器所掌握的軍隊、警察、監獄、立法、司法等等，也就是壓迫的工具。這樣，立法和司法，當然是有階級性的了，是為一個階級去壓迫另一個階級而服務的。

「合唔合法，睇吓邊個立法」的潛台詞是：使唐英年惹上官司的，是帝國主義立的法律，是帝國主義用來壓迫我們的法律，違反這樣的法律，對反對帝國主義的人來說，並不是不合法的。唐英年沒有這樣說，因為他並不反對帝國主義；陳鑑林這樣說了，大抵是自以為是反對帝國主義的罷？

我們的立法權，掌握在滿腦子這種思想邏輯的人的手上，你會覺得可怕嗎？

這兩句話是荒謬的。但當新的公安、社團條例和顛覆法等出籠後，由公民抗命的人去說，倒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

香港四人幫兩餘孽

胡雪姬在《蘋果日報》副刊的專欄，發表了《尋Y：王洪文、姚文元》。這是衝着我寫過的《香港張春橋》而來的。

我也說過：「其餘兩人，有機會再談」。美加的餐廳，有所謂「港式奶茶」，想不到「港式四人幫」也這樣廣泛引起興趣。我心目中已有人選，不妨就來談談。

「心目中已有人選」，其實，並不是我選出來的，只是聽來的。不過，聽了後，以為不太「離譜」，也就首肯了。

按職位來說，似乎是王洪文最高，但以能耐和可厭性來說，他應該把第三把交椅讓給姚文元而叨陪末座。所以，先談「香港姚文元」。

「香港姚文元」是誰？

相由心生，先去看相貌。姚文元的前額光禿禿的，只剩下兩鬢和後腦，有點看不清楚是

黑、是灰、還是白的、稀稀疏疏的頭髮。你總在電視或報章的照片上，看過王小二的尊範的罷？試閉目想想，或把兩人的照片對比一下，是不是大抵有七分相似呢？

姚文元有「金棍子」的綽號，以「打棍子」出名，棍子橫掃之處，盡人皆臭。其實這「金」不是真金，只似金的黃色，由於觸者皆臭，應該是「攪屎棍」，屎也是略帶黃色的。王小二雖然沒有姚文元大寫批判文章的能耐，但其臭是可媲美的。請看看，他說過哪一句話，不是其臭無比的呢？你能在香港，找到別一個比他更臭的人嗎？

「香港王洪文」是誰？

也從相貌談起。王洪文是四人幫中，長相最帥的，只看樣子，堂堂正正，一表人材。港人中誰有這樣帥的長相呢？某君不是有「美男子」之稱嗎？只是年紀稍大，多幾根白髮而已。王洪文滿肚草，隨着軍師張春橋兜兜轉。君不見，「香港王洪文」和「香港張春橋」也在拍硬檔！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九日

楊度與王孝和

月來，傳媒紛紛猜測，在未來特區的權貴中，這一位或那一位是否共產黨員。涉嫌者被問及，都一概否認。在猜測和否認聲中，我的腦海出現了兩個名字——楊度和王孝和。

楊度，何許人也？

他是支持、鼓吹、推動袁世凱復辟稱帝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袁事敗身亡，他被通緝，晚年隱居上海，篤信佛教，曾暗中熱心營救被捕的共產黨員。

周恩來病危時，曾託人轉告黨中央：應該還楊度一個歷史清白。一九二九年，在周的直接指示下，楊被吸收成爲了共產黨員。

入黨的起碼條件，是承認黨綱黨章。膜拜釋迦牟尼或馬克思，到底是有差異的罷？吸收這樣的人入黨，是否有違原則呢？值得尋味的是，楊已無私地幫助共產黨，爲甚麼還要他成爲共產黨員呢？入了黨，就須遵守黨的紀，不再是客卿身分：「過河卒子」，只有「拚命向

前」。其中，有着功利的成分，這是另類的「突擊入黨」。

王孝和，何許人也？

他是上海解放前的地下黨員和工會負責人。解放前夕，他被國民黨逮捕，控以共產黨員罪名，並判處死刑。行刑前，他沒有高唱《國際歌》，或高呼「共產黨萬歲」，只是大喊「冤枉」。

解放初期，國內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書名《不死的王孝和》，簡述他的生平，證實了他的確是一個地下共產黨員，被追封為烈士。

他在被處決前不說實話，是很容易理解的，爲了保護自己的同志、組織和工會。

不要把共產黨員看得太神秘，或完全不神秘。據說，新記的司機和廚師，也是共產黨員。

此時此地，假如有誰今天公開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那麼，明天他便不是了。因爲違反了黨紀，立即被開除。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季羨林自傳

我國著名學者季羨林，最近出版了自傳。裏面有一段話，很值得抄錄下來，以供一讀。

「現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終點了。我常常回憶八十年來的歷程，感慨萬端。我曾問過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真有那麼一個造物主，要加恩於我，讓我下一輩子還轉生爲人，我是不是還走今生的這一條路？經過了一些思慮，我的回答是：還要走這一條路；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讓我的臉皮厚一點，讓我的心黑一點，讓我考慮自己的利益多一點，讓我自知之明少一點。」

這當然是反話。要是真的，想來生「臉皮厚一點」、「心黑一點」、「考慮自己的利益多一點」、「自知之明少一點」，在此刻的今生，就不會把這樣的反話說出來。這反話，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血淚史的縮影。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爲甚麼有那麼多的血淚？季羨林的話只指出：是由於臉皮不夠厚，心不夠黑，少考慮自己的利益，太有自知之明。

其實，知識分子之所以為知識分子，並非僅僅擁有「知識」，而還應該是，認「識」自己應有的良「知」。

不管一個人擁有多少知識，如果臉皮厚、黑心、自私、無自知之明，那就是沒有良知，還算甚麼知識分子呢？

季羨林所以感慨萬端，恐怕除了自己曾吃過多多少少的苦外，還由於看過太多使自己吃苦的人都是臉皮厚、黑心、自私和無自知之明的罷？

香港的知識分子，有這樣的感慨的，大抵不多。這並不是說，他們都是平安、愉快、幸福、沒有血淚的。只是血淚沒有那麼淋漓，災難沒有那麼深重；在這個社會裏，臉皮厚、黑心、自私、無自知之明的人，沒有那麼當道得逞而已。

歷史的大轉折來了。香港的知識分子：請自愛、自重、自勉；還要警惕，警惕自己，警惕或會當道得逞的魔鬼。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種種的失戀者

在《羅曼·羅蘭遺作》中，我以自殺的失戀者，作了一個不太恰切的比喻。

我說：「一個失戀者，自殺了。……其實，他要為之而犧牲的，並不是那一個異性，而是曾經為之神榮夢繞的一個憧憬，而是為此而奉獻出的竭盡的感情。那憧憬和感情，都幻滅了，自己一無所有，因而失去了生存的意志。」

該短文，意猶未盡，我必須多說幾句話，還有種種的失戀者。

除了在文革中，肉體和精神都自殺了的，這樣的失戀者，現在可說已經絕無。尤其是此時此地或在海外，不少只在精神上自殺了。他們的肉體健康康康的，生活舒舒服服的，退出江湖，不問世事，避談往事，只拚命賺錢和養兒活女，滿足於從前所鄙屑的生活。這樣也是不錯的，起碼沒有做壞事。

另一種是癡情的，這「癡」就是「傻」。對那出賣了自己的憧憬和感情的異性，仍然死心

不息，苦苦依戀，眼看着已越走越遠，越來越荒謬，也在期待他（她）有回心轉意的一日，雖然明知這是天真幼稚的幻想。這樣是錯了，但還不是大錯，因為還有一點點真實的「傻」的感情。

另一種是無恥的，淪為皮條客，去為他（她）扯皮條，希望藉此得到恩賜的一個微笑或回眸。當然，偶然上一次床，那便是更大的恩賜。雖然，自己已有配偶，仍是這樣不斷去「偷情」，保留着這「姦情」。

另一種是可敬的，繼續去追求新的憧憬，奉獻出永不枯竭的感情。他（她）不因爲過去痛苦的經驗，從此懷疑世間有真正的愛情存在，仍去歌頌梁山伯和祝英台、羅密歐和朱麗葉……。

此外，還有其他類型的失戀者罷？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觸目驚心！」

董特首參觀某校，小學生大書特書「聽董爺爺的話，做特區的好娃娃」，以示歡迎。小孩子們是想不出這樣的話來的，教師們恐怕也無權作出這樣的指引，大抵這是校監或校長的主意。董橋對此事，評之以四字：「觸目驚心！」他行文用語，向來溫文敦厚，這四個字已經是份量很重的了，特別是加上一個「感歎號」。

爲甚麼「觸目驚心」呢？

略知「文革」之事的人，會嗅到這兩句話散發着令人作嘔的臭味。它脫胎自林彪的《毛主席語錄》的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隨着「文革」展開，小紅書風靡全國，於是，「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學生」……等，就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漫天蓋地了。

林彪久已「折戟沉沙」，「文革」亦久已被「徹底否定」。想不到那餘孽遺毒，此時此地

竟還在某些人的腦子裏鑽出來，在學校裏肆無忌憚地作出這樣的主意。

叫小孩子們這樣地大書特書的人，知道「董爺爺」說過甚麼話嗎？其實，說過的並不多。是不是現在還沒有說，將來或會說，不管是甚麼話，此刻就要宣誓似的，「下定決心」去聽呢？

我不知道，該校的學生家長（父母），對此事有何反應？稱董特首做「爺爺」，豈不是要這些父母們，去叫董特首做「爸爸」嗎？只是「聽董爺爺的話」，還要聽父母和老師的話嗎？怎樣才算是「特區的好娃娃」呢？是不是要小孩子們，也像三級議員一樣，宣誓一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和一擁護《基本法》」呢？很可惜，我不認識該校的學生家長，至今也未接觸過。

我更不知道，董特首看見小孩子們被指令這樣地大書特書，有何反應？假如他是沾沾自喜的話，那就不止是「觸目驚心」，而是「驚心動魄」的了。我極希望，他有所自白。

一九九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明晚維園見

明晚八時，支聯會一如既往，在維園舉行六四哀悼燭光集會。

我希望在這集會上看見你們，看見更多的你們，看見你們點燃起的一點點的燭光，更多的點燃起的一點點的燭光。

明晚維園見！

活動雖然是晚上舉行，但支聯會一向都只稱之為「集會」，而不是「晚會」。大抵是覺得，「晚會」兩字不夠莊嚴，不大切合與會者的心情。還是哀痛的，但那哀痛是已冷靜下來的哀痛，升華為莊嚴的良知、莊嚴的認同、莊嚴的銘記、莊嚴的追求。

在燭光海洋中的每一點燭光，都在再重溫、再升華自己的哀痛，使之成為更莊嚴的良知、認同、銘記和追求。一年一年的再重溫、再升華，人就不會失憶。

我沒有甚麼醫學常識，但也推測得，失憶症雖然沒有甚麼肉體的痛苦，但那是比肉體痛苦更大的痛苦。忘記了自己是誰，忘記了誰是父母，誰是兄弟姊妹，誰是朋友，誰是仇讎，過去的一切喜怒哀樂……。過去的生命全是空白。曾活過來的都消失了，這樣再活下去又有甚麼意思？

留待歷史去評價，其實，就是企圖以時光的流逝，去洗掉人們的記憶，要在人們的記憶中去埋葬這一段歷史。那些罪魁禍首，要整個中華民族都患上失憶症，實在太妄想了。

人人都患上失憶症，這還算得是一個民族嗎？這民族將會因為失憶，而在地球上蒸發。

台灣「二二八」事件，經過五十年，平反了；南韓光州事件，經過十七年，平反了。因為人民一直沒有失憶。五十年、十七年，不是比八年長得多嗎？

還沒有失憶的朋友們：

明晚維園見！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日

關於《莫斯科日記》

《羅曼·羅蘭遺作》在報章刊出後，不久，報社轉來了一位讀者贈送的《莫斯科日記》影印本。內附一短柬如下：「華叔：你在專欄提到的《莫斯科日記》，我有一本，惜未便相贈，唯有影印予您一讀。保重！並祝健康、快樂！敬重並默默支持您的無名氏。」

全書近二百頁，單是影印，就費了不少工夫。我翻了一翻，指尖分明地感覺到，這位無名氏的盛情和心血的溫熱。謹在此衷心致謝！

這不是「瀋江出版社」，而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一萬本，九六年四月第二次印刷，也是一萬本。看來，這書在國內已有兩種譯本，單以到手的來說，出版後不到五個月，便加印一萬本。這樣較嚴肅的書籍，竟有這樣的市場，使人感到微茫的希望。

我首先發現了自己的一個錯誤。羅曼·羅蘭並沒有「不久便逝世」。他是經歷了歐戰，直

到巴黎光復後，在四四年十二月三十日逝世的。我為甚麼會有這樣的錯誤呢？年輕時看書留下
的印象，三六年三位著名作家逝世，他們是魯迅、高爾基和羅曼·羅蘭。前二者是的確的，最
後者卻誤記，到底是誰，現在已記不起，亦無暇去翻查了。

三六年，羅曼·羅蘭訪蘇的次年，斯大林發動大清洗，與羅有深厚感情的布哈林，也在被
整肅之列。羅曾多次致函給斯為布求情，都毫無回音。羅雖然反對清洗整肅，但始終沒有公開
表態。

羅的再婚太太是蘇聯人，二九年經高爾基介紹到法擔任他的秘書，三四年兩人結婚。羅的
一些文壇老友，因羅對清洗整肅沒有公開表態，就指他的太太是蘇聯的間諜，他受到她的影響
利用。羅因此與這些老友絕交。

因年老不便離開，羅的晚年在德治下度過，但終於看見了納粹敗亡。我想，他的晚年是痛
苦的。假如他看見了今天的「蘇東波」，將會怎樣呢？

一九九七年六月六日

古來聖賢皆寂寞

我頗喜愛，李白《將進酒》中的這一句。其下句是，「唯有飲者留其名」，我卻大不認同。

假如只是「飲」，別無長處，恐怕倘能留名，也不過「醉貓」而已。「飲」與別的長處，相得益彰，「飲者」之名才同時留下來的罷？

李白以上下句對比，甚有以下句低貶上句之意。這樣，在這裏的「寂寞」也是略含貶意的，這是李白模式的「寂寞」。

我頗喜愛這一句，因為心中有另類的「寂寞」，同時也有另類的「聖賢」，也許與一般人理解的「寂寞」和「聖賢」有所不同。

我的「寂寞」，不是無聊、單調、孤獨、空虛、無聲無色無臭。我的「聖賢」，要求不

高，只是時有長進，不斷能多做點於人於己有益的事。

不少人苦於「寂寞」，不甘「寂寞」，往往要抓破臉皮而出，衝破「寂寞」，摒棄「寂寞」。大抵他們認為，人生總要是熱熱鬧鬧、轟轟烈烈、風光威武、彩色繽紛、充滿掌聲和歡呼的。由於不能這樣，便苦於「寂寞」，不甘「寂寞」，走到殊不「寂寞」的舞台上去。

我的「寂寞」很簡單，只是在生活中，能不時有獨自一個人靜下來、閒下來的不太狹隘的時空；不受干擾，讀讀閒書，胡思亂想，尋尋舊夢，望望前路還可以走多少步。這樣的一「寂寞」，不但有助長進，還有益身心。充實的生活，決不是填得擠擠迫迫的，能有這另類的「寂寞」，才算得真正的充實罷？

這另類的「寂寞」，是自省的餘地，是反思的土壤，是時有長進的動力的泉源。

我是難得「寂寞」的。快要下車了，是否由此可得到多一點這另類的「寂寞」呢？所以，我坦然，甚至欣然。

一九九七年六月九日

我所知道的林則徐

回歸，不能不談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不能不談林則徐。但在這回歸熱中，似乎很少人提及他。我所知道的極有限，全來自閒書或耳食之言。即使「炒埋唔夠一碟」，也願意寫出來，作為零食以饜讀者。

朋友們叫我寫字，我很喜歡寫林則徐的三句語錄。

一、「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出自他的〈赴戍登程口占家人〉，被充軍前往新疆，他還是那麼忠心耿耿。

二、「海到無邊天作岸，山登絕頂我爲峰」。字面寫景，實寫襟懷，氣魄很大。這是從劉再復的文章中讀來，是冰心老人引用來鼓勵劉的。

三、「有容乃大，無欲則剛」。三十多年前，陪先師何漆園去清涼法苑吃齋，在一小客廳的壁上，看見林所寫對聯的拓本：「海匯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不知真

偽，也不知是否林所撰，印像卻很深，至今仍歷歷在目。

龔自珍《己亥雜詩》第八十七首，是贈林的：「故人橫海拜將軍，側立南天未戴勳。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羅寄惜雄文。」龔與林為好友，當時林已南下禁烟，龔想當參謀提意見，可惜那時未有圖文傳真或電子郵件。

據云：林自知有性情躁急、易發脾氣的毛病，因而書寫了「制怒」兩大字，貼在案前，以為座右銘。意思是，以抑制怒氣為警惕。

我由此想到，他的頗為出格的名字。這是否出自《孫子兵法》的「疾如風，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呢？「則」就是作為準則，他姓林，姓名連起來，就有「徐如林」的意思。

五、六十年代，香港教育司署高官鄭何艾齡女士，是何東的女兒。據聞其夫家與林後人有親戚關係；抗日戰爭期間，她在港曾協助宋慶齡從事救亡工作。

以上零零碎碎，如有錯謬，尚祈讀者指正。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二日

回歸熱

「回歸熱」這個新名詞，指當前慶祝回歸活動的熱潮。我由此而首先聯想到的，這三個字是一種疾病。

我多次讀過魯迅記念近代著名作家和學者劉半農的文章，由此知道有這一種病，劉是患此病逝世的。三三年，劉往西北考察，途中染上回歸熱，趕返北京協和醫院救治無效，享年只四十三歲，真的英年早逝。

翻一翻《辭海》，有這樣的註釋：「回歸熱，螺旋體引起的急性傳染病。主要症狀有周期性發熱、周身痠痛、肝脾腫大等，嚴重的可出現黃疸。初次發熱和間歇期各約七天，以後發熱期稍減短，退熱期稍延長，二者共兩周，常交替多次（以二至三次為多），故稱回歸熱。」

活動熱潮，與疾病之名相同，此乃巧合。但我的思路，卻禁不住由劉半農回到當前的景像。

歷史上早就曾有回歸的機緣。第一次是抗日戰爭和二次大戰後，所有租界都收回了，甚至割讓給法國的廣州灣，也收回改名為湛江市。為甚麼只單獨留下港澳呢？第二次是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又被擱置以供「充分利用」。六六年，發生了澳門風暴，葡國索性要歸還，卻被拒絕。

我懷疑過，那不被承認的不平等條約，假如沒有寫上「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期限，回歸熱是否就在此刻出現？民族大義，也要看時機而強調的罷？

十多年前，我為現已停刊多年的《明報晚報》寫過一篇文章，說：百多年來，因民族恥辱，香港同胞得以遠離民族苦難，可說是僥倖；我卻因此而慚愧。回歸後，前景雖未明朗，但由此能與全國同胞同甘共苦，我是欣然去迎接的。當時，該文頗受一些專欄作家的非議。

當前的回歸熱，很有「假、空、大」的味道，「忽然愛國者」空羣而出，這是否也是一種症狀呢？這種症狀，我希望不致於是周期性的。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五日

最美麗的名字

上月，承燕京書院邀請，到校作公民教育演講。講題《怎樣做一個中國的香港人》，是校方指定的。

一開始，我首先憶述了四十多年前讀過的一篇文章——高爾基散文集《俄羅斯浪遊散記》的第一篇：《人》。

作者自述在草原上流浪，碰上一個臨盆的產婦，他當了臨時的助產士。嬰孩順利誕生了，他把嬰孩高舉向着晴空，沐浴着陽光，歡呼：「一個新的人來到了這世界了！」產婦向他致謝，問他叫甚麼名字？他回答說：「我的名字叫做『人』，『人』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名字！」

接着，我說：在《怎樣做一個中國的香港人》這個講題中的十一個字，最重要的，是那一個「人」字。再接着，我分三個層次去闡述對講題的意見：（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做一個真正的人；（二）其次，是做一個中國人；（三）最後，才是做一個中國的香港人。

怎樣才算是一個真真正正的人呢？

一、要有人道的感情。人溺己溺，人飢己飢。對別人的遭遇，尤其是苦難，能夠易身處境，感同身受。

二、要有人權思想。只求溫飽，僅是獸權，而不是人權。作為人，應云等看待同類；每一個個體都有其尊嚴和溫飽以外的其他權利。為爭取、維護、尊重自己和所有的人的人權而努力。

三、要有利人的行為。並非要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只須勤勤懇懇，自食其力，隨時隨地隨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於己無關卻有利他人的事，不分大事小事。

不管屬何國籍，處於何地，如能做一個這樣的真真正正的人，便可無愧。否則，連無愧於一個真真正正的人也做不到，那就邊論做一個中國的香港人了。去做的，只不過是中國的香港豬、狗、鸚鵡而已。

當然，我還向同學們闡述了第二、第三個層次。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八日

「波心蕩，冷月無聲」

鄧小平逝世，江澤民表示哀悼，念了杜牧的〈寄揚州韓綽判官〉：「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此時此刻，爆出這一首詩來，叫人感到高深莫測、莫名其妙，或不倫不類、啼笑皆非。

由這「二十四橋」，我想起了姜白石的：「波心蕩，冷月無聲」。他的〈揚州慢〉，全首如下：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住初程。過春風十里，盡作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

紹興十三年，金人完顏亮南侵，繁榮的揚州變得滿目瘡痍。姜於戰後十六年，來到此地，

仍是一片蕭條，因而寫下這首自度曲以傷之。詞人以杜牧所曾吟詠過的「二十四橋仍在」，但月亮似已失去往昔光彩，倒影在隨波蕩漾，感慨萬千。傷今懷古之情，蒼涼激越，感人肺腑，發人深思。

鄧小平逝世，江澤民雖不至於感慨萬千、傷今懷古，但於此時此刻，總會瞻前顧後想目下的罷？他爲甚麼竟會聯想到，「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的杜牧的「玉人何處教吹簫」呢？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內心世界呢？

我由姜白石的「波心蕩，冷月無聲」，聯想到的是：「波」，是「蘇東波」的「波」；「心」，是「人心背向」的「心」；「蕩」，是浩浩「蕩蕩」的不可阻擋的歷史洪流；「冷月無聲」的「無聲」，是「於無聲處聽鶯雷」的「無聲」。

這首詞，我在讀中學時讀過；現在重溫一遍，有這樣的聯想，端的異數。我妄想：假如江澤民念的，是這一首《揚州慢》，那便不是「形勢小好」，而是「形勢大好」了。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答董橋談讀書與冷酷

董橋稱我為前輩，實在太不敢當。年紀，彼此大抵差距不大；讀書，不論校內外，我都遠不及；學養，我一無所有，僅僅一點點辦實事的經驗。對他，我卻直呼其名，似乎大有倚老而賣老之概——對此，須作解釋。

由於篇幅有限，我暗自立下規矩，除了極少數人物，例如孫中山，一概不先生前、先生後，以免有時會擠掉要說的幾句話。現特借此公告各方君子，尙幸見諒、海涵。

我對「冷酷果斷、猶豫神情為甚麼與讀書相關」存疑。

董橋答曰：「我真的相信讀書讀精了會看穿世情，待人冷酷，處事果斷；我也真的相信讀書讀精了會目空一切，自信自大，站出來絕不拖泥帶水，軟弱猶豫。」

我未能釋然，在腦海撈了一撈，一時撈得幾個自己所知而一般人也聞其名的、也可算是讀書讀精了的人物來：錢鍾書、陳寅恪、魯迅、毛澤東、郭沫若、胡適、周作人……。這些人

中，除了毛澤東外，沒有誰算得上是冷酷的；即使郭沫若，也只是涼薄，而非冷酷。雖然，也許會有人認為魯迅冷酷，其實，他更有熾熱的另一面。

所有這幾個人，我都只從其文字和行事去認識他們，覺得周作人是「拖泥帶水，軟弱猶豫」的。至於「目空一切」、「自大」，除了上述冷酷或涼薄的兩人，對餘者都不大有這樣的觀感，尤其是錢鍾書和陳寅恪。

看來，讀書即使是讀精了，也可以讀出各種各樣的人來的。秦檜是狀元，文天祥也是狀元，各站兩極端。要看讀些甚麼書，怎麼去讀書，為甚麼讀書，「各取所需」所取的是甚麼；更要看其安身立命和際遇閱歷。讀書讀精，並非決定性。

董橋還覺得我，「也相當冷酷果斷，面部少有猶疑的表情」。如魚飲水，「冷壓」和「表情」，恐怕只因賣相欠佳；有時顯得「果斷」，是由於對某些事，早有預見，已多時反覆各方考慮過。真希望彼此交上朋友，多點了解。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小人的怨和不遜

一個頗妙的謎語：「鬚鬚（射《論語》一句）」。謎底是：「唯女人與小人難養。」孔子接着說出，「難養」之處：「遠之則怨，近之則不遜。」

這句話，不但是政治不正確，而且觸犯了禁止性別和年齡（按謎語之義）歧視的法律。孔子沒有這樣的顧忌，所以坦率地說了出來。他深於世故，洞悉世態，這句話自有其豐富的處世經驗。撇開女人，恐怕在二千多年後的今天，仍有其一定的參考價值。

最近，傳媒大談董特首身邊的小人（本義而非謎語之義），董與陳方安生也不避而作出反應。到底有沒有小人，誰是小人，怎樣去找出小人來呢？我覺得其中的一個方法是，可循孔夫子的話，逆流而上去找，看看有沒有、誰是「遠之則怨，近之則不遜」的人，雖不中，亦不遠矣。

不過，那「怨」和「不遜」的對象，並不是現在他們正要拚命去爭寵獻媚的「養」者，因

爲還未被「養」定，哪裏敢就去「怨」和「不遜」呢？要看的是，他們過去怎樣被「養」過，現在怎樣去對待自己過去的一「養」者。

且說香港江青。在受光幕上，看見她臉色鐵青、嘴掛冷笑、咬牙切齒、怨恨逼人。那「怨」已深化爲深惡痛絕了。爲何竟至於此呢？想當年，自以爲妙計，想棄「立」保「行」，結果兩「局」皆空，不僅被「遠」，且被「賣甩」了。這大抵是由怨而恨的裏因罷？

至於「近之則不遜」，那「近」和「不遜」是接近權力中心的亢奮，並由此而來的傲慢、囂張、狂妄，以至「子係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猖狂，對象是異己。

一位民主黨的區議員告訴我，在一次區議會討論下次會議日期時，另一位「亢奮」的區議員對他說：你無資格討論這事，因爲下次會議你不知是否還有份參加！下次會議在七月一日之後，而那時尚未公布現任兩級議員可直通。

這不止是「不遜」，而是膨脹到極度的「猖狂」了。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七一這個大日子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的大日子，同時，也是中共建黨的七十六周年紀念。

中共於二一年建黨。不少民族精英，在其旗幟下，爲其標榜的理想而艱苦奮鬥，前仆後繼，百折不回，壯烈犧牲，可歌可泣！四九年建國後，政治運動頻仍，更多的民族精英，受盡折磨，屈辱而死——無窮的血淚，是引來其後開放改革的一個因素。逝者已矣，尙在者能不耿耿？那些逝者，也許當年並未想及回歸；但我以爲，今天的回歸，是有他們的貢獻的。我謹向他們致以莊嚴的民族敬禮！

四九年除夕，這是建國後的第一個除夕。深夜，與幾位朋友，路過彌敦道彌敦酒店門前，看見幾個喝醉了的洋水兵，調戲婦女。大家都義憤填膺，磨拳擦掌，要上前打不平。結果，理性戰勝感情，互說一句：收回香港才算賬！

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我獲邀前往北京參加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儀式觀禮。那天早上九時，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歡迎戴卓爾夫人，獲邀觀禮者也在場。零下十度下，冉冉升起的太陽，撒下滿空滿地的金光，〈義勇軍進行曲〉的〈國歌〉奏起了。在這樂聲中，我的熱淚，由始至終，都流個不停。這是我此生中，幾個永不會忘卻的場景之一。

八五年七月一日，草委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在下午開幕，我利用上午的空暇，前往剛在那天開始對外開放的圓明園遺址參觀。目睹那類垣敗瓦，我彷彿用手去愛撫着民族的歷史的創傷的疤痕。後來，每聽聞要重建圓明園的消息，我總從心底裏叫喊出來：一定要把那類垣敗瓦保留下來，一定要把那民族歷史的創傷的疤痕保留下來！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我與支聯會和民主黨的弟兄姊妹們在立法局門外，倒數迎接這一天。下午，我帶領支聯會的「愛國愛港愛民主大遊行」，高喊：「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

我們還要不要「勇敢」？

上月廿三日清晨，我回到曾任校長三十一年、現任校監的小學，參加全校師生舉行的慶祝回歸活動。項目之一，是全體合唱〈歌唱祖國〉。一位老師問我：會不會唱這首歌曲？我答：會，但已經多年沒有唱了，歌詞恐怕未能完全記得。於是，她給了我一張油印單張。

我看了一看，發覺一些歌詞是修改了的。我問：是誰修改了歌詞的？她答：不知道，是從學界慶委會拿回來的。

我看到了，原來歌詞中的一句，「我們勤勞，我們勇敢」，被改爲「我們勤勞，我們力幹」。「把「勇敢」改爲「力幹」，很使我納罕。

修改歌詞的人，是否知道原來的一句，是源自〈毛語錄〉的呢？毛曾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而又勇敢的民族。

〈毛語錄〉不是不可以侵犯的，但這一句實在改得太糟了！

首先從語文角度來看：「勤勞」與「力幹」，語義相近而又略有重疊。「勤勞」已包括了「力幹」。難道不出「力」又不去「幹」的人，還算得是「勤勞」的嗎？

再從「政治正確」的角度去看：「勤勞」不一定「勇敢」；較高層次的「勤勞」，必須「勇敢」，比如高空作業、遠洋捕魚、太空探險等等。更進一步說：「勤勞」而不「勇敢」，只是馴服的牛馬。只要「勤勞」而不要「勇敢」，難道是想我們都變成馴服的牛馬，只為他人去創造財富嗎？

那天，港大同學與支聯會義工，為了樹立〈國殤之柱〉在黃克競平台上，由下午四時一直工作至翌日凌晨四時，足足十二個鐘頭。他們搭起三十呎高的鋼架，爬上高空，在風雨中奮戰。我一直在現場觀看，他們的「勇敢」，比「勤勞」更感動我。

假如中華民族，只是一個「勤勞」而不「勇敢」的民族，就沒有今天的回歸！怎能把「勇敢」，改為「力幹」呢？

到底我們還要不要「勇敢」？不但要，而且必須，尤其是作為中國的香港人！

一九九七年七月三日

憶半世紀前的一位同學

在回歸熱潮中，不知怎的，我好幾次想起這位老同學。

大戰後，四六年初，油麻地官立書院復校，他和我同時進入該校肄業；算一算，這已是半個世紀有多以前的事。其後，我們又一同升上皇仁書院，但他並沒有讀到畢業，就輟學離家出走返國了。

他姓盧。個子矮矮，眼睛大大，膚色黑黑，頭髮短短；功課很好，尤其是中文，曾在班中考得第一名；課外知識，比一般同學都豐富。愛踢足球，身手平平，但常常說笑地吹噓自己是世運人馬，於是得了「細運」的綽號。他介紹我讀魯迅的書。他還帶我去過「新文字學會」，聽到尊棋的講演；他是該會的會員。

四九年深秋的一天，他在學校悄悄地很鄭重地對我說：當晚一定要到他的家。我如約去了，他又悄悄地很鄭重地對我說：他已決定離家出走，報考正在深圳招生的幹部學校——東江

公學。家人似乎發覺他有異像，監視着。他一邊說，一邊從鞋底把一小包遞過來給我，託我帶走，說這是他較貴重的東西，以免被家人搜出扣留。

想不到，幾個鐘頭後，天未亮，大約凌晨三四點鐘，他便摸到我家，說：家裏全知道了，他不得不黑夜私奔。他手裏只提着一個放着簡單衣物的小書包。

家裏不便說話，我立即和他到平時常去踢足球的京士柏，坐在草地上，等待黎明。經過商量，不坐火車，以防家人攔截；在晨熹中，我們截得一輛「白牌」，直趨文錦渡。那時過境，無需證件手續，我送他進入華界，緊緊握一握手，便告別了。他沒有問過我：是否也會返國？

幾個月後，收到他的第一封信，他學過了《社會發展簡史》，已被派到石龍參加「土改」工作。他還說：他們的縣委書記，是曾在香島中學當過教師的作家——陳殘雲；他希望自己將來也能成爲一個這樣的作家。

五年多後，收到他的第二封、也是最後的一封信，託我聯絡在港的「新文字學會」爲他寫證明文件。可惜該會已不再存在，我有負所託。

他還健在罷？他年紀比我大，倘仍健在，已近古稀了。

一九九七年七月六日

我在回歸日

六月三十日。上午，應訪港美國兩院議員之邀，前往美領事館會晤。出席者還有：李永達、張文光、涂謹申、李卓人、馮檢基、羅祥國、李鵬飛、周梁淑怡和朱幼麟。

一美議員問：你們認為我們，應不應該參加臨立會的宣誓儀式呢？我聽了，肚裏有一股氣。答道：我很奇怪你們提出這個問題，難道你們自己沒有足夠的政治道德和政治智慧，去找出答案嗎？

李鵬飛說：民主黨議員已多年沒有踏足中國，所以對中國的判斷是錯誤的。我問在座的美議員：你們都到過了伊朗嗎？無人回應。

中午趕回家，換了便服，再用一背囊，放進另一套全身衣物，以便被大雨淋濕時，可以更換。

下午二時，抵皇后廣場，參加教協的靜坐，抗議教學界立法局代表張文光被迫落車。

四時趕到灣仔會展中心外，支聯會的示威區。示威開始時，我說：支聯會站在鬥爭的第一線，我們要「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去掉衛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十時，返回中環遮打道，參加民主黨的「支持回歸，爭取民主」大會。在大會上，我說：只「支持回歸」，不「爭取民主」，不夠資格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國歌。

七月一日。零時三十分，匯合從移交典禮回來的李柱銘等人，走進立法局，走出露台。看見遮打道上，擠滿黑壓壓的人羣，很是感動。

二時，趕回灣仔示威區，與留守在那裏的支聯會同人，結束示威行動。

早上十時，《城市追擊》攝影隊，到家裏來採訪。採訪後，執筆撰寫下午遊行出發前的講稿。

下午一時半，到銅鑼灣。三時十五分，集會開始；三時半，遊行起步。五時半隊伍抵達前布政司署。我背着不輕的背囊，走畢全程，有舊患的脊骨，還算支持得住。

七時返家，洗了澡，出外吃晚飯。燈下，一口氣讀了本月份的《九十年代》、《開放》和《爭鳴》。猶未有睡意，又拿起放下了幾天的張中行的《禪外說禪》，讀了個多鐘頭。

一九九七年七月九日

我感到驕傲

回歸日前後，傳媒採訪，總是問：此時此刻，你的感受是怎麼樣的呢？

更有進一步問：做了十二年立法局議員，現在要「落車」了，你是否會感到失落、無奈，以後是否會感到寂寞、孤獨呢？

我利那間心裏的反應是：人與人之間，為甚麼竟有這麼大的隔膜啊！他們為甚麼竟想到，我會感到失落、無奈、寂寞和孤獨啊！

這些問題，我都回答了。現在再寫下來，立此存照。

我感到驕傲。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是一個勇敢的中國人，是一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中國人。

我感到驕傲。因為我堅定不移，在滄海橫流中，無所畏懼，與支聯會和民主黨的弟兄姊妹們，繼續站在鬥爭的最前線，高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旗幟。

我感到驕傲。因為我有一個中國夢，有一個「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中國夢。我感到驕傲。因為我堅信，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任何困難，都嚇不到我們，阻擋不了我們與歷史潮流同步的前進。一個民主的香港，一個民主的中國，必定實現。

我感到驕傲。因為我仍保持着在少年時候已植根的信念：一個人活着，是要使到別的人，因為你的活着而得到幸福和快樂。魯迅說：「豈有豪情似舊時」；我卻是一還有豪情似舊時。」

我感到驕傲。因為我活在這歷史大轉折中，我是在這歷史大轉折中的一個這樣的人。我為甚麼會失落、無奈、寂寞和孤獨呢？歷史的使命，使我只會感到生命更為充實，生命的真諦得到更深刻的貫徹、更熾熱的發揮。

失落、無奈、寂寞和孤獨，與我無緣，決不是屬於我的。

這些都不是豪言壯語，是我心底真的話，我因而更感到驕傲。

謹立此存照！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二日

隨風入夜，潤物無聲

杜甫的五律《春夜喜雨》，是一首好詩。以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的體驗，以此詩去比喻教育工作，使我對其更爲喜愛。全詩如下：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好的天雨，好像知道人們在甚麼時節最需要她；於是，她在春天來到了。

（在學的兒童、少年和青年，正當他們的人生的春天，他們也是人類的春天。這時候的他們，最需要雨露的滋潤，去成長。教師就好像春夜的喜雨一樣，灌溉了他們。）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那喜雨，隨着和風，在夜裏靜悄悄地來到，靜悄悄地滋潤着萬物。

（潛移默化，是最好的教育方法。要讓學生們，有如沐浴在和煦的微風和滋潤的細雨裏，

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地受到培育。這樣，就要有無比的愛心和耐心，身教重於言教，循循善誘。不必板起臉孔，說教連篇；更不必疾言厲色，責罵處罰。教師們要像「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地去教育學生。」

「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荒野的小路，與壓到地面上來的雨雲，混成漆黑一片。只看見遠處泊在江邊的船隻，亮着微茫的燈火。

（當今的社會，往往一片黑暗，叫人看不見路。教師就好像在前面的、那船隻的微茫的燈火，讓學生知道那裏就是渡口，過了河，便能踏上大路。）

「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天亮了，雨停了，看看那還帶着雨水的花朵，開得燦爛，把整個成都，妝點得更美麗而又莊重。

（教師們將會看見，自己曾灌溉過的花朵，燦爛地開放，把我們的世界妝點得更美麗而又莊重。）

九七年七月四日，參加香港教育學院葛量洪分校的結業茶會，我書寫了這首詩，贈給應屆畢業同學們。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五日

「形左實右」派

當前政壇，有所謂民主派、親中派、早餐派、自稱溫和民主派，等等。我要加上一個：「形左實右」派。這一派，雖無獨樹一幟，但卻無處不在，神出鬼沒，蔚然成風。

文革期間，林彪折戟沉沙，大陸掀起「批林批孔」狂潮，為林彪製造了一頂「形左實右」的帽子。其實，四人幫與林彪本是一丘之貉，真的批左，恐怕批到自己的頭上來；所以，不敢以左批林，並以此作為項莊之劍，意在「批周公」，即批周恩來也。

我加上的一個，不是帽子，而是如假包換的「形左實右」。先來對左與右，作出界定。

(一)《辭海》「左派」：「指政黨中之急進派，對右派而言，是歐洲議會之習用語。蓋議會中大都右為政府黨及保守派議員席；左為在野黨、反對黨及急進派議員席。」

(二)毛澤東《實踐論》：「我們反對革命隊伍中的頑固派，他們的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在歷史上表現為右傾機會主義。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鬥爭已將客觀過程推向

前進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停止在舊階段。一切頑固黨的思想都有這樣的特徵。他們的思想離開了社會的實踐，他們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前頭充任嚮導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車子後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了，企圖把它向後拉，開倒車。

「我們也反對「左」翼空談主義。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實現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為冒險主義。」

(三)傳統的、一般人的概念：親共就是左，親台或國民黨就是右。

我所說的「形左實右」派，為甚麼是如假包換的呢？根據上述的三個界定：在「形」上，切合(三)的左的標準；在「實」上，都切合(一)、(二)、(三)的右的標準。他們實質上是政府黨、保守派，開倒車，甚至在歷史上與台或國民黨有千絲萬縷關係，當前仍眉來眼去。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八日

弱水三千，飲只一瓢

這八個字，原句是「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出自《紅樓夢》第九十一回，《縱淫心寶蟾工設計，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黛玉醋氣冲天，發出連珠炮，質問寶玉：寶姐姐這樣，你怎麼樣？寶姐姐這樣，你怎麼樣？……寶玉就以這兩句滿帶機鋒、深有禪味的話回答她。這兩句話的意思是：儘管河水滔滔，我只取其中的一瓢來飲，便足夠了——儘管天下可愛的女子千千萬萬，但我只愛其中的一個意中人，便足夠了。寶玉談的是男女關係，但這兩句話所含哲理，若推及人生的各個方面，足以增長人生的智慧的。

我曾這樣地很想了一想：

「弱水三千」，是客觀的存在；「飲只一瓢」，是主觀的需求。假如能把這客觀的存在，與主觀的需求，冷靜地加以對比，找出平衡，淡泊自我，就能「應無所住」，接近了「覺」的

境界了。「弱水三千」，客觀的存在是無窮無盡的；「飲只一瓢」，主觀的需求是有限有極的。這不但是需求，甚至是可能性。

先說物質世界——這是形而下的。個人和家人的必需的溫飽，在正常的社會，是不難滿足的。家財億萬，窮奢極侈，有時也不易享用得盡花花世界的一切；即使享用盡了，也未必快樂和幸福。慾壑難填，往往是由於精神的空虛，妄想用物質來填補這空虛，以物質取代精神，結果是徒勞而還是空虛的。假如能把花花世界的一切，看作「弱水三千」；把必需的溫飽，看作「飲只一瓢」——那麼，便可拋卻很多很多的煩惱。

再說精神世界——這是形而上的。人生最大的問題，就是：為甚麼活着、怎樣活着、活着的終極是甚麼？撇開宗教的天堂地獄不談，不死藥也不會再有人信，人的一生，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瓢。怎樣看待自己這一瓢呢？或給過路的缺水的征人喝一口，好使其繼續前行；或澆在一棵將枯的野草，維持其即使是暫短的生機，好使那荒漠多一星星的綠意；或給那污垢洗刷一下，好使地上多騰出一角清白。要不，也隨滔滔而逝。

站在大江東去的岸邊，我感到已得到了一瓢之飲，因而心裏恬然豁然。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由避彈衣想開去

在熒光幕上，看見江澤民和李鵬下機，動作顛頂，舉止呆慢，心裏有點納罕。其後，據報章透露得悉，原來是穿了避彈衣，才不禁失笑。失笑之餘，由此想開去，卻深以為憂。

憂的是甚麼呢？就是北京對香港的所謂「敵情」的估計。

共產黨人，向來強調「敵情」思想、「敵情」概念等等。這就是對敵人的活動、陰謀詭計、破壞搗亂、不軌意圖、惡毒計劃的預測估計，據此作出種種對策和準備。

在革命時期，長期處於被摧殘壓迫的境地，這樣的考慮，似乎是必需的。但時移勢易，這種思維習慣，變本加厲，便不是實事求是。輕則杯弓蛇影，擾民傷財；重則「自嚇嚇人」，累及無辜。

遠在二次大戰後，斯大林在聯共大會上，就強調過「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不可以避免」，並判定將由此禍及社會主義陣營。文革期間，毛澤東反覆說，「深挖洞，廣積糧」，就是要準

備打核子戰；四人幫不時批這批那，指為「階級鬥爭新動向」，成為了整人的種種藉口。歷史證明了，這些都是子虛烏有，近乎神經衰弱的捕風捉影，但其中卻帶出了多少血淚！

這次回歸，唐樹備曾揚言，估計台灣勢力或會在港有異動。更有不知來源的消息，說愛爾蘭共和軍恐怖份子，也會來插一手。

據耳食之言，解放軍要求提前進駐，亦與此有關，並要求攜帶鎮壓機動武器入境，且研究了怎樣在會展中心附近，佔領控制制高點，等等。

我親歷的是，有人懷疑支聯會的七一遊行，會打出「反對回歸、要求獨立」的口號。天啊！

「自欺欺人」，發展為「自嚇嚇人」。是不是認為，誇張了對外矛盾，就可以緩和了內在矛盾呢？假如有內在矛盾的話，是要去正視和以正確方法去解決的。「自嚇嚇人」，和緩得一時，矛盾仍會客觀地存在。

不知這是由下而上，還是由上而下的虛構的敵情？不管如何，長此「自嚇嚇人」下去，不實事求是，如何能信任港人，落實「港人治港」呢？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劉節叩跪陳寅恪

去年暑假赴歐，帶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在機艙裏，一口氣把書讀完了。到了巴黎，在扉頁上，寫了「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也」等字，贈給了在那裏的一位朋友。

這書，可說是近代中國民族精英的血淚史。陳寅恪有「活國寶」之稱。讀到他所受的折磨，我的痛心，有如看着現藏在故宮博物館、有天下第一行書之稱的、顏真卿〈祭侄文稿〉真跡，被當眾撕破焚燬。

談及此書的，大多會提到他的一位弟子——金應熙。金曾被陳感歎過：「他最好的學生還是共產黨（員）的學生。」在歷次運動中，金都扮演了批陳「刀筆吏」的角色。由於太熟悉老師了，他的「批陳」文章，顯得份外有力。他甚至將陳在與極少數親密者閑聊時，所說的掌故和家事，也抖出來作為批判資料。其人其行，由此可見。

劉節是陳寅恪的另一位大弟子。「時窮節乃見」，劉與金表現出兩種不同的「節」。只見

金而不見劉，就看不見中華民族還是有脊樑的。

劉節是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第二屆學生、先秦史專家、蘇州知名「傲骨學者」劉景晨的兒子。他是爲陳寅恪公開鳴不平的第一人。他在批判大會上說：「批判（陳寅恪）有如大興文字獄」。他曾被暗示，只要他批判陳寅恪，便會很快「過關」。但他對這樣的「忠告」，不屑一顧。

讀畢全書，掩卷時，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一個場景是：

當時，劉節已是極負盛名的教授，年過五十，仍逢年過節，必到陳宅看望老師，不但執弟子禮甚恭，而且行傳統的叩頭大禮，一絲不苟，旁若無人。六四年，政治氣氛更爲寒冷，陳閉門謝客。這一年春節，中大歷史系同人，上陳宅拜年，遭陳拒絕，不肯相見。但劉節一人，私下硬着頭皮闖進門去，在陳人發脾氣當中，照樣行叩頭大禮。

也許有人以爲，「叩跪」是迂腐的。但我卻感覺到，劉的「叩跪」，閃爍着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小商人」的劉迺強

最初，劉迺強以「艾凡」的筆名，在《信報》撰稿，行文不斷自稱「小商人」，近乎口頭禪。稍後，買賣仍然在做，但這樣的解嘲，漸漸地少見了。最近，在《亞洲週刊》讀到他的一篇文章，標題是「潮漲潮落，老兵不死」。我幾乎吃了一驚，他怎麼轉了行，不但是「兵」，而且還是「老」的呢？他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打過了怎麼樣的仗呢？

八六年，籌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辦法公布後，他大力抨擊其不民主。其後，他以其中委任式的名額當上了委員，便即噤若寒蟬。當時，在一個社聯舉行的大會上，我曾公開當面批評過。

八七年，爭取八八直選如火如荼，協調方案滿天飛。他在某報的小專欄，給我戴上一頂「武林盟主」的紙冠。我極感厭惡，有如魯迅被某些人戴上了「青年導師」、「思想權威」等等的紙冠一樣。忍了十年，借此機會原頂奉還，好清除仍有的厭惡感的殘餘。

去年，臨時立法會密鑼緊鼓之際，他突然來電，要求緊急會晤。我約他來立法局，他說人太多不便；我只好把地點改在立法局附近的餐廳。

他來了，但卻還帶着一個人——他商號的夥計，而又是民主黨的成員。他只說了兩分鐘，我便打斷他的話，斬釘截鐵地說：「還輪不到你來游說我入臨立會，你不是那一班馬！」我有意讓他碰一鼻子灰。會晤只約五分鐘，有點不歡而散。

事後，我想了一想，他既然認為在立法局見面也不方便，為甚麼又帶了一個毫不相干的人來呢？大抵這是人證，得手了便可邀功，碰壁了也好交差。

兩三年前，黃文放曾親口對我說過，有關劉的生意的種種；這是我早已料到了的，只不過再多一個來自「可靠」方面的旁證而已。對某些人，我並不一定老是一味忠厚的，現暫且按下不表。

劉一直以「民主回歸」的倡導者自居，彷彿這是他註冊了專利權的商品。「老本」快吃光了，「策反」陳財喜（又是他商號的夥計），是他的「立新功」罷？他還是個「小商人」。

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日

不當別人是人

八個字的題目，用了三個「人」字，累贅而又拗口，須作題解。那「別人」是李卓人，那「不當別人是人的人」是梁富華；假如標題可多容幾個字，我會寫作「不當李卓人是人的梁富華」。

也許有些讀者，不知道梁富華是何許人也？他是工聯會副理事長暨權益委員會主任、勞顧會勞方委員。

七月二十日，《明報》的星期日副刊《人間臉譜》，刊出了本港三位工運人物——職工盟的李卓人、工團的李國強、工聯會的梁富華的專訪。在梁富華的一張照片下，有這樣的圖解：「我已不當李卓人是一個人看待。他已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價值。」原句是有引號的，即是這話直接出自梁的口，不是記者的轉述，原汁原味。

梁為甚麼對李這樣深仇大恨呢？李為甚麼會被認為「已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價值」呢？不把

李當作人，想拿他怎麼處理呢？莫非要把他打成「牛鬼蛇神」，下放「牛棚」去做「牛」，或槍斃了變成「鬼」嗎？我把這專訪細心地看了三遍，只找出如下的事實。

九四年，香港仔巴士罷工。梁指揮罷工工人代表，乘坐一零七號巴士，穿越香港仔隧道，召開記者招待會。「我在四十多個傳媒行家面前，依足傳媒慣例回答問題……可是當晚的電視新聞只播映一些罷工行動的片段，卻找來李卓人評論此事。李卓人在這件事上做過甚麼？但報道卻是由他大出鋒頭！」

原來如此！

他不去檢討領導工人罷工，是否維護了工人的權益，卻咬牙切齒計較，誰搶了他的鋒頭。他想出鋒頭，出不了，於是認為搶了他的鋒頭的人，「已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價值」，不把比人當作人去看待。到底梁富華的「做人的基本價值」是甚麼？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其實，他還是無知的。李卓人不是電視台的老闆，誰出鏡，是由他控制的嗎？在梁的另一張照片下，有這樣的圖解：「梁富華的前設是：傳媒對他有前設。」這是記者寫的。「前設」就是：先入為主的偏見。這圖解寫得好！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日

再談梁富華

前文的〈不當別人是人的人〉，談了一談梁富華，意猶未盡，還要來再談一談。

在那專訪中，他說：「我目前對議會還很抗拒」；「其實工聯會有一個立法會議員，跟有五個，完全沒有分別」。他真的「很抗拒」嗎？九五年，他參選立法局新九組功能組別，敗給了李卓人；九六年，在變相委任的臨立會選舉中，他又落選了；最近，臨立會補選譚惠珠的空缺，他第三次參選，仍是失敗。

既然是「很抗拒」，為甚麼還屢敗屢選呢？何況工聯會已不止一個臨時立法會議員了呢？我想了一想，有三個可能性：

一、梁說的是假話。他對槍了他鋒頭的李卓人，心懷深仇大恨；既然這樣重視鋒頭，會真的「還對議會很抗拒」嗎？

二、葡萄是酸的。且拭目以待，看看他九八年參不參選，倘若當選了又是怎樣的嘴臉。

三、「服從組織分配」。即使「很抗拒」，但「組織」要他參選，不能不服從，只得硬着

頭皮去馬。

假如是第三個可能性，我又想起了他對李卓人的批評：「我已不當李卓人是一個人看待。他已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價值。」

「服從組織分配」，即使是「很抗拒」的事也去做，這就是喪失了自我，把自己看作一組織」在棋盤上的一隻棋子。「組織」的指頭一動，作為「卒子」的自己，不管怎樣「很抗拒」，也拚命向前。

喪失了自我，把人變成了棋盤上的一隻棋子，被指頭推動着去做「很抗拒」的事，這樣，他批評李卓人的話，改一兩個字，就可以用來贈給自已了：「我已不當自己是一個人看待，我已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價值。」

假如是第一或第二個可能性，也不會好到哪裏去——口是心非，血管裏流着的滿是醋。工聯會有一個這樣的副理事長暨權益委員會主任、勞顧會勞方代表、派出參選的候選人，我真有點擔心！

梁富華也會不當我是一個人看待，認為我已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價值嗎？我是歡迎得很的！

一九九七年八月五日

題外的兩件小事

九七年六月份的《讀書》，刊出了朱學勤的《從一枝烟到一本書》。這是作者，為林毓生編選學術論文集的編後話。該文介紹了林的學理，並甚為推許。我讀後，卻對文中所提及的、在題旨以外的兩件小事，耿耿於懷。其一足，朱與林如何由「一枝烟」而「不打不相識」。

八八年夏，林到上海講學。朱在酷熱中，騎了一個小時車去參加，十分疲憊，一進門就點起了一枝烟。林看見了，當眾責問：「這是公共場合，你怎麼可以抽烟？房間不大，你不是污染空氣，干預別人自由嗎？」朱立即頂回去：「林先生，這裏不是美國，我不是開車而是騎車過來的。騎車一小時的疲憊你能體會嗎？」雖已事隔近十年，朱在回憶此事時，也只淡淡說了一句，當時年輕氣盛，沒有較多一點深刻的反思。

「這裏不是美國」、「騎車一小時的疲憊你能體會嗎」，把我刺痛得幾乎抖顫起來。難道只有在美國，才不應該在房間不大的公共場合抽烟，污染了空氣，影響了別人嗎？為甚麼以此

來區分美國和中國呢？

騎了一小時車的疲憊，是個人的事。難道就要來自美國的通常開車的人，體會自己的疲憊，對在房間不大的公共場合抽煙，視而不見，置諸不理嗎？何況，誰知道你騎了一小時車呢？疲憊就可有特權嗎？

其二是朱的轉述。

八十年代初，北京一學界名流初次訪美歸來，對另一位老先生曾感慨不平：「×公，林（毓生）、余（英時）、杜（維明）在海外學界地位，原來是你我的位置呀！」

「鎖國」和「鎖腦」幾十年，造成了海內外在多方面的巨大差距，的確使人痛心扼腕。但想到的，為甚麼不是如何急起直追，迎頭趕上，而是個人的「地位」和「位置」呢？「地位」、「位置」，又把我刺痛得幾乎抖顫起來。

這兩件小事，使我感到：長期的「鎖國」、「鎖腦」，把人的心也鎖起來了，「鎖心」的枷鎖還在。

一九九七年八月八日

「斬無明，起智慧」

這句佛偈，已忘記了出自何經何典。但在作出抉擇時，這句話，總像一閃一閃的紅燈，在我腦海亮起來，發出警號。

「無明」兩字，佛學有特定釋義，而我卻作了自我的界定。

「無明」有兩種：一是錯誤的意識，一是錯誤的認識。

意識，是品德的修養；認識，是對客觀具體情況的了解，對事物發展規律的掌握。作出抉擇時，假如能警惕和摒除自己的錯誤意識和錯誤認識，就可增長智慧，不犯錯誤，少犯錯誤，不犯大錯。

試用幾個大家都熟悉的故事，說明一下甚麼是意識和認識。

「愚公移山」：愚公因堅定的決心和毅力而成功，這是意識的勝利。

「龜兔賽跑」：兔子因驕傲怠慢而輸了，這是意識的失敗。

「曹沖稱象」：曹沖雖然不知道有所謂阿基米德原理，但用同一的物理現象，找出大象的重量。他對這一物理現象的認識，使他解決了問題。這是認識的智慧。

「刻舟求劍」：把劍掉在河裏的人，不知道船在走着，當船靠岸時，在船上記下掉了劍的地方，已不是劍掉在河裏的地方，因而再找不到劍。這是認識的謬誤。

「司馬光救友」：他不但見義勇為，臨危不亂，而且知道打破大缸，水流出，朋友便可得救。他可謂智勇雙全。智就是認識，勇就是意識。

「涇水之戰」：秦王苻堅大敗，是在意識和認識上都犯了錯誤。自大輕敵，這是錯誤的意識；不知道自己的軍隊是烏合之衆，紀律不嚴，且被敵方的第五縱隊滲入，謠言一播，便陣腳大亂，潰不成軍，這是錯誤的認識。

「斬無明」，可以「起智慧」；「起智慧」，亦可「斬無明」。在實踐鍛煉中，不斷積累經驗的智慧，也就可逐漸摒除錯誤的意識和認識。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一日

我「大展露」了甚麼？

九七年八月八日，〈信報〉刊出了劉迺強的〈司徒華內心世界大展露〉。

該文我看了多遍，始終找不到，劉所指我「大展露」了的「內心世界」，到底是甚麼？各方君子，如有發現，懇請告示！

數十年來，表裏如一；一言一行，都在衆目睽睽之下。我的「內心世界」，人所周知，再不必甚麼「大展露」。

我認識劉迺強已十多年，一直甚少往來。因為他一開始就以「小商人」自我標榜，而我卻過去、現在和將來，都絕不沾手任何買賣交易。

我寫了〈「小商人」的劉迺強〉，主要是因為在報章上看了，張炳良對他指控「出賣匯點內部文獻」的澄清。「出賣」而又是「內部文獻」，這是很嚴重的指控。張澄清了，卻未見劉的反應。劉說我，對他「屈得就屈」，我「屈」了他甚麼？他對張，不才是「屈得就屈」嗎？

他說那次會晤，「是大家同意守秘的」，這的確是如假包換的「屈得就屈」。我只舉出一個反證：他還帶了第三者來。有第三者，還算甚麼「守秘」？他自己也說，這是一個證人，使我不能抵賴。他對我來說些甚麼，竟事前就要提防我會抵賴的呢？我問了那第三者，他答：「我不知道他要和你談甚麼；他叫我來，我就來。」

他還把我描寫得，像個十七八歲懷春的少男少女，對那次會晤「依依不捨」。哈哈！太自作多情了！「以後也不會再就這件事作評論了，諾言還是要守的。」我和他並沒有甚麼「諾言」，他不過想就此事掛起「免戰牌」而已。

再抖多一點點出來，陳財喜在參選臨立會之前不久，致函民主黨，要求減少上繳款項，理由是，劉遵強因他的公職，花去了在店的辦公時間，要減他的薪水。不要又說，「屈得就屈」，陳的函件，民主黨是有存檔的。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四日

「鞭」與「也」

一次，在電台的「叩應」節目，一個聽眾來電，語氣粗暴地質問：「你是民主黨的黨鞭？你知不知道，「鞭」是甚麼意思？你知不知醜？」

這個聽眾，大抵是「三鞭至寶酒」的常客，以為這個「鞭」字，只有他心目中的含義，而不知其他。我當然知道，「鞭」字的一個含義，是雄性動物的生殖器也。但在那個場合，我認為不宜與他作詳細解釋或爭辯，只說：「鞭」字的含義有多個，但「黨鞭」的「鞭」並非他心目中的東西。這職位是管黨的紀律的，尤其是議會中黨內議員的紀律。這樣，輕輕帶過便作了。

心邪的人，其思路總匪夷所思！循這個聽眾的思路，便會有許多笑話。

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莫非孔子爲了發財，連「割蛇」的醜業，也願意去做嗎？

「鞭長莫及」這個成語，莫非是比喻虛有其表的男士，雖猛飲「三鞭至寶酒」，也無法醫好其暗疾，不能人道嗎？

「投鞭斷流」，莫非秦王苻堅要他的士兵全都自宮？

從「鞭」字，想到了「也」字。記得在魯迅的文章中，曾讀到他在東京從章太炎學文字學，章氏解釋：也，女陰。「也」字的含義，原來是雌性動物的生殖器。

循這個聽衆的思路，又會有許多笑話。

歐陽修的《醉翁亭記》，全文不過四百多字，卻用二十一個「也」字，都用得很好，歷受評者稱讚。以這個聽衆來看，這位太守，是在脫衣舞孃陣中流連了，風流得很。

以前浸會書院傳理系，有一位名余也魯的教授。幸好他並非女性，否則便自謙得太離譜了。

「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這是大大的冒犯，專欄女作家陳也，這位聽衆不知由她的名字，聯想到甚麼地方去？

本文的目的，只是想，不再有人像這個聽衆，向我作同樣的質問。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七日

另類的「及身而散」

最近，讀李敖的〈回憶錄〉、陸鏗的〈回憶與懺悔錄〉、許家屯的〈說故談今〉，想到了另類的「及身而散」。

「及身而散」是怎麼一回事？一些老一輩的文人雅士，年事漸老，直趨極限，自忖來日無多，便趁還有一口氣，把平生蒐集、珍藏、心愛的書畫、硯石、印章、古籍、等等，贈送給有同好的較年輕的朋友。

這種通脫、豁達、兼善的雅量，是值得佩服的。比起唐太宗把賺來的〈蘭亭序〉真跡，陪着自己的屍體帶進墳墓去，判若何止霄壤！

為甚麼不送給博物館？大抵這些東西，價值還未夠得上在那裏展出。為甚麼不留給自己的後人？自己的後人未必有這樣的愛好或雅致。假如是贗品，怎麼辦？我以為不必毀掉，最好能

附一小記，說明如何上當，如何發現其假，也「及身而散」送了出去，連同經驗也一併遺留在人間。

其實，這些「及身而散」了的，並不是人生中最寶貴的東西；還有另一些更值得遺留在人間，對更多人更有價值的。

一生的閱歷際遇，對其反思而積澱起來的經驗和智慧；尤其是一些非一般人可窺見、知悉、體會的事實，某一歷史的陰暗角落；假如不寫下來，刊印出來，就會湮滅。近代學者，對一些筆記野史的重視，是很有道理的。現在，出版印刷都發達得多，應該有更多「筆記野史」去印證、旁證、反證、矯正、補充、豐富，那些近乎官式的記述。

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我認為是一篇千古文獻。近年，巴金在文革後所寫的幾本《隨想錄》、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等等，都是發人深省，有益世道，有助於歷史的進步的著作。

我的所謂「另類的「及身而散」」，就是把這些寫下來，刊印出來。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日

「一檜竟何能？」

八九年六四事件，一般傳聞都說：當時北京的李錫銘和陳希同，虛報軍情進讒，於是鄧小平拍板，下令鎮壓。

這次香港回歸，超額完成了江澤民「萬無一失」的要求。事後，又有傳聞：事前誇張敵情、引致草木皆兵的一位要員，因而被「炒魷」。

以上兩事，是耶非耶？我想起了明代文徵明一首關於岳飛、秦檜、趙構的〈滿江紅〉：

「拭拂殘碑，救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豈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端、堪恨又堪悲，風波獄。豈不念，封疆蹙？豈不念，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竟何能，逢其欲。」

文徵明在這詞指出，風波獄的主謀是宋高宗趙構，秦檜只不過是幫兇而已。趙根本就不想

「一直搗黃龍」。打敗了金人，迎回徽欽二宗，他就再做不成皇帝了。把詞最後一句，譯為語體是：可笑那小小的一個秦檜，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能耐，他只不過是迎合了趙構的私欲罷了！略知歷史底蘊者，都會認同文的看法。

「偏聽則暗，兼聽則明」，這是句老話。但有時，問題並不在「偏」或「兼」，而是「私欲」。

「大躍進」闖出的「人禍」，毛澤東曾派自己最信任的秘書和護衛，到下邊去做過調查，在上廬山之前，會議的原意是反「左」的。他不是對情況完全不了解。但只可由他來反「左」，彭德懷一上書，冒犯了他的無上權威，他就要反「右」，把你反掉。

極位者，往往各種情況都掌握，總有各種不同的渠道，了解得各種不同的情況。相信哪一些，根據哪一些作出決策呢？假如懷有「私欲」，便會自取所需，「逢其欲」。

「斬無明，起智慧」，才能善斷。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讀書與閑

仿「詩窮而後工」的句式，想出了一句關於讀書的話：「書閑而後讀」；其後，又多想出了另一句：「書讀而後閑」。

先說第一句。「書閑而後讀」，完全不是有空暇閑情才去讀書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書要以一種寧靜、悠閑、淡泊、隨着個人志趣的心境和態度去讀。切不可硬着頭皮，帶有功利主義。這樣，才可養成習慣，讀得博和雜，讀得入味，讀出味來；才可怡情養性，得益於潛移默化的浸淫之中。

陶淵明所謂，「好讀書，不求甚解」，是不是就是這樣呢？

甚麼是讀書的功利主義？例如，爲了應付考試、趕作論文、起草文件、撰寫講稿等等。假如這樣地讀書，也不用硬着頭皮，便是已得讀書的痼疾。

晨運散步，你才欣賞得鳥叫、草綠、樹葉上的露水、天際的微白。假如是挑着擔子趕路，

雖走在山陰道上，也會一無所見。

在讀師範時，曾借了一本沈從文的《邊城》，給一位同學。很久，他才還給我。我翻了一翻，原來稍不懂的字，他都去查字典，並用鉛筆把字義註寫在旁。這樣的人，就不能「書閑而後讀」。我暗中贈了他一聯：「言語有如蒸餾水，平生只讀教科書。」

再說第二句。「書讀而後閑」，意思就是，假如能夠「書閑而後讀」，那麼，在工作繁忙、身負重擔、面對艱困、考驗在前中，也能「好整以暇」去應付。越在這樣的環境中，越要保持「書閑而後讀」的習慣，擠出時間的空隙，去讀點閑書。這樣，可以調劑生活、鬆弛精神、轉換思路、拓展眼界、保持生活情趣，創造出「好整以暇」的心境，放下閑書後，又去應付一切。

「書閑而後讀」和「書讀而後閑」是相輔相成的。林彪的「活學活用，急用先學，帶着問題學，立竿見影」，是這兩句話的另一極端。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百勝」與「不殆」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一般人大多是這樣說；但《孫子兵法》的原句，卻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百勝」，就是戰無不勝，打遍天下無敵手。「不殆」，只是不致於陷入危亡的困境。

只要把「百勝」和「不殆」的含義，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原句才是合理和合乎邏輯的。

假如對手是世界拳王、連泰臣也被打得「茅招」去咬耳朵的荷里非特，你卻是已風燭殘年的七八十歲老翁，即使對彼此了解得如何深入透徹，你還是硬要和他「過招」，恐怕他一拳便把你送往西天。何來「百戰百勝」呢？

倘若交手的果然是荷里非特，那麼怎麼辦？這樣，只有用毛澤東所說的辦法去應付：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一走了之，這樣，才不致於陷入危亡的困境。

《孫子兵法》的一個很重要的戰略思想：先要立於不敗之地，不打無把握的仗。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首先要求的是「不殆」。這次打不贏，一走了之，保存實力，還有再戰的機會，待等再戰而勝之的時機。

以下的話，就說得更清楚了：「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勝可知而不可為。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己方的行動，只可以保證不被打敗；至於是否能打敗敵人，決定性的因素，是在對方。勝利只可以根據主客觀的條件，去研究、分析而預知，但決不能超乎主客觀的條件去強求。先要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再去等待找得可以戰勝敵人的時機。

這其中，有一個「忍」字，切戒冒險盲動。

還有兩句《孫子兵法》，也是我喜歡的。其一是：「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其二是：「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工業行動是「兵」

約十多年前，一個交通運輸行業的工會，採取工業行動，取得了勝利。在祝捷會上，我嗅出了有點「勝利衝昏了頭腦」的氣味，於是，忍不住在會上提出了三點意見。

一、「兵凶戰危」。「兵」也可解作武器，罷工是工會最有力的，也是最後的武器。使用這個武器，是有凶險危機的。所以，不要輕妄去使用；要在不得已時，才去使用。而且，使用時，要把所有由此可能出現的凶險危機，都事先估計在內。

二、「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做工會工作，切忌動不動就想到工業行動。平時，要把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做好會員的服務、聯絡、組織工作上，團結更多的會員，把會員團結得更緊密。這是經常性的工作，必須首先做好，這就是「養兵千日」。採取工業行動，尤其是罷工，就是「用在一朝」。能夠「養兵千日」，到了「一朝」要「用」的時候，才有可「用」的力量。以「千日」來與「一朝」比較，是多少倍呢？由此可見，「養兵」比「用

「兵」，要花更多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不「養兵」，就無「兵」可「用」。無「兵」可「用」，也輕妄地去作戰，必敗無疑。

三、「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這裏，「伐兵」是工業行動，「攻城」是工業行動中的罷工。這都是下策。「攻心爲上，攻城爲下」，上上策是要做到，「兵不血刃」，也能維護和爭取得會員的權益。假如能夠「伐謀」、「伐交」、「攻心」，有強大的團結力量爲後盾，是能夠這樣地去取得勝利的。

很可惜，那時候該工會的負責人，沒有聽進這些意見。

我的憂慮，果然應驗了。不久，這工會又採取第二次工業行動，結果挫敗了，對工會的發展帶來頗大的傷害。

這是很深刻的經驗教訓。

所以，事隔這麼多年，我仍記憶猶新。

一九九七年九月一日

西南聯大名師風貌

英、法語教授和翻譯名家——許淵沖，他的《追憶逝水年華》，是一本很有可讀性的小冊子。

全書共二十一章，除開卷和壓軸的《序曲》、《回國之後》和《尾聲》外，其餘的，都是記述在西南聯大和留歐時的舊事。作者從側面描繪了西南聯大各名師的風貌，當會使「余生也晚」的現在的這一兩代人，不勝神往。

陳寅恪告誡研究生：提問不可太幼稚，也不可太大。「獅子領下鈴誰解得？」當然是繫鈴人，這是前者。兩個和尚望着「孤帆遠影」，到底是心動還是帆動，這是後者。

馮友蘭講「中和之道」，說：「和」與「同」的分別是，「同」中無「異」，「和」中卻有「異」；使每件事物內有各種恰好的分量，就是「和」，這就是「中和之道」。

葉公超教「大一英文」，他對才華過人的錢鍾書說：你不該來清華，應該去牛津。

錢鍾書說過一個這樣的笑話：臥車上有人鼾聲如雷，吵得大家不能入睡，想要報復；誰料清晨臥車門開，走出一個美貌少女，各人都擁上前去獻殷勤。《圍城》一書，充滿這樣的幽默。

吳宓上課，學生的座位有一定的安排，不能亂坐。但他卻特許本來分隔而坐的一對戀人，坐在一起。作者稱之為：「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

趙詔熊教《莎劇》，比較《羅密歐與朱麗葉》和《安東尼與克柳芭》（即《埃及妖后》），說前者寫的是青春戀，後者寫的是黃昏戀。作者謂其一語中的。

潘家洵是翻譯名家。當時，學生愛打橋牌，頗浪費時間，他就把 BRIDGE，譯為「不立志」，音義俱妙。

作者稱陳福田有嚴格的世俗精神。一次聽演講，因為內容不精彩，他沒有鼓掌，陳就當場批評他不懂禮貌。

一九九七年九月四日

「紅色童貞女」

在劉小楓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認識了這一位「紅色童貞女」——法國的西蒙娜·薇依（一九零九—一九四三）。

她在哲學、歷史、政治、藝術、音樂、文學等方面，都極有才華。加繆曾稱她為「我們時代的唯一偉大的精神」。

早年，她對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的著作，深有研究，是一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活動家和理論家。她深入工廠與工人一起生活，親自做苦工。

二十八歲，她皈依了基督教，但一直到死，拒絕受洗，拒絕參加宗教聖事，置身於教會之外。

經過在革命中的親身體會和深刻的反思後，她作出這樣的判斷：「……革命不會消除生活中的不幸。……馬克思給宗教取名為人民的鴉片，在宗教否定自身的時候，這也許是合適的，

但從本質上看，這個名稱也適用於革命。對革命寄予希望乃是迷魂湯。」

她還認為：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宗教——「革命的」宗教，但這種宗教是領袖們、革命導師們的宗教，是把人的受苦，僅作為理論來談論或構造理論的宗教。

她的宗教的核心思想是：基督教是奴隸們的宗教。把自己也看作一個奴隸，使自己也成為不幸，以認同受苦的方式進入十字架的信仰，活出了基督。

她參與了抵抗納粹的工作，因勞累、飢餓和疾病，猝然逝世，享年只有三十四歲。

由西蒙娜·薇依，我想起了中共先烈彭湃。他比毛澤東更早參與農民運動，有「農民大王」之稱。他的家族，是廣東海豐的大地主。為了發動農民分土地，他首先把家族的土地，完全分給了農民。

爲了所信所愛，身體力行，「傾空」（完全奉獻了）自己的人，不論所信所愛的是甚麼，都是值得尊敬的。

一九九七年九月七日

彭亨利修士和彭湃

由「紅色童貞女」西蒙娜·薇依，想起了中共先烈彭湃；由彭湃，想起了彭亨利修士。

前喇沙小學校長彭亨利修士，已下世多年。宗教界和教育界，認識他的人不少；但相信沒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彭湃的侄兒。

七五年冬，我和幾位朋友創辦了雙月刊《新教育》。彭修士是一個很熱心的支持者，我由此與他相識。

他個子矮矮胖胖，禿頂白髮，腰彎得像「蝦米」，慈祥和藹。他和我，似乎很有緣；一見如故。那時候，我的脊椎骨已有毛病，他以個人的經驗，告訴我：游泳是最好的治療。他給了我，學校泳池大閘的鎖匙，介紹我認識看管的工友，說：只要學校不上課，你隨時可以來。

他帶我參觀學校的圖書館。裝了冷氣，鋪上地毯，兒童圖書很多。他還說：他組織了脫產的家長，專為功課較差的學生補習。

在喇沙小學頂樓，他有一間設有廚具的小房間。一天中午，他約了我，在那裏親自烹製咖喱，與我共進午餐。

吃着咖喱，他告訴我：他的父親與彭湃是同父異母兄弟，一同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返國後，父親也隨彭湃參加了革命。革命失敗，他的一家被追捕，情勢很危急，幸得一位在當地傳教的神父，把他和父親救了出來。到港後，父親進了修會工作，卻把他送了給修會撫養。我默默計算一下，那時候，他大約不到十歲。

修會把他帶到馬來亞，他成爲了修士。五十年代中，他從馬回港。

他有一個心願，要寫一本《彭湃傳》。他很高興地，把剛從日本早稻田大學搜集得的資料給我看，是彭湃和他父親的學籍紀錄和成績表的影印副本。現在看來，他這個心願，恐怕是落空了。

他還告訴我：他的祖母，已移居加拿大，在那邊做了百歲大壽。她是不是，聶紺弩《重到海城呈彭母》詩中，在文革時被門爲「臭地主婆」的周鳳女士呢？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日

宴之敖者就是魯迅

《鑄劍》，是魯迅《故事新編》中，我最喜愛的一篇。這復仇故事的主角，不是眉間尺，而是宴之敖者。

眉間尺，是鑄劍名師干將、莫邪之子。夫婦為楚王鑄成雌雄寶劍，獻其雌而藏其雄。楚王殺干將。眉間尺年屆十六，母告以殺父之仇，授以雄劍，命其前往刺殺楚王。

他少不更事，一進京城，便暴露了，受困而幾乎被捕。幸得一個「黑鬚黑眼睛，瘦得如鐵」的「黑色人」，為他解了圍而逃到城外去。

在城外，他又遇上這黑色人。黑色人說：他「善於報仇」，眉間尺如能把寶劍和頭顱給了他，他便為其報仇。於是，眉間尺用寶劍割下自己的頭顱。

黑色人帶着寶劍和頭顱進宮，騙得楚王走近，一劍砍掉楚王的頭；後來看見眉間尺的頭，在鼎中沸水不敵楚王的頭，也就把自己的頭砍了掉進去，以助眉間尺。結果，兩頭合力，把楚

王的頭咬死了。

宴之敖者，這名字只在故事中出現過一次，黑色人見楚王時說：「臣名宴之敖者」。

魯迅把這人物，刻劃得那麼精彩，其中注滿了個人的感情，掩映着自己的影子。一宴之敖者」這名字很奇怪，是魯迅創造出來的，影射他自己。

二四年，魯迅輯成《侯堂磚文雜集》一書。題記中，記與周作人不和，出走八道灣，就以「宴之敖者」白署作筆名。

許廣平在《欣慰的紀念》中，曾記下魯迅的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我是被家裏的日本女人逐出來的。」日本女人就是周作人的太太。

魯迅在逝世前一個月所寫的《死》，其中有近乎遺囑的話。最後的一句是：「損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這一句話，不是有着《鑄劍》中，宴之敖者的神魄嗎？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三日

被斥罵的兩次作文

二戰後，在官立油麻地書院肄業，我曾兩次被作文老師斥罵。

第一次，作文題目是《沙田旅行記》。我想：去沙田，不是要乘火車過山洞嗎？就只截取這一段去寫。至今，還記得大意是這樣的：

汽笛發出迎接挑戰的高叫，進入山洞。電燈壞了，黑漆一片；「轟隆、轟隆」的聲音掩蓋一切；車廂搖擺得更厲害，彷彿向無底深淵下墜。

有人擦亮火柴吸烟，帶給大家剌那的安慰；有小孩哭叫起來，說很害怕；有人罵道，為甚麼電燈常常壞……。時間停頓了似的，使人覺得特別漫長。

汽笛又發出尖叫，這是勝利的尖叫，火車出山洞了。車廂外，是陽光下的一片金色大地。剛才那哭叫的小孩，已在媽媽懷中睡着。我深深地吸了幾口新鮮的空氣。

派卷時，老師把我叫到面前，當眾斥罵：「難題萬丈，問非所答，重作！」

後來，我把題目改爲《過山洞》，寄到當時的《星島日報·學生園地》，參加徵文比賽。

結果入選爲第二名；得到的獎品，是一本托爾斯泰的《幼年·少年·青年》。

第二次是兩年後，是一位臉孔更爲嚴肅刻板的老師，作文題目是《有志者事竟成》。這次我一本正經去寫，大意是這樣的：

有志者，未必事竟成，要看你立的是甚麼志。比如你想中馬票（那時還沒有六合彩），每次都傾全力去買，可能至死，也未能中。又比如，你想水中撈月，雖未至於像李白瀟灑，但也沒有成功的希望的。

這次，又被老師叫到面前，當衆斥罵：「標奇立異，包頂頸！重作！」接着，還把我的卷子，撕得粉碎。

這兩次斥罵，我視作很珍貴的禮物，因爲使我懂得在以後漫長的教學生涯中，怎樣對待學生，怎樣教作文。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六日

《李陵答蘇武書》

學校的課本，沒有這一篇古文。一位同學，不知怎的從《古文觀止》裏找了出來，當眾朗讀。那琅琅上口的對仗四六句式，同學們大感興趣，於是紛紛抄錄，背熟。每當課餘無聊，便一起拍着書桌，擊節高聲朗誦。

每當背到，「……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慷慨激昂，聲震天花板。但接着下去，記述的是李陵的悲慘命運，大家都再沒有興趣背下去了，不了了之。

離校後，知道該文是偽作；再其後，又知道被批評為「漢奸文學」。於是，便再不欣賞了。誰料得到，三四十年後，我又和一位朋友一起背誦，感觸很深，觀感大改。

八九年四月，我往三藩市領取「傑出民主人士獎」。領獎後，應邀飛紐約演講。

演講結束，聽眾陸續離去。一位五十歲左右的漢子，走上前來，說：「華哥，我

是XXX，你還認得我嗎？」接着還說了一些我認識的朋友的名字。

聽到這樣的稱呼，我知道是五十年代的朋友。樣貌已全無印像，但姓名還是依稀記得的。他陪我返酒店，又到房間裏來談天。

他向我訴說了自己的遭遇：五十年代中，初中畢業，返粵升讀中等技術學校，其後派往工廠當技工。因為個性愛說怪話，又有港澳關係，便成爲了「運動健兒」，受盡折磨。文革後返港，七九年移民美國，現於一意大利人的小工廠當技工。

談至深夜二時，他告辭時說，幾個鐘頭後，他駕車來送我去機場。在往機場途中，他向我背誦《李陵答蘇武書》，我也輕輕地應和着。背誦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他一連把這兩句念了三遍，泣泣起來，再不能背下去。在機場關口，我忍不住把他像小孩子般緊緊擁抱。

爲甚麼這偽作的「漢奸文學」，引起這位朋友的共鳴呢？你能說這位朋友是「漢奸」嗎？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九日

李廣三代悲劇

寫過《李陵答蘇武書》，找出《史記》的《李將軍列傳》，讀了一讀。

李廣有三子：當戶、椒、敢。長、次子先李廣而逝，幼子敢也是戰將。李陵是當戶的遺腹子。

該傳述李廣事詳；李敢和李陵，只略略幾筆，但卻是沉重的幾筆，在歷史上留下了使無數人扼腕的千古奇冤。

李廣「引刀自刎」前，說的最後幾句話是：「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

一生征戰，「難封」還不是最大的冤屈。國舅衛青，爲了讓親信公孫敖立功，便派廣走迂迴難行之東道。廣因迷失而過了會合期限，要接受審訊而定罪。「刀筆之吏」當然很難忍受，否則，廣爲何竟至於寧死而不去面對呢？

我想：「刀筆之吏」，恐怕還比不上文革時的「專案審查小組」罷？古時更沒「剝陰陽頭」和「批判鬥爭大會」等毒招。難怪文革中，那麼多人「非自然地」死去，並被加以「自絕於人民」的罪名。

廣死翌年，李敢怒衝青害死其父，擊傷衛，衛怕得躲起來而不致張揚此事。霍去病與衛青有裙帶關係，遊獵時，霍乘敵不備，把他射殺。把他身上的箭鏃拔掉，報稱被鹿撞死。

李陵帶五千步兵，迎戰單于八萬大軍。苦鬥八日，殺敵逾萬，矢盡糧絕，救兵仍不到，於是投降了。漢武帝得悉李陵降敵，把他全家殺掉。

《李陵答蘇武書》，有一句：「雖忠不烈，視死如歸」（盡忠不一定要死，但要有「視死如歸」的不怕死的精神）。李陵慣上戰陣，不會是一個怕死的人，在絕境中降敵，恐怕祖父和叔父冤死的陰影，在那關鍵時刻起了作用。

李廣三代的悲劇，還陪上一個司馬遷。他只為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卻受宮刑，精神和肉體都遭到殘酷創傷。他忍辱偷生，寫下《史記》，也就替李廣三代和自己，平反了。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

來客問：怎麼去改善駐港解放軍的形象呢？接着，他說：是否應該多參加本港的公益慈善活動，例如公益金百萬行？舉辦軍營開放日，讓市民參觀，與市民同樂？與本港團體，舉行友誼運動比賽，例如足球、籃球？等等……

我覺得他是有誠意的，於是，很坦率、由衷、簡單地說出我的意見：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

我的話，不能像禪宗的佛偈一樣；跟着，向他作了解釋。

駐港解放軍的形象，不是孤立的。這是全國解放軍的一部分，其形象自然與全國解放軍的形象聯繫起來。要改善形象，必須是全國解放軍的，不能單是駐港的。

八九年六四事件，解放軍進城，鎮壓北京學生和市民，至今留在香港市民心中的陰影，並未消失。

近年來，軍商勾結貪污，軍民衝突流血，香港報章亦時有報道。每日，往返國內和香港的香港市民無數，他們大多對解放軍有一些負面的印象。要把這個整體的形象改善，並非短期，或只單由駐港解放軍去做，就能辦得到的。

所以，最好的辦法是，盡力保持低調，久而久之，使香港市民忘記了，有解放軍駐港這回事，那就成功了。沒有形象，就是好形象；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

來客還問：士兵住在封閉式的軍營，生活枯燥單調，又怎樣去改善呢？

我以為，在一個頗長的時期內，不宜讓解放軍多接觸香港社會。軍營外，是一個很複雜的花花世界，他們的待遇與那令人暈眩的物質享受有極大差距，是很難避免污染的。可以做的是一、豐富軍營內的文娛康樂生活；二、較短時期，就可離營返國度假，即使只是深圳也好。多接觸香港的現實，總難免有不是好新聞的新聞。

我最後說：「擁軍愛民」的時代，已過去了；要扭轉這樣的思路。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職工會的兩大標誌

了解一個職工會，甚或一些其他團體，看兩個數字——會員人數和財政收支，便可如實得知其概況和近況。我把這兩個數字，看作職工會的兩大標誌。

職工會每年須向職工會登記局，呈報會員人數，刊於年報。但不少職工會，所呈報的人數，是並不真確的。

一些把欠交會費多年的，仍算作會員；某團體只公布累積人數，即自成立以來曾入會的人數。只要在財政中找出會費收入，除以該會年費，對比一下所呈報的人數，便可發現其中有多少水份。

還可從縱橫兩個角度，去看這個人數。縱是看近幾年的增減；橫是這個行業或產業的總人數，該會人數佔了百分之幾。

財政先看收入。除了會費，還有沒有其他收入呢？某會是靠股票利息和租金收入過活的。

開支更重要。假如周年聚餐是最大的開支，就「好打有限」。會所不是自置物業，為甚麼沒有租金開支或只支微不足道的租金呢？最主要的開支是甚麼，就是該會活躍程度的反映。

以這兩大標誌，來看一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教協每年徵收會員，由九月一日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九六至九七年度，繳費會員人數是六五五八四人，比上一年度增長了二八九五人。這是建會以來，第二十四年的增長。在跨越九七這個歷史時刻，仍有這樣的增長，可見教師對教協的路向的支持。

財政年度是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九六年全年開支是二千四百多萬元，平均每個會員須付三百七十元，但會費只是五十元。所超出的三百二十元，是全會上下努力，從各種服務中，賺回來的。最主要開支，是受薪職員（近一百四十名）薪金、印刷、郵費、水電等。

陳漢森曾對我說：在香港獨立工運中，教協能成爲一個強大的工會，是一個異數。我卻以爲，其中也有必然的因素：無限的血汗和不少的智慧。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回應葉國華

九七年九月份的〈九十年代〉，李怡訪問葉國華專稿，內有葉提及我的一小段話：

「老實說，司徒華和支聯會幫了董先生一個大忙，他打出紅色旗號，「愛中國、愛香港、愛民主」，有甚麼錯處？這是大都可以接受的，而且紅色就帶有慶祝的意思，表示慶祝香港回歸。……我曾經和董先生開玩笑說，應該給司徒華大紫荊獎章。我知道司徒華是甚麼人，他長期愛國。司徒華也跟董先生說過，你我都愛國，只是愛國的經驗不同。」

我的回應是：

一、由於支聯會不涉及本港事務，所以，沒有關於「回歸」的綱領。但同人們的民族立場是鮮明和堅定的，「支持回歸」是毫無疑問的。這樣，在回歸日打出紅色旗號，有甚麼可稀罕！並非爲了幫誰的忙。至於紅色旗號上的口號：「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董、葉

兩人是否也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呢？

二、雖然是一開玩笑說，葉也太看重了大紫荊獎章，小覷了我。他以為，即使真的給我該獎章，我會接受的嗎？他以為，我能夠忍受，與前朝的「孤王孽子」、倒閉了的「太平門公」的老闆、有刑事案底的好爾、愛的不知是哪一個祖國的洋婦、……等人，並列為伍嗎？

三、「他長期愛國」。不是「長期」，而是「一貫」，我從來都是一個愛國者。

四、「愛國的經驗不同」。我不記得是否說過這樣的話，但話是不錯的。我與董可以說是同年代的人，都經過戰亂。但我曾「餓飯」，曾聽到「鬼子進村了」而走上荒山，曾為共和國的誕生而滿懷熱望……。我是因民族的苦難而愛國的，不是為了恩惠而是奉獻而愛國。我不知道，董是否有同樣的經驗？

五、「我知道司徒華是甚麼人」。葉還是不了解我的。雖然，他所說關於我的，可算都是正面的話；但為了讓他進一步去了解，我作出以上的回應。

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

聽到了朱鎔基這樣說

朱鎔基在港說：最使他發愁的問題，是中國的人口太多。一個人的飯，三個人吃。但是，發展教育和科技，人口多便不是一個問題，不是包袱，而是寶貴的財富。

朱鎔基，不愧是朱鎔基。作為終生從事教育工作的我，現雖已退休多年，但聽到這樣的話，還是高興的。

發展教育，當然要投資，這是一個方面。但另一個方面，也必需一個這樣的風氣：讀書有用，知識有價，社會有公平競爭的機會。倘若仍然是，解剖刀不如剃頭刀，製造核彈不如賣茶葉蛋，前門緊閉而後門暢通，這樣，更多的投資也會事倍功半，甚至枉然。

一個人的飯，三個人吃，固然是一个大問題。但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或「歪策」下，一些人竟一個人吃了三十個人的飯，這也是一個不小的問題罷？

「衣食足，然後知榮辱」，這是句老話；「飽暖思淫慾」，也是句老話。不能讓大部分的

人，老是衣食不足而鮮知榮辱；另一方面，卻又讓一小部分人，老是飽暖過度，淫慾無限膨脹罷？

在《明報·世紀》版，讀到劉再復轉述他的國內朋友所說的情況：貪污腐敗，侵蝕了法庭和試場，全民的人的質素，正不斷惡化。這真叫人為中華民族的前途憂慮！

不是從理論，而是實踐，我對教育的功能有這樣的認識：一、教育等於科技，科技等於生產力，生產力是發展經濟的最重要動力。二、普及教育可促進階級的對流，緩和社會矛盾。三、是全民下一代的最有力和普及的精神文明建設。四、充分發掘個體的潛能，為其去實現充實的人生而創造有利條件。

朱鎔基的話，只涉及上述的第一點。當然，經濟是基礎，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築，兩者互動。強調科技，只有一定道理。

朱鎔基，到底還是朱鎔基。

一九九七年十月四日

金聖嘆的「不亦快哉」

明末清初的金聖嘆，可算是一個文學批評家和幽默大師。他以哭太廟而被斬，卻自我解嘲說：「殺頭」乃世上最「痛快」的事，我竟得之。的確，「殺頭」是最「痛」且最「快」的。魯迅批評他：化殘酷為一笑（大意）。

他批注《西廂記》，寫下了三十多則，自以為「不亦快哉」的事。抄幾則，以饗讀者：「還債畢」。無債一身輕，人之常情，這不似他一貫的幽默。

「看人放風箏斷了線，風箏飛去」。此則有點幸災樂禍的心理，但所「幸」所「樂」，並非甚麼大「災」大「禍」，只聽而未至於噬。

「筐中無意間忽然覓得故人手跡」。這有如不期而乍遇舊雨，當然是一件樂事。

「看人作擊窠大書」。非「擊窠大書」，無法觀其運氣懸肘用筆；當然，此「人」應是善書者。否則，不如去看髹漆掃灰水。

「推紙窗放蜂出去」。既放活了一個生命，又免使自己有被螫之虞，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

「讀《虬髯客傳》」。好文章不少，爲甚麼偏選《虬髯客傳》呢？他是欣賞虬髯客，還是李靖和紅拂呢？他是否也懷有虬髯客的大志，而覺得眼下並無像李世民而值得向其退讓的人呢？抑或虬髯客瀟灑飄然赴海外，從此遠離政治鬥爭，正合其意呢？

「夏日早起，看人於松棚下，鋸大竹作筒用」。此則，有點莫名其妙。爲甚麼是「夏日」之晨；爲甚麼是「松棚下」，而不是瓜棚下等；「鋸大竹作筒用」有甚麼好看，爲甚麼不是看人幹別的活？

「作縣官，每日打退堂鼓時」。頗有點懶。但想到以前慣作馬拉松會議的立法局，忽然某天，會議竟在下午五六時左右結束，則對金此則「不亦快哉」，大有共鳴！

假如記者訪問現今的名人雅士，各列舉其十則自以爲「不亦快哉」的事，相信會可觀，甚至可以觀人。

一九九七年十月七日

高爾基自殺

年輕時，讀過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我的童年》、《在人間》和《我的大學》。這三本書，以現時的流行語來說，是很「勵志」的。單是《我的大學》這個書名，就給我們不得高等學府其門而入的一羣，以很大的精神力量；大學以外還有大學，在正規大學以外，還有更寬闊的天地，更豐富的知識。

《我的大學》中的一小段情節，我至今還記得。這可以說，是一個小小的悲喜劇。

年輕的高爾基，因苦悶彷徨而想自殺。他恐怕自殺不成功，半生不死，於是去找來了人身解剖圖，摸清楚心臟的部位，然後按圖開了一槍。結果卻失敗，射不中自己的心臟，被救活了。

於是，悲劇化為喜劇，世界文學史上有了這一位普羅文學家。

這一小段情節，使我想到了，有時書本上的知識並不可靠。同時，我也感到高爾基的書獃子

氣。何必一定要把子彈射中心臟，就在太陽穴上開一槍，那不是乾脆得多嗎？

高爾基來自社會最貧窮的最底層，沒有受過甚麼正規教育，竟然也染上這麼可笑的書獃子氣。可見書獃子氣，並不一定是來自學校和書本的。

書獃子氣，有可笑的一面，但也有可愛之處。

三五年，羅曼·羅蘭，應高爾基之邀，訪問莫斯科。訪問後，寫了《莫斯科日記》，記述了他所見的蘇聯的負面陰影。在此書中，他描繪了近距離接觸到的高爾基：

「他是騙不了我的眼睛的……他不想看見，但他分明看見這個事業本身的錯誤與痛苦，有時甚至失落了人性。……我覺得，如果沒有旁人，就我們倆單獨相處時，他會擁抱我並長時間默默地痛哭的。」

羅敏銳的觀察，看見了高也正為蘇聯的負面陰影而痛苦。當時，高極受斯大林寵信，但仍感到痛苦，這是他可愛的書獃子氣。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日

「有理、有利、有節」

這六個字，不少人能衝口而出；望文生義，其意也不難懂。但是，要貫徹到實際的鬥爭中，緊緊掌握分寸，便不是像念出來那麼輕易。

在《毛選》中，這六個字出現很多次。《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針對與頑固派鬥爭的策略，作了詳細的闡述：

「『有理』，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是鬥爭的防禦性。

「『有利』，是勝利原則。不鬥則已，鬥則必勝，決不進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應利用矛盾，不可同時打擊許多派，選擇其最者而首先打擊之。這是鬥爭的局部性。

「『有節』，是休戰原則。適可而止，實行休戰。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鬥下去，不可被勝利衝昏頭腦。這是鬥爭的暫時性。」

讀一讀這些闡述，才會有進一步的理解。

先來談談「有理」。

這是一個羣衆觀點與羣衆路線的問題。自衛和防禦，才容易取得羣衆的同情、支持和參與。有時，「後發制人」，其中就有這個道理。有人曾批評，本港的社會運動，總是被動的和回應式的，就是不了解這個道理。當然，在戰術上的「後發制人」，必須加上戰略上的「先發制人」，才不致於真正的被動。並不是自以爲「有理」，而是羣衆也認爲「有理」；假如羣衆還未有這樣的認識，就要等待，就要去做工作。

這還是一個合法鬥爭的問題。因爲合法，是取得羣衆的同情、支持和參與的很重要條件。所以，應盡可能通過合法的形式、途徑、行動去進行鬥爭。但合法鬥爭，不是合法主義，前者着眼在羣衆，後者是法律的俘虜。

怎樣去解決合法鬥爭和公民抗命的矛盾呢？那矛盾統一在羣衆觀點和羣衆路線上，把羣衆觀點和羣衆路線作爲更高的原則，這才不是合法主義。所以，你不要不攜帶身分證外出，以此去進行公民抗命。

下文再談「有利」和「有節」。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三日

勝利和休戰的原則

前文談過了「有理、有利、有節」中的「有理」。本文來談，「有利」和「有節」。

談「有理」時，提及「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也未必的，要服從「有利」的勝利原則。雖然是人「犯我」，但我去「犯人」必敗，那麼，只好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更重要的還不是勝利，而是「不殆」，不至於陷入危困的境地。「不殆」還可東山再起。

世上畢其功於一役的事甚少，往往積小勝為大勝的居多。在連續眾多的戰役中，未必能每仗都是小勝，由此而積成為大勝的，那麼打不打，「不殆」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則。

勝利的賬，可以從很多方面去計算：政治、經濟、內部士氣、羣衆影響，等等。各方面的得失都要估計，要有一個對充的總賬，不可做虧本生意。

「擠牙膏」，固然要出力，但牙膏筒裏有沒有牙膏，也是必須心中有數的。否則，擠得手

指流血，也擠不出牙膏來——這就不符合勝利的原則。

四面出擊，往往因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局面，這是取勝的大忌。要善於選擇出擊重點。

「有節」，最難的是，準確估計自己的力量可做到的極限，對手後退的底線。有了這樣的準確估計，「有節」便有了尺度。應贏得更多而放棄了，或是過分的奢望，「過猶不及」，「過」和「不及」都是沒有掌握好分寸。

勝利衝昏頭腦，是「有節」的最大陷阱。所以，當勝利時，特別要亮起「有節」的紅燈，必須非常慎重去考慮，切不可輕率乘勝追擊。

「師老無功」，是一些社會運動無疾而終的主因。為甚麼「無功」呢？有主觀和客觀的因素，當「老」態稍呈時，便應休整檢討，然後再出發。要愛護羣衆的積極性，已是「師老無功」，還繼續拚命發動羣衆上陣，羣衆便會作鳥獸散，剩下你孤家寡人。不論「有功」或「無功」，某一時期的休戰都是必需的。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六日

我愛讀的一類閒書

我是讀一點閒書的。推理、懸疑、驚險、間諜小說，是愛讀的一類。

這一類閒書，引人入勝，讀得輕鬆，是一種很好的休息、消遣、娛樂。尤其是，對長時間糾纏於具體事物的邏輯思維的腦子來說，是一種調劑。

這一類小說，其背景，大多是一般人少接觸到的。所以，所展示的場景，可增長見聞知識。

我讀時，有這樣的習慣。每當故事出現新線索，或書中人陷入危急的時刻，我總掩卷，停一停，去想一想。這新線索有甚麼意義呢？是作者爲了迷惑讀者而故佈的疑陣，還是情節發展下去的關鍵呢？假如自己是該書中人，會採取怎麼樣的應變行動呢？這樣想了一想，有了想法，再讀下去，與作者所寫的對比一下。是猜中了，還是猜錯了？是自己有理，還是作者有理？這不單只是一種很有趣的遊戲，而且是一種有益的推理訓練和腦子運動。

這一類小說，很有一些拍成電影。我總覺得原作比電影好看，因為原作比電影的交代清晰細緻得多。假如你覺得電影還不錯，很值得再去看原作；倘若是先看了原作的，電影不看也罷。

我大致上是按作家去選讀這一類小說的。

日本推理小說，我愛讀的作家是：松本清張、森村誠一、橫溝正史等。松的縝密、平實、抽絲剝繭；森的奇詭、刁鑽、出人意表；橫的陰森、悽怨、悲慘欲絕。松的《日本的黑霧》，森的《魂斷天涯》，橫的《八墓村》，都很有可讀性。

約翰·基斯威的作品，全都拍成了電影。《塘鵝暗殺令》、《糖衣陷阱》、《殺戮時刻》、《毒氣室》、《致命內幕》、《造雨人》，我都讀過，很過癮，覺得《殺戮時刻》最好。讀了，對美國的司法制度和法律，得到一些常識。

此外，波洛克的《戈林檔案》，米高·基治頓的《旭日追兇》，約翰·勒·卡爾的《東山再起的間諜》，都吸引我一口氣看到最後一頁。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九日

錢鍾書、楊絳的雋語

錢鍾書是大學問家、學者和作家；其夫人楊絳是翻譯家、劇作家、作家。夏衍曾說：「你們捧鍾書，我捧楊絳！」夫婦都名滿中外。

著作暫且不說，他們的日常談吐，都妙語連珠，機鋒處處，幽默雋永，閃爍着智慧和學養。聽他們講話，如沐春風。

錢提到某人當了圖書館長，接着說：「他當了太監。」聽者未會其意，莫名其妙。他便解釋：太監是管宮女的，後宮裏那麼多宮女，他都不會用嘛！意即此人當圖書館長而不讀書，不會用書。語出，滿座捧腹。

國內十八家省級電視台，擬聯合拍製一套大型電視專題片，名為《當代中華文化名人錄》。第一批三十六人，錢名列其中。電視台人員來電接洽，被楊婉拒。對方最後說：被錄攝的名人，可以拿到一筆可觀的報酬——錢。錢在電話旁聽了，忍不住插話：「我都姓了一輩子

錢，還迷信錢嗎？」

錢八大壽，社會科學院等機構，要爲他舉行學術討論會，他一概堅辭，並說：「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錢，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說些不痛不癢的話。」

訪客提及大談中西文化比較的熱潮。錢很不滿意，說：「有些人連中文、西文都不懂，談得上甚麼比較？戈培爾說過，有人和我談文化，我就拔出手槍來。現在要是有人和我談中西文化比較，如果我有手槍的話，也一定要拔出來！」楊在旁聽了，立即從筆筒中，抽出一把鋒利裁紙刀，放進錢的手裏說，「沒有槍，用這個也行！」

文革期間，有人打小報告，說錢蔑視領袖著作，問他桌上爲甚麼不擺（毛選）？他答：我嫌弄髒了我的桌子。楊聽後大怒，大罵誣告者的陷害，並說：「他如果說這話，肯定不是這樣的口氣。他會說得更俏皮些。」

文革期間，海外曾謠傳錢身亡。外訪時，有人問及此事，錢輕輕地答：人總要死的，現在我只是緩刑執行而已。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本非司令，何故掌兵？

文康廣播局長周德熙，最近出席了全運會，據云：深受愛國主義教育，大為感動。

爲了配合董建華所提出的，要檢討兩個市政局和各區議會的架構、職能和權力，在臨時立法會上，他大嘆自己是「無兵司令」。

他說：現時政府在文化藝術上的開支，達十七億四千多萬元，其中兩個市政局已佔去十四億二千多萬，餘下的款項不多。他建議：把有關資源集中，交由一名局長負責，去貫徹董建華的文化藝術政策。

他要掌握兵權了，他要去打仗了。打的是甚麼仗呢？就是去貫徹特首的文化藝術政策。貫徹這個政策，爲甚麼要打仗呢？因爲預計會有人抗拒。爲甚麼會有人抗拒呢？很可能，這個政策是違反「表達自由」的，是違反人權的。

在過去，兩個市政局即使有種種不是，但在文化藝術政策上，基本上還是堅持了維護「表

達自由」的原則的。有人對此大為不滿，深深不忿，現在趁着主權回歸，便磨刀霍霍。

特區是否要有一個新的文化藝術政策呢？

過去如此，將來也應如此，唯一的政策是維護「表達自由」，促進多元化的文化藝術的蓬勃發展。貫徹這樣的政策，是不必打仗的，文康廣播局局長是毋須掌兵的。周所大嘆自己是「無兵司令」，是一種正常的、健康的現象。假如有那麼一天，這一位掌握文化藝術政策的官員，竟然掛帥，披堅執銳，殺氣騰騰，所承諾的「五十年不變」就變了。大會堂和文化中心，就或會窮年累月地，連場上演八個樣板戲了。

以「陰謀論」去推理，周的這番話，是不是透露了，檢討兩個市政局和各區議會的架構、職能和權力的腹稿中的一個目的呢？政府早已決定削減市政局的撥款，是不是這個「陰謀」的先聲呢？

多謝周所說的話，好讓各界人士和市民，在檢討時多一分清醒，去警惕這個「陰謀」。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消極修辭看《施政報告》

教了四十年書，每年、每月、每周地，批改學生的習作，因而有了一種語文的潔癖的積習。看見錯別字、不通文句，總很有不舒服的感覺。

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提到有所謂積極修辭與消極修辭之分。不少論者，都曾批評《施政報告》缺乏文采，這屬於積極修辭的範疇；我卻降低要求，只從消極修辭的角度，談談其中的遣詞造句、語法等。

全文很長，我只較仔細讀了《引言》和《結論》，這是《施政報告》的開頭和結尾。寫文章，大都很重視開頭和結尾，刻意去寫好。因為，開頭是第一印象，最深刻的印像。先聲奪人，容易給讀者好感，有如初戀的情人是最難忘的。結尾是最後印像，予人回味。有如吃花生米，假如最後一顆是臭的，臭味就會把先前的美味掩蓋，口腔裏只留下了臭味。

先來談談《引言》，共只有十六段。

第(一)段。一現在，我向各位議員……宣讀……第一個施政報告。」這是全文的第一句。

「宣讀」，沒有錯，只是嫌格調低了一些。雖然，大家都知道，〈施政報告〉不是董建華親自執筆去寫的，而且讀前操練過多次，但自己到底是靈魂，總不宜赤裸裸地說自己是去「讀」。「宣讀」，應改為「發表」或「作」。

第(四)段。「……世界經濟的局面，正持續進行巨大的變化。」「進行」和「變化」不配搭，「進行」應改為「發生」。

第(六)段。「……可以把握機遇，發奮向上，使到我們的人生意義，既波瀾壯闊，又豐富多采。」

中文只有「奮發」或「發憤」這樣的詞語，這裏應該用「奮發」。「發憤」出自〈論語〉的「發憤忘食」，指用功讀書。

「波瀾壯闊」和「豐富多采」是有景像的，不宜用來形容抽象的「人生意義」。把「意義」兩字刪去，便妥當了。

篇幅所限，其餘的下文再談。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以致」和「以至」等等

上一篇，從消極修辭的角度，談了〈施政報告·引言〉中的三段，本文來續談。

第（七）段。……也是特區政府制訂與內地關係政策，以致制訂香港長遠發展策略的一個出發點。「以致」是錯了，應該是「以至」。

「以致」，是「由此而令到」的意思。「以至」，是「和」、「與」或「以及」的意思，但含有進一步伸延，由此及彼的含義。

第（十六）段。「由於事關重大，影響深遠。」因為用了「由於」這個詞語，這便不能成為獨立完整的句子。要將句號改為逗號，把此句與下句，聯成一句；或刪去「由於」一詞。

接着談只有三段的〈結論〉。

第（一五四）段。「這些問題，伴隨着施政報告的整個制訂過程，而且，在我未來五年的工作歲月，也一定會時刻常伴左右。」

這一句有兩個問題。一、「伴隨着」的不是「過程」，而是「我」；二、「伴隨」和「常伴」，在一句中用了兩個「伴」字，不但意思重複，而且累贅。改為這樣，是不是好得多呢？「這些問題，不但在施政報告的整個制訂過程，而且，在我未來五年的工作歲月，也一定會時刻隨伴左右。」「時刻」已有「常」的意思，所以，「常伴」改為「隨伴」。

第（一五五）段。「施政報告所制訂的任務，經過我們的努力，是完全能夠做到的。」「任務」和「做到」，並不配搭得恰切，「任務」大多是說「完成」，所以，「做到」應改為「完成」。

同一段。「……擁有如此優厚條件，我們毫無疑問，必定能夠創造出更加美好的將來。」只有「我們」才「毫無疑問」，語氣太弱了。試看看，改作這樣，語氣是否好些：「……毫無疑問，我們必定能夠……」。這暗示了其他的人也認為是「毫無疑問」的。

董特首倡議，港人要精通「三語兩文」，看來單是中文已非輕易。請他起個示範作用，從自己做起，身體力行。

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督轅設宴與毛禁祝壽

「督轅」這個名詞，已是過時的了，應稱前港督府；爲了不超越標題字數所限，只好仍照一些報章而沿用。

本來是只關乎個人的一件小小的好事，竟掀起滿城的小小風雨，變了小小的壞事，我爲某兩人難過。董特首的近臣、謀士、智囊的政治觸覺和智慧，由此可見一斑，真叫人擔心！

由此想起了，毛澤東往往有獨到之處。建國前夕，在他的建議下，中共中央通過了禁止爲領導人祝壽，並以其姓名命名城市、工廠、學校等的決議。「毛澤東號」火車頭，是在這決議通過之前命名的。

這決議，似乎至今仍在執行。所以，中國沒有像蘇聯的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等城市，而後來又恢復舊名的反覆。

毛建議禁止祝壽和以領導人姓名命名，主要是針對自己。這樣看來，似乎很謙遜克己，但

另一方面卻又大搞空前絕後的個人崇拜，樂受山呼，把「毛澤東思想」寫到《黨綱》和《憲法》上，兩者是極端矛盾的。上述的獨到，可見只不過是一種權術而已，並非發自內心的真誠。

生日，對一個人自己來說，還是有一點點意義的。從唯物的角度來看：在這一天，一個人來到了這個世界，他又在這個世界活了整整一年，又向人生的終極接近了一年。這是他的一生的，一個又一個小小的里程碑。能從這個角度去反思，不是有一點點的意義嗎？這是「祝賀」，並不包含得了的意義。

孔子說：「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雖年老，但仍不倦、精進、樂觀，這是好的一面。但過分，則會不量力而為，有所戀棧，故步自封，恃老賣老，這樣，大多會引出壞的後果。

孔子又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安國注云：「得，貪得。」《淮南子·詮言訓》云：「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暴，老則好利。」「貪得」與「好利」，義近。年老者，在生日那天，想想孔子這句話。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三日

從阿Q精神到活命哲學

據北京朋友的來信，劉再復告訴我們：在國內知識分子中，流傳「一個中心、兩個基點」的新版本——「以健康爲中心，糊塗一點，瀟灑一點」。

讀了，心裏有隱隱的、深深的悲哀和苦痛。

這新版本，實質是「活命哲學」的縮影。所謂「以健康爲中心」，就是想長命百歲；所謂「糊塗」，就是對是非黑白，視而不見，置若罔聞；所謂「瀟灑」，就是少問世事，遠避麻煩，不計榮辱，只求逍遙。「糊塗」和「瀟灑」，大有諸葛亮未出草廬時，「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之概，這是一個爲活着而吃飯、爲吃飯而活着的人生觀。

知識分子，向被視爲民族的良知和脊梁。現今，竟變成了奉行「活命哲學」的動物，孰令致之！

我由此想到，聶紺弩曾論及「阿Q精神」。

羅孚兄在《聶紺弩詩全編·全編後記》中，寫道：「紺弩自己說，他不止談話、滑稽、打油，更有着阿Q氣。……紺弩又說，「阿Q氣是奴性的變種，雖然不是好東西，但能以它為精神依靠，從某種情況下活過來，它又是好東西。」」

魯迅創造了一個千古典型——阿Q。阿Q的「精神勝利法」，向被認為是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為甚麼竟又變成了，精神依靠和讓人活過來的好東西呢？

原來，勞改場、牛棚、牢獄裏，一些在受着折磨的人，冷眼看見某些人的醜態、一些曾整人者也在被整、一些折磨過自己的人也在被折磨，……於是，以阿Q精神來自我慰解，作為自我心理治療的妙藥，把身受的冤屈苦難美化。這是魯迅和他的讀者，始料不及的罷？

從聶的阿Q氣，到新版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點」，已三十多年了。這是一個更大的倒退，因為「精神勝利法」，還有「精神」，還要「勝利」；新版本，有的只是行屍走肉。孰令致之！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六日

「戒之在得」的「得」

在《督轅設宴與毛禁祝壽》一文，我曾引用了《論語》中的一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並同時引用了孔安國注「得，貪得」，以及《淮南子·詮言訓》「老則好利」，去解釋「得」的意思。

這兩個舊注，我是不愜意的。我已一步一步踏進「血氣既衰」的人生階段，對這個「得」字，有自己的體會。「戒之在得」，就是要警惕背上思想包袱，「得」就是思想包袱。

「及其老也」，思想包袱裏，會走進了一些甚麼沉重的東西呢？

首先，是排資論輩。年輕時，「資」淺「輩」低，不會去排，去論。多吃了那麼多年飯，不管是否有真的本錢，就會只憑那一把年紀，倚老賣老，未能平等待人，不尊重那些年紀未有一把的。其實，「老」是人的弱點，已不及年輕人那麼精壯，有甚麼可恃、可排、可論呢？

其次，是經驗。閱歷多了，自然有點經驗。但要自問：一、是否真的有經驗？二、這些經

驗是否可貴有用？三、時移勢易，這些經驗是否仍然可貴有用？四、任何經驗，都不能硬搬，要看當前具體情況，你對此情況是否掌握得準？

再其次，是過去的成绩。即使過去真的有什麼成绩，也不要念念不忘而自滿。過去的成绩，當時已有評價；當前的工作，還要看你做得怎麼樣？決不能以昨日的功，折今日的過。當前的工作，做得不好，就是不好，不可以此寬恕自己。

最後，是已失去「只爭朝夕」的銳氣。這是一個人生的心理矛盾：年輕人儘管來日方長，但做起事來卻很心急；年老人儘管手上歲月已不多，但卻反而常打慢板。一年，對二十歲的青年，是一生的二十分之一；對七十歲的老人，卻是七十分之一。對比之下，是二與七之比，老人自然覺得時間過得快，不把一年半載放在眼裏，長不出銳氣來。

以上所寫，純是一種自省，引為鑑誡而警惕，以求背上的包袱少幾塊石頭。我更希望，不論友敵，時加鞭策。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九日

「校長，畀次機會我！」

原在澳門的一家甜品店，以「薑汁撞奶」馳名。多年前，在九龍開了分店，我不時去光顧。

一個晚上，我和幾個朋友，在附近吃過晚飯，又到那分店去吃「薑汁撞奶」。

在「埋單」時，從水吧裏走出一位年輕的夥計，來到桌旁，靦靦覷覷地說：「校長，畀次機會我！」

我聽了，愣住，覺得這話很熟耳，但一時又不明白，這位夥計所說的是甚麼意思。

他又再說一遍：「校長，畀次機會我！」就在這時候，另一位夥計走過來，說：「華叔，他是你的舊學生，他請客，他已替你們『找數』。」

我恍然大悟，欣然接受了這位舊學生的盛意，並問了他：哪一年畢業？畢業時，班主任是哪一位老師？記得有哪些同班同學的姓名？我努力在腦中去找尋，是否還有一些關於他在校時

的印象。

在回家的路上，我猛然憶起，那一句話，爲甚麼很耳熟。

我做了三十一年小學校長。老師往往把一些犯了較嚴重過失、屢誡不改、頑劣難教、死蛇爛歸的學生，帶到校長室來，要我加以斥責和處罰的。其實，我並不比其他老師嚴厲，但學生大多較怕校長，這時，不少流露悔改之意，就說：「校長，昇次機會我！」我聽了這話，從寬處理的居絕大多數。

個多月後，我又去光顧這甜品店。望望水吧內，找不到那位舊學生，便問其他夥計，他是否休假？

答道：「不是，他不是本店的夥計。白天，他在尖東的一間酒店任職。爲了想創業，開一間小甜品店，晚上便來學師，特別是想學製「薑汁撞奶」。幾天前，他已滿師離開。他不多說話，很勤力，是個生性的年輕人。」我聽了，很高興！

我已不記得，這位舊學生在校時，是否也說過「校長，昇次機會我」這句話。祝他創業成功！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吳宓的第三個二十八年

倘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心靈有所顫動，我向你推薦《心香淚酒祭吳宓》，你的心靈將會再一次顫動。心靈不時顫動一下，才不易白日昏昏入夢。

吳宓是名學者和教授。他與陳寅恪是生死之交的知己；他的最後二十八年，比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更為悲慘和使人扼腕。

此書的作者是張紫葛。他曾任宋美齡的秘書、國內各大學教授。年前，他的另一著作《在宋美齡身邊的日子》，在港出版。他的《心香淚酒祭吳宓》，只記敘他與其直接接觸的吳宓，所寫的都是目擊耳聞的實事，可謂第一手資料。寫此書時，他已雙目失明，只憑驚人的記憶力和毅力，在紙上摸寫，經妻子整理而完成。他力疾而完成此書，當是強烈的心願在鞭策。我曾寫過《另類的「及身而散」》，就是指這樣的書。

書名原定為《吳宓的第三個二十八年》。四零年，作者與吳宓在重慶討論《易經》。吳宓

說：他曾多次以《易經》測算一生，竟然每次的預測結果相同。他得年八十四歲，可分為三個二十八年。第一個由出生（一八九四）至留美返國（一九二一）；第二個至當時的九年後（一九四九）；第三個至生命終結（一九七八）。果然，他在一九四九年，開始了一生中最悲慘的一段，而且確於預測的一年，「如期」壽終。

最感人的，是記敘吳與其後妻鄒蘭芳的事。他們結婚不到幾年，鄒因病逝世。她死後，室內擺設，全不改動；家中設有靈位，按時拜祭；每餐也多放一副碗箸，每看電影必多購一票，虛位以作悼念。

人常慨嘆：「人心不古」。至於所期望的，「古」的「人心」是怎樣的呢？從吳宓，你可以看到這「古」的「人心」的一面。他早年留學美國哈佛，毫不洋化，卻很「古道熱腸」的「古」。

《心香淚酒祭吳宓》，很值得一讀！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魯迅和傅雷的譯文比較

陳原在《黃昏人語》一書，曾提及何滿子所抄錄的，來自同一原文的兩段不同的翻譯。

「先過了今天再說。對於每一天都得抱着虔誠的態度。得愛它，尊敬它，尤其不能侮辱它，妨礙它的發芽滋長。」

「生活於今日吧！無論對於何日，都要虔誠，愛它，敬它，不要褻瀆它，而且不要妨礙那開花的時候的到來。」

兩位譯者，都是鼎鼎大名的高手：魯迅和傅雷。只要對其中的一位的文字風格，稍為熟識，便可以很容易分辨得出，哪一段是誰的手筆。你能分辨得出嗎？

由於我愛讀魯迅的文字，所以一眼便得到了答案。文字寫出了一種風格，叫人一讀就看出，這才是風格。

有人說：這兩段譯文，一是散文，一是詩。你認為對嗎？你認為哪一段是散文，哪一段是

詩呢？的確，從遣詞造句，到句子的節奏，兩者都不大相同，一近詩，另一則不近。

不知原文是甚麼體裁，我們無從判斷，是該譯為散文還是詩？不過，從內容來看，譯得語態高亢一點，詩意濃厚一點，是不錯的。

如果從翻譯的「信、達、雅」的標準來衡量，兩者都是有餘的。

也許是由於偏愛，我把魯迅的譯文，放在傅雷之上。

「生活於今日吧」，不是比「先過了今天再說」，更融入下文那積極的情感嗎？

「褻瀆」這個詞語比「侮辱」用得好。前者比後者含蓄、有力而又內涵更廣。

「那開花的時候的到來」，比「發芽滋長」更有詩意。「開花」比「發芽滋長」，看得更遠，更富美的形象。

我不用揭謎，讀者大抵已清楚，哪一段是魯迅或傅雷的譯文了。我將兩者之一，置之在上，是否有偏見呢？尚祈賜教！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從「鼓掌通過」看董特首

「設宴祝壽」，鬧了一場大大小小的風波；「鼓掌通過」，又鬧出一場大大小小的風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禁使人慨歎：「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那「春」是甚麼？大家去想一想。

回歸前後，不少國際傳媒，問我對董的印象。我說：他是誠懇的——很誠懇地去保守，保守得很誠懇。

讀關於他的生平的介绍文章，得知他於六九年自美返港，繼承父業。至八二年，公司便陷入危機，負債二百多億元。後來得各方扶助和個人努力，力挽狂瀾，穩住了，但危機畢竟是在他的經營下發生的。危機為甚麼會發生呢？我以為主要是他昧於大勢，航業已經衰退，他還是很誠懇地保守着父業。且看包玉剛，棄船上岸，進軍地產，不是「更上一層樓」嗎？

其實，他不必參加人大的選舉會議，更不必當上主席團的主席。我相信他不會熱衷於此，

只不過在上邊的「勸導」下，很誠懇地接受了，勉為其難而已。結果，被「擺了上枱」。連這樣的「勸導」，也不能堅拒，又怎樣去貫徹「一國兩制」呢？

董橋勸他讀點閒書，但我猜測他，連報章也少讀，更談不上一些專欄，或聽「風波裏的茶杯」之類的節目了。否則，他為甚麼不知道十多年前，基本法諮委會已開過了這樣的一場風波；而且這一年來，「鼓掌通過」已又被港人大為詬病呢？他是脫離羣衆的，完全掌握不了港人的脈搏。

那天，他坐在主席台上，作出「鼓掌通過」的決定，沒有別人的「勸導」，自發地「以我為主」，可見他已經完全融入了，這一種與港人格格不入的政治文化。這才使人憂慮！他是否擔心正式表決，通過不了，或是有幾票反對和棄權的噪音呢？

這種政治文化的融入，不但叫港人側目，恐怕對從不習慣這樣的公務員，也產生負面的影響。要不是從頭學習，趕上去；就是內心不服，有了離心。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微瀾中的「惻隱」之心

「設宴祝壽」一事，餘波中有這麼的一陣微瀾——對於輿論的批評，兩三個論客以「秋後算賬」喻之。這個比喻，既有歪事實，且從修辭到邏輯都不倫不類，但於其中卻見冒充慈悲的「惻隱」之心。

這事告吹了，並沒有成爲事實。所以，頂多只能說是「秋前」，何來「秋後」呢？既然「買賣」做不成了，更談不上「算賬」。即使是多麼尖刻的批評，只是「遏止」了一件不合理的事件的發生而已。這樣的輿論，不管針對的是大事還是小事，在此時此刻此地，都很有積極意義，爲甚麼喻之以「秋後算賬」這樣的貶詞呢？難道它的對立面，是值得褒的嗎？「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這不是輿論的天職嗎？這次，的確發揮了這樣的作用，這是必須加以褒而不是貶的。

假如這次發揮了「遏止」作用的輿論，在某時某日之後，受到懷恨在心、藉機借故惡意的

報復，這才是真真正正的「秋後算賬」！

不可隨便扣「秋後算賬」這樣的帽子。

首先，只有掌握了權勢的人，才能去「秋後算賬」，無權無勢者只會是被「算」的對象。言論自由，是一種人權，並不是權勢。你可行使這樣的人權，我也可行使這樣的人權，否則，就是侵犯了人權。

其次，「秋後算賬」是很慘酷的報復。王丹和魏京生等，就是受到「秋後算賬」的了。批評幾句，不傷皮肉，只冒犯了某些妄自尊大的威嚴，離真真正正的「秋後算賬」，何止十萬八千里？

同情弱者，是人之常情。但要看一看，你去同情的人，是個強者還是弱者？不要只看見那一直的強者，偶然不再那麼強了，便貿貿然去同情他。這豈止是跳樓貨的同情，而是隱惡地去助紂。

孟子以惻隱之心，去推論性善。性善並不是無是非觀，惻隱是不能不分是非的。請收回那個比喻！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兩姊妹的故事

五十年代初，我剛從教育學院畢業，到小學去任教。在學生中的兩姊妹的一件事，很是感人。我一直藏在心裏，想寫成小說，但自知沒有這樣的才華，始終沒有動筆。現在，數十年過去了，大抵小說將會胎死腹中，就簡略地把這件事，以這篇短文記下來。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香港，市民難於生活下去。本是朋友的兩家人，各有一小女嬰，相差只一歲。這兩對夫婦都要投奔內地，路途艱險，不便與這兩個女嬰一同上路，於是，就把她們交給一位膝下猶虛的老工友收養。

老工友夫婦，對這兩個女嬰，視如己出，即使在戰爭那麼困難的日子，也沒有讓她們捱饑受苦。

戰爭結束了，那兩個女嬰的親生父母全無信息。她們漸漸長大，入學了，一直不知道自己是被收養的。我認識她們的時候，一個讀五年級，一個讀六年級，都是勤奮聽話的好學生。

不知怎的，大抵是聽了親友竊竊的傳言，首先是姊姊知道了：她們都是被收養的，那兩家人的一家已遭不幸，另一家在戰後卻去了美國。這仍在的一家的夫婦，和老工友聯絡上，不久便回來，領回自己的骨肉。不久，妹妹也知道了這信息。老工友夫婦，沒有對兩姊妹透露過甚麼，只是變得很沉默，常常對着她們無端下淚。

姊妹兩人私下談論這事，姊姊顯出很興奮，對太平洋彼岸的黃金世界，充滿憧憬；但妹妹卻不捨得離開養父養母，並說，即使回來的是她的親生父母，她也不會去美國。

的確有如晴天霹靂，從美國回來領回自己的骨肉的，是妹妹的爸爸媽媽，姊姊的親生父母已在戰亂中死去。姊姊陷於極度失望，幾乎整個人崩潰了；妹妹卻信守說過的話，堅決不肯離開老工友夫婦。最後，這對從美國回來的夫婦，收養了姊姊，帶去了美國，讓自己的親生女兒留在香港。

這兩姊妹，現在已有了她們自己的孩子和孫兒了罷？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胡志明的老實

在各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中，胡志明可算是，較為老實、樸素和平易的一個。單看他那山羊式的鬍子，就沒有列寧和斯大林的那麼霸氣。

生前，沒有甚麼驚世駭俗的捭闔縱橫、英明神武、大搞個人崇拜的言行；身後，也沒有甚麼供人議論的劣跡醜聞。在其後的幾代接班人，也沒有給人「強人」的印象，這是否他的遺風呢？

前蘇聯外交家和漢學家——費德林，在其所著回憶錄（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記述了胡志明的兩件小事，使人從側面看到了胡的老實。

伏羅希洛夫訪問河內，被接待住在極其奢華的前法國總督的官邸，胡志明曾多次到這官邸去拜訪他。伏爲了禮節，要求去回訪。胡認爲不必搞這樣的繁文縟節，一口婉拒了。伏再三提出這樣的要求，胡還是沒有答應；最後，伏惱火了，胡才勉強讓步。

原來胡的住所非常簡陋，連放椅子的地方也沒有，客人只好坐在草席上。胡的辦公室，只有一張辦公桌和一張椅子；臥室只有一張舊沙發和一張作牀用的草席。伏看見了，慚愧得老淚縱橫，要搬離所住的豪華官邸。胡聲音發抖，差點跪下來，求他不要這樣做。

胡曾秘密訪問莫斯科。與斯大林會談時，特地帶了一本封面印有斯大林像的《星火》雜誌，請斯在自己的像下簽名留念，斯爽快地答應了。這本雜誌，在那天睡前，胡還看過，放在牀頭。

但第二天醒來，卻不翼而飛。他追問了接待人員多次，都查不出下落。在離開莫斯科的機場上，他還對費德林說：「太可惜了，要是我再有機會見到斯大林同志……他一定會再給我一個簽名，這是多麼寶貴的紀念呀！」

費心知肚明，斯不想胡手裏拿着兩人曾會見的證據，就下令把它偷回去。胡連這一點也沒有想到，與斯相比，是不是太老實了呢？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我怎樣教小學生作文

寫作，是語文程度的綜合而又集中的表現，所以，是語文的教與學的重點。

我一直在小學任職，只能談怎樣教小學生。

作文科，是教師吃重的工作，因為要評改習作，反而不大去教。往往因而變成了是「改」作文，而不是一「教」作文，這是嚴重的本末倒置。「改」有甚麼教學效果呢？有多少學生，是因為教師的「改」，提高了寫作興趣和能力的呢？

興趣，是學習的動力和潤滑劑。五段教學法，也許已經「老土」，但其第一階段「引起動機」，還應該是很有效的方法。首先，要引起學生對作文題目的興趣。

寫作，是思想感情的表達；表達與思想感情是互動的。有所表達才去寫，在寫的過程中，思想感情也因而深化豐富。動脈流出的是鮮血，噴泉流出的是清水，溝渠流出的是污物，沙漠只是沒有點滴的乾涸。假如學生的腦子像老驥，也就沒有寫的興趣，寫不出東西來，只會被迫

嘔吐出垃圾。

所以，啓發思想，激勵感情，培養觀察分析能力，提高寫作興趣，是教好作文的不二法門。

命題，並根據題目去作引導，是最重要的一環。多花時間精力，去想想怎樣命題和去作引導，是比去「改」有思想得多的。稍後，我將會寫出幾個實例來。

一位同事，以《談音樂》命題。我對他說：你自己試去寫一寫，會有甚麼可寫的？倒不如改為《我最愛唱（或愛聽）的一首歌》罷？小學生應以學寫記敘文為主，寫他們接觸到的題材。有些題目，可一周前先告訴學生，叫他們事先去觀察，搜集材料。例如：《早晨的公園》、《放學回家的路上》、《小息的時候》等。

不少教師惜分如金，評分只在六十至七十之間。不用自己掏腰包，為甚麼不慷慨一點，去作鼓勵呢？我是曾給學生九十五分的。選出好的「貼堂」，也很有作用。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

一篇九十五分的習作

我與一位同事，分別任教同級的甲乙兩班。按校方的規定，作文的題目，輪流各出一次。有一次，他以《我的志願》命題。這是一個很普通的作文題目，自己讀書時也作了不少次，覺得很乏味，寫的多是敷衍老師的陳腔濫調，但是卻不能不硬着頭皮，把這四個字寫在黑板上。

我向學生發問：你們是不是寫了希望做總統、大官、富翁、醫生、律師、工程師……，將來就會做得成呢？有些答，只要努力是會成功的；有些答，未必，只是一個願望；更有些說，只是爲了表示有志氣，不給人看小，認爲把志願說得越大越好。

我接着說：有興趣，才會努力；努力才會成功。如果寫上述的，我不會給高分；要寫你們最有興趣去做的事，越普通的越容易成功的越好。我又問他們：你們對甚麼最有興趣，爲甚麼有興趣？

真的百花齊放了：有的愛游泳，要做救生員；有的愛嬰孩，要做托兒所的保母，有的愛踢

球，要做足球明星；有的愛花，要做花農；有的愛養金魚，要開金魚店……。

我收到了一篇這樣的習作：

我愛鄉村，我愛騎單車。我希望在鄉村裏，做一個每天騎着單車，把鮮奶和報紙，送到家家戶戶的人。

不論風雨陰晴，我沐着晨光，或冒着風雨，騎着單車，在靜寂的小路響着清脆的鈴聲，去到每家每戶。他們大多還在睡夢中，不知道我來了。我默默地把鮮奶和報紙，放在他們的門簷下。鮮奶給他們豐富的營養，報紙給他們豐富的知識。

一年一年地過去。孩子們健康地成長起來，年輕人到外面更寬闊的世界去。我曾為他們服務過。

現在憑記憶重寫，我當然作了文字上的修飾，但內容百分之一百是這個學生的。我的評分是九十五；評語是：這是一個多麼美麗、溫馨和有意思的志願啊！我還記得，這個學生是姓金的。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六日

聖誕老人送洗衣粉

聖誕節近了，我出了〈聖誕老人的禮物〉這個題目，給小五的學生作文。我先作這樣的開場白：聖誕節的晚上，聖誕老人駕着鹿車，滿載着禮物，從老遠的北極來到香港。他要送給每一個小孩子一件好禮物，不同的小孩子送給不同的禮物。甚麼禮物，他都有。

我接着問：小孩子們住在不同的地方，你們可以舉出來嗎？我把答案，記寫在黑板上，列為第一組——居住地方：木屋區、半山洋房、徙置區七層大廈、一家八口一張牀的小房間、鄉村的小屋子、露宿街頭……。

我又問：他們有不同的家庭環境，你們可以舉出來嗎？記寫在黑板上的答案，列為第二組——家庭環境：富有的、貧窮的；兄弟姊妹衆多的、獨生的；父母雙亡由外婆撫養的、父親嗜賭常常喝醉酒的；被父母溺愛的、受後母虐待的……。

我又問：他們有不同的個性和優缺點，你們可以舉出來嗎？記寫在黑板上的答案，列為第

三組——個性和優缺點：驕傲的、孤獨的、懶惰的、勤奮的、自私的、好動的、自卑的……。

我讓學生們，展開思考的翅膀，在想像的天空飛翔。

我總結了：你可在第一、二、三組各選出一項去寫，寫出聖誕老人送給這個小孩子怎麼樣的禮物。

一個學生寫出了一個這樣的故事：

聖誕老人來到了徒置區的一個小房間。小孩子睡着了。他拿出小孩子的襪子來，要把禮物放進去。這襪子很骯髒，多天沒換沒洗，臭得很。聖誕老人就在襪子裏，放滿了「新奇洗衣粉」，還留下一張小字條：「小孩子要養成愛清潔的習慣。襪子要常洗常換，這麼臭，不怕同學笑嗎？送給你洗衣粉去洗襪子！」

我的評分是九十二；評語是：你很有幽默感，這是一個別出生面的故事！你想得到的聖誕老人禮物是甚麼呢？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九日

笑中有淚的街頭一幕

我把〈街頭的一幕〉這個作文題目，寫了在黑板上，便開始對學生作引導。

先解釋「街頭」：這不是戶內，也不是郊外，這是都市戶外的一個角落。接着，叫學生舉出，算得是街頭的地點。這是他們很輕易回答的，而且一個啓發另一個，越說越多：戲院門前、巴士站、小販聚集區、靜寂的街道、報販攤前、大牌檔、後巷……。

再去解釋「一幕」：這是一齣短短的戲。戲要有戲劇性、故事性，能吸引人看下去。

接着我說，戲有喜劇、悲劇、趣劇、鬧劇、默劇、悲喜劇等。又問學生們懂不懂得，這些不同的戲有甚麼分別，試舉出例子來說明。於是，他們舉出了：車禍、乞丐行乞、街頭賣唱、警察捉小販、搭巴士排隊因「打尖」吵鬧起來、小扒手被捉住了、小學生賣旗籌款、老婆婆過馬路……。

最後，我提醒他們，要點出時間：清晨、正午、傍晚、還是深夜。

一個學生寫了一個這樣的故事：

兩個理髮師在街頭擺檯，拿着剪刀，「悉索悉索」地替顧客剪髮，頭髮散落在地上。微風吹來，地上的頭髮隨風飛起。

一個賣豆腐花的小販，來到附近，揭開盛豆腐花桶子的蓋，大聲喊道：「香滑靚豆腐花啊！」

一陣微風吹來，把地上的頭髮吹到豆腐花桶裏去，把豆腐花弄髒了。小販哭着，要那兩個理髮師賠償。他們說：你說得出，這是誰剪下的頭髮，我們便賠。

爭吵引了許多路人圍觀。一個圍觀者，用報紙摺成一個小袋子說：頭髮分不出是誰剪下的，這小販血本無歸，請大家樂助。路人紛紛捐錢，那兩個理髮師也捐了。捐了不少錢，爭吵完了，路人散去。

我為這習作，加上一小段結尾：「兩個理髮師又開始工作，剪刀「悉索悉索」地響，微風一吹，頭髮又在空中飛揚。」與開頭呼應，給人餘味不盡之感。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我今年的聖誕卡

八五年之前，我幾乎沒有寄出過聖誕卡。這一年，參選立法局而當選，爲了表示對助選義工的一點小小謝意，買了立法局特製的聖誕卡寄給他們。這聖誕卡，以我的標準來說，價錢並不便宜；而且，我不喜歡其設計。於是，翌年我便自行印製，至今已第十二年了。每年，選出一些詩句，作爲卡的內容。今年的內容，是集龔自珍句七絕四首。

去年深秋，目睹臨立會、特首產生的醜劇，連場上演。恰巧羅孚兄贈了一本《龔自珍編年詩註》，翻了一翻，遂集句以抒懷。這四首集句如下：

(一) 白日西傾共九州，魚龍得意舞高秋；萬人側目千人諾，團扇才人踞上游。

(二) 一笑勸君輸一着，美人掉鬮計頻仍；中門一步一荆棘，奇古全憑一臂撐。

(三) 且莫空山聽雨去，隔簾誰報雨沉沉；照人膽似秦時月，攢杖觀濤得幾人？

(四) 我所思兮在何處？江東久隕少微星。不容明月沉天去，東海潮來月怒明！

聶紺弩曾對晚輩說：「自己講自己的詩就沒有詩意了。」集句，可以不算自己的詩，我不妨對這四首集句，略作解釋。

第一首。「白日西傾」，帝國斜陽也。「共九州」，回歸祖國也。「魚龍」漫衍，宮廷之獸戲也。「團扇才人」，乃寵幸之臣。

第二首。「一笑」，對游說置之一笑。「美人」，亦即蛇蠍。「中門」，正道也。「奇古」的「古」，是「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古道熱腸」的「古」。

第三首，「空山聽雨」，休隱也。「秦時月」是專制的黑夜，正考驗着人的肝膽。「撰杖」，因年老須扶杖而行。

第四首。「少微星」，處士也，喻硬骨頭的知識分子，如魯迅。「明月」，喻中國的民運，雖處低潮，但高潮必將到來。

我把最後的兩句，「不容明月沉天去，東海潮來月怒明」，以毛筆寫了，印在封頁上。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魯迅講性教育

香港已推行性教育多年，至今尚未蔚然成風，不時還會遇到一些障礙。你能想像到，在距今近九十年前的大清內地學校，向學生講性教育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嗎？

三六年，魯迅逝世，夏丏尊寫了一篇追悼文章《魯迅翁雜憶》，記述了一九零九年，魯迅在杭州兩級師範學校任教，給學生講性教育的情形。

那時，魯迅教授生理衛生。

學生請求他加講生殖系統（亦即性教育的初階）。他坦然答應了，但向學生提出一個條件——聽講時，不許笑。他還解釋說：「在這時候，不許笑是個重要條件。因為講的人態度是嚴肅的，如果有人笑，嚴肅的氣氛就破壞了。」

講授的反應果然很好，別班的學生因為沒有聽的機會，便紛紛來索取油印的講義。魯迅把剩下的給了他們，但說：「即管拿去，但恐怕你們看不懂。」

原來魯迅的講義寫得很簡，而且故意用了許多古字。例如：用「也」字表示女陰，用「了」字表示男陰，用「糸」（糸，少了下面兩旁的點）字表示精子。諸如此類，對無文字學素養，而又未曾親自聽過講授的人來說，有如天書。

魯迅講性教育和這份油印講義，在當時的教育界頗為哄動，傳為珍聞奇談。

從這件事，我看見了魯迅的幾個特點。

一、無畏的精神。凡是正當的事，就毅然去做。不管那時候的風氣多麼封閉，但他認為性教育是應該講的，就答應去講。這是「橫眉冷對千夫指」的精神。

二、接納學生正當的請求，還別出心裁寫印講義。這是「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

三、「不許笑是個重要條件」，這反映出他觀察分析事物的精到深刻，抓住關鍵，一針見血，有如他那匕首般的雜文。

魯迅是可敬的。大處可見，小處亦可見。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個難忘的聖誕節

任教小學九年後，於六一年，我被校友們推舉，出任校友會開辦的小學的校長。學校位於俗稱「雞寮」的徙置區，居民全是社會中最貧苦的一羣。

第一年，學校沒有畢業班。第二年，派往參加升中試的學生，全軍盡墨，沒有一個獲派中學學位；第三年，也僅得兩名。同事們說：徙置區的孩子，由於家庭背景關係，總是比不上其他地區的孩子。

我有點不服，要為這些孩子爭一口氣。第四年，我親自任教六年級的中、數兩科，並由一位教學認真、充滿愛心的同事擔任班主任，兼教英文。升中試，只考這三科。

我自編教材、補課，並為了調劑學生的緊張學習生活，特別安排了豐富的課外活動。每兩個月，郊外旅行一次；每周都有球類比賽、問答遊戲、集體遊戲聯歡等康樂活動。我利用假期做家訪，了解學生的家庭背景，好好地啟發和鼓勵他們。在冬至那一天，我家訪時曾在一個學

生家裏吃晚飯，一同過節。在那不到二百平方呎的小房間裏，地上放一個蘋果箱，鋪上一塊板，便是飯桌，大家坐在矮椅子上。

聖誕節來了。我邀請了班裏成績最好的六個學生，三男三女，還有那位班主任，去玩一天。午飯後出發，我們乘纜車上山頂，學生們都是第一次坐纜車和到太平山。在山頂遊覽了一周，坐巴士下山，到大華戲院看五點半那一場的卡通片《石中神劍》。最後，到車利哥夫餐廳吃聖誕大餐。不但是學生們第一次吃聖誕大餐，我也是，而且是唯一的一次，以後便再沒有吃了。學生們都吃剩了食物，我請夥計打了包，讓他們各自帶回家去。

這一年共有三十九位同學參加升中試，全部考上官津補中學學位。上述的六位同學，後來四個進了大學，現有三名在港，兩名早已出國，一名失去了聯絡。

這是我的一個難忘的聖誕節。那位班主任，幾年後不幸病逝。這麼多年來，我不時在夢中，與她默默不得語地相遇。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貧賤行樂」之一

張中行在《負暄三話》，向讀者推薦了兩個「貧賤行樂」的方法：其一是作打油詩，其二是「集句書聯」。前者易明，後者即「自己集句，請名家書聯」，珍藏着不時拿出來欣賞。

我未至於貧賤，不會作打油詩，但偶爾也「集句書聯」，頗以為樂。但與張有不同之處：有時自己集句，有時則錄取別人的集句；由於不認識甚麼名家，且也喜愛寫字，便全是自己動手；寫了，都送給友人。

多年前，為「港同盟」籌款，節取梁啟超的集宋詞，書寫了「更能消幾番風雨（辛棄疾），最可惜一片江山（姜白石）」一聯，在餐舞會上拍賣。一位朋友雖出高價，仍未能投得，但也將出價的巨款捐了出來。事後，我多寫一副送給他。這一聯，不少人有共鳴，好幾位朋友也囑咐我再寫。

「今日不揮閒涕淚，文章合有老波瀾」（龔自珍），這是送給羅孚兄的。我們以前雖曾見

過面，但一直到他幽居北京十年後返港，在《九十年代》雜誌的周年宴會上，我剛好坐在他旁邊，才初次與他交談。席間，談及龔詩，我集了此聯，說稍後寫了送給他。上聯指他兩代的遭遇，下聯渴望他仍揮健筆。

「恥與蛟龍競升斗（龔自珍），卻成遷客播芳馨（魯迅）」，這是送給金堯如兄的。他移居洛杉磯後，我才第一次與他見面和交談。上聯喻他離開了自以為兇險之地，下聯期待他雖身處異邦，仍能發揮餘溫。

「十萬狂花如夢寐（龔自珍），一枝清采妥湘靈（魯迅）」，這是送給一位朋友的親家的。他早歲回國習醫，理想破滅，其後返港，再移居灣區。上聯喻其往昔的壯志，下聯賀其有一位賢內助陪伴晚年。

「馨香盈懷袖，慷慨有餘哀」（《古詩十九首》），這是送給年輕時的一位戰友的。他萬念俱灰，聲言今後不問世事，移居楓國去了。此聯，「懷袖」對「餘哀」，不工整，且「懷」與「餘」都是平聲，但我卻是很喜愛的，因能道出心中的一些感受。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關於張中行

愛讀周作人的讀者，我向他們推薦張中行。港人可能對他陌生，尤其是年輕人，但在國內，他卻是極受推崇的學者和作家。

他的文學風格，七分酷肖周作人。平實、沖淡、深入而親切，娓娓道來如閒話家常，饒有韻味，且沒有周的那種微澀。李澤厚曾在《華夏美學》中，談及禪宗對中國美學的影響：「張對佛學深有研究，大抵因而也受到一定的感染。但他不是佛教徒，最常說的一句話是：『天命之謂性』。」

現在，他已是八十八高齡了。三六年，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畢業，曾教中學、大學，任編輯。

著作的扉頁，印有《作者小傳》這樣的幾句，相信是他的自述：「學術方面興趣廣泛，博覽，古今中外，人推為雜家。較專者為語文、中國古典、人生哲學。勤於寫作。自云亦忠於寫

作，不宜寫者不寫，寫則必以真面目對人。」

「以真面目對人」，的確是他的文字的本色。本色，就是很重要的特色。

人稱他為「瞎翁」，因他出版了三本散文集：《負暄瑣話》、《負暄續話》和《負暄三話》。「負暄」，即曬太陽，他把收在集中的文章，比喻年老人在籬下曬太陽時的聊天。

我最初在《讀書》月刊上，讀到他的文章，即甚為喜愛。「更能消幾番風雨，最可惜一片江山」這一聯，就是在這雜誌上讀到，他拿了去託名編輯鍾叔河書寫的。後經羅孚兄指點，原來出自梁啟超的《苦痛中的小玩意兒》一文，節取了其集宋詞的對聯中上下聯的各一句。

羅還披露了，他是《青春之歌》作者楊沫的前夫。《青春之歌》是帶有自傳性的小說，如羅所說屬實，則讀過這小說的人，大可在故事的前半部找到張年輕時的影子。

作家老鬼，是楊沫的兒子，據他和張的年齡差距去推測，兩人應沒有血緣關係。

上述三本散文集，可在本港書肆覓得，而《說夢樓談屑》和《流年碎影》，則未見。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張中行談周作人

因人廢言，是「左」的表現，是人權的一種壓抑，不論言者已故或尚在。所謂「一言」，就是表達的自由，加以踐踏而廢之，雖然言者已下世，也是侵犯了他的人權，更是侵犯了未死方生者去接續的自由。

周作人曾「落水」，抗戰後，尤其是建國後，有關於他的一切，都成爲了禁區。他對新文學運動的貢獻，以及在寫作上卓越的藝術成就，都被埋葬了。近幾年，才像出土文物般，發掘了出來，有點兒熱。

評論周作人的文章，我覺得張中行的〈再談苦雨齋〉，是最平實、中肯和精到的一篇。這篇文章，仍保持張的一貫風格，雖然其中有很深刻的論述，但沒有絲毫「高頭講章」氣。所以，我的標題用了「談」字，而不用「論」字。

該文談了周的爲人、與作者的交往、周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周的詩、周的散文。內容涵蓋

那麼廣，字只略超過一萬。

張把周的散文的特點，概括爲：「能夠寓繁於簡，寓濃於淡，寓嚴整於鬆散，寓有法於無法。」再闡釋說：「布局行雲流水，起，中間的轉移，止，都沒有規程，好像是興之所至。話很不平，好像既無聲（腔調），又無色（清詞麗語），可是意思卻不一般，又不晦澀。話語中間，於堅持中有謙遜，於嚴肅中有幽默。處處顯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卻又像是出於無意，所以沒有費力。」

這只是外貌，只是流，張指出其源是：一、豐富的知識；二、洞察的見識，憑此取捨材料，確立對事物的態度；三、長期鍛鍊後的思路的既條理又靈活；四、前人表達方法（包括組織、選詞造句以及修辭）的積累，隨手拈來；五、手動，無日不寫，熟能生巧；六、也許最重要，對文章的好壞有所知，知並化爲堅定的主張，然後是筆永遠順着這個指針走。

文中還提及周讀書的勤、快和博，不能不使人歎服。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岳飛》和《希臘》

用上兩個書名號，因為這是課本裏兩篇課文的題目。

讀師範時，有所謂「教學觀摩」和「教學示範」。前者是，一位同學教，其他同學旁觀，事後集體評論其優劣，故曰「觀摩」。後者是，邀請校外的現職教師來教，同學們旁觀，事後只准說優點，否則，以後便難有人應邀，故曰「示範」。

我做過一次「教學觀摩」，選教的是《岳飛》一課。課前，我頗化了些時間去了解，「拐子馬」到底是甚麼東西；並參考了不少國內出版的連環圖，去畫出「拐子馬」的掛圖來作教具。

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學生們都聽得津津有味，全神投入，感情隨着岳飛的命運而起伏。那時流行「五段教學法」，我在第四階段「聯念」，提出一個這樣的問題，讓學生們去討論：假如你是岳飛，在十二道金牌下，回不回去呢？

學生們的熱烈反應，出乎我意料。有的慷慨激昂說：誓死不回！有的含着淚說：君命難違呀！我還記得一位女班長說：真是左右做人難。我來一個「全民投票」，結果，三分之二贊成不回，三分之一卻贊成回去。

最後，我作總結，雖然不敢說宋高宗是主謀，秦檜只是幫兇，卻說：爲了國家和皇帝，也不應回去。課後，被導師批評：我的總結是危險的，教導學生不服從！

畢業後，我被邀回母校，做過一次「教學示範」，這次選教的是〈希臘〉一課。在「聯念」階段，我提出一個問題，讓學生們去討論：你願意做雅典人，還是斯巴達人呢？

這一次的討論，也是熱烈的，但沒有上次那麼充滿感情。男的大多說，願意做斯巴達人；女的大多說，願意做雅典人。有了上次被批評的經驗，我學乖了，沒有「全民投票」，總結時只說，做任何一個城邦的人民都是光榮的，他們都把國家的光輝名字，留在了歷史上。

多說一句，那時用的，是中華書局出版的小學歷史課本。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日

按本子辦事？

與張健波、馮成章、劉進圖、馬家輝諸兄飯叙。我問：爲甚麼在《三言堂》中的拙文，好幾次原來的書名號，都被改爲引號呢？例如：杜牧的《寄揚州韓綽判官》、朱學勤的《從一支烟到一本書》、《李陵答蘇武書》、毛澤東的《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等。

他們異口同聲地答我：這是「按本子辦事」。

大抵看見我滿面疑惑，便接着向我解釋了所謂「本子」，是甚麼一回事。總之這是《明報》編輯部自行制訂的「本子」，立下了編輯工作的規則，凡是一本書內的篇目，都用引號而不用書名號。

《寄揚州韓綽判官》，收入《唐詩三百首》；《從一支烟到一本書》，是《讀書》月刊裏的一篇文章；《李陵答蘇武書》，收入《古文觀止》；《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收入《毛澤東選集》。所以，《明報》的編輯，把書名號都改爲引號。

我再問：立下這樣的規則，有何根據？他們卻答不上。我忍不住告訴他們：在我所讀過有關標點符號使用法的書籍中，都沒有這樣的說法的。

我不服氣。事後，翻查了剪存的舊稿，發覺《明報》是「爲德不卒」的，並沒有把其「本子」貫徹到底。例如：《故事新編》的《鑄劍》、《史記》的《李將軍列傳》等等，卻沒有把書名號全都改爲引號。如按《明報》的「本子」，不但那兩篇文章，《故事新編》收入了《魯迅全集》，《史記》收入了《二十四史》，豈不是也不能用書名號嗎？我懷疑《明報》的編輯們，是否能分辨得出，所有文章曾否結集爲書，該用書名號還是引號。一部《四庫全書》，豈不是一網打盡不少古籍嗎？

有「本子」，有所遵從，是好事，但也要講道理，不可自以爲是。我希望得到《明報》的這本「本子」，既可開開眼界，學習學習，以匡不逮，也可看看還有甚麼不服氣的規則。未知《明報》諸兄，能否慷慨賜予？

一九九八年一月五日

「殺雞冇卵取！」

清晨，在茶餐廳吃早餐，鄰座在高談闊論「殺雞行動」，我聽到了一句警句：「殺雞冇卵取！」

他們從這次「殺雞行動」，談到董特首迷信風水，歷數回歸前後的不吉徵兆：農曆元旦花車遊行的一車毀人亡，回歸寶鼎的「折足」，馬匹「順利九七」被人道毀滅，董特首在選民登記誓師儀式作「滾地葫蘆」，直至最近「殺雞行動」的「殺雞冇卵取」。他們一致認為，「殺雞冇卵取」，是不吉徵兆中最不吉的徵兆。

殺雞取卵是傻事，一殺雞冇卵取」是更傻的事；殺雞取卵是壞事，「殺雞冇卵取」是更壞的事。迷信的人，認為這是不吉的徵兆，是有其邏輯的。

我覺得，爲了遏止禽流感，「殺雞行動」是合理應有的行動，是不應以「殺雞冇卵取」去譏諷和低貶的。

不過，我願意提出三點，讓董特首去反思。

首先，風水也是一種迷信。自己去迷信，本也無甚可厚非，但不要再去公開宣揚。「上有好者，下有甚焉」。從風水到徵兆種種，既違反科學，也可大煽迷信之風而蠱惑人心。

其次，對傳媒的批評要審慎。十二月十九日，董特首在臨立會議員面前，強烈譴責傳媒大事渲染禽流感事件，以致人人自危，海外遊客不敢來港。不到十天，政府卻採取了「殺雞行勳」，他又認為是果斷而加以支持。這不是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嗎？

最後，深圳河以北的流言，陰謀論竟認為禽流感是美帝對特區的破壞；又說為甚麼要請美國的專家來港研究禽流感，難道中國和香港沒有這樣的人才嗎？陰謀論和狹隘的民族感情，竟發展到了如此愚昧無知的地步。董特首會否也把這些流言，向中央彙報一下呢？

「殺雞有卵取」，是無的放矢的謊語；但它也可以是舉一反三的警句。

一九九八年一月八日

董特首是希特勒？

《明報》的社評，越來越叫人失望；尤其是一月二日的《保衛權利，緊守法例》，論及支聯會元旦大遊行旗的小插曲。

該社評，迴避了一個大是大非的大前提：假如那法例是剝奪、踐踏人權的，你怎樣既去「保衛」，又去「緊守」？它建議支聯會：「立即勸導或制止。對拒絕聽從糾察人員指揮的人士，可將其驅離遊行隊伍，或主動報警。」這樣只有「緊守」，何來「保衛」；爲了「緊守」，也去剝奪、踐踏人權了。所以，所謂「保衛」，只是掩飾其過於露骨的幌子；「緊守」任何法例，才是其潛台詞，置公民抗命於何地？

連當日在場的警察對那旗的小插曲，也說是奉命低調處理的。爲甚麼《明報》的主筆，那麼「肉緊」，皇帝不急太監急呢？自己要太監，還要支聯會去做太監。

《明報》可以自律，對其報上的文字，握生殺之權而去「勸導或制止」，甚至「驅離」。

例如對本欄和這篇短文，就可如此對待。支聯會不是太監，決不會「聽從」這樣的「指揮」。

更荒謬的是，一派苦口婆心，舉出這樣的例子來：「當年希特勒製造『國會縱火案』，派人混入遊行隊伍，故意採取違法的過激行爲，以插贓手法來達到限制民衆自由的目的。」這豈不是以希特勒之心，測董特首之腹，認爲後者也會插贓嗎？

我雖然對董特首不很佩服，但認爲他的人格還不至於如此的。倘真的發生所謂插贓之事，恐怕非其主意，而是頂不住背後黑手的壓力而已。退一步說，倘真的有人要插贓，一立即勸導或制止」，一對拒絕聽從糾察人員指揮的人士，可將其驅離遊行隊伍，或主動報警」，就可以避免得了插贓嗎？

在這次大遊行中，不是有人向支聯會插贓，而是該社評向一些人插了贓，向支聯會插了贓。

據聞，《明報》社評是經一專責小組討論而立論的。這樣，小組成員不是一丘之貉，就都是昏蛋、孱頭了。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一日

三個頑劣的學生

月初，五年級的班主任，帶了三個學生來校長室。他們是校裏最頑劣的：強悍、無禮、吵鬧、打架、經常欠交功課、不守校規、搗亂秩序……。這次，又在課堂搗亂秩序，班主任對他們說，再這樣，便叫校長把他們開除出校。他們不約而同，伸出攤開的手掌，說道：「我們剛剛交了學費，如要開除，便把學費還給我們！」班主任氣得幾乎哭了出來，向我訴說時很激動，眼裏閃着淚光。

我覺得應該把氣氛冷一冷，先叫班主任離開；再叫工友來，替我找換了三張五元紙幣。那時還沒有推行免費教育，每月學費是五元。

我把那三張五元紙幣放在桌上，說：「這就是你們剛剛交的學費。假如你們真的不想再讀書，就拿去，回到課室去取你們的書包，立刻離開學校，以後再不要回來。」

我的話說得很慢，語氣也不嚴厲，要讓他們聽得清清楚楚。他們都楞住了，垂下頭來，誰

也不敢去拿桌上的鈔票。我認爲，他們還是留戀學校的生活的。

很久很久，我才說：「我不會開除你們，你們各人先拿回一張鈔票。」他們怯怯地拿去，我再說：「以後，每個月初，你們都不用交學費，自己留着，直到月底，才來校長室把學費直接交給我。假如在這個月內，再有大過失，或是把學費花去了交不出來，我便不收你們的學費，立即把你們開除。」其實，是我在每個月月初，替他們交了學費的。

我還爲他們每人印製了一本學校日記，每天上完每一堂，都要給上課的老師簽名，寫下評語。每周最後的一個小息，帶着這學校日記，單獨來見我，我要看看他們在這星期的表現。每周單獨見他們時，我都根據老師的評語和他們談話。他們果然再沒有犯甚麼大過失；我還通知有上他們的課的老師，他們稍有好的表現，應該讀一讀。我看到稍好的評語，都鼓勵他們一番。他們不但升了級，還畢業了。

這已是三十三年前的事。這三個頑劣的學生，現在甚麼樣呢？且聽下回分解。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四日

我對他們的期望

一位讀者，讀了我的〈一個難忘的聖誕節〉，來信說我偏心——爲甚麼只邀約六個成績最好的學生，一起過聖誕？

這不是偏心，而是公正，賞罰分明；否則，運動比賽爲甚麼只設金、銀、銅牌。而且，帶着三十九個學生，上山頂、看卡通片、吃聖誕大餐，不但秩序難於照顧，我的經濟負擔也吃不消。至於全班同學，是在學校開了一個快樂熱鬧的聖誕聯歡會的。

其實，對畢業離校的學生，那些本來頑劣的，我反而對他們更爲關注，擔心他們誤入歧途。比如，我曾談及的三個要向班主任退還學費的頑劣學生，雖然，我不能經常見到他們，但三十多年來，一直從與他們熟識的同學，打探他們的近況去向。

第一個，畢業後升入私校，讀到中三，投考警察。警務處派員到校，調查他在校的紀錄。我寫的評語是：「好動，成績平平，但知錯能改。」他現已升職爲機動部隊的「沙展」。最

近，見過他，舉止、談吐、神態是溫文有禮的，沒有甚麼「皇氣」，應該是一個盡忠職守的好警察。

第二個，畢業後去當童工，後來成爲了紗廠工人。成家較早，有兒女，住在木屋區，折遷時曾給我電話求助。後來，轉入機場當司機，是生活可以溫飽的基層市民。

第三個是我最擔心的，因爲他性情強悍，有一個壞哥哥。哥哥吸毒，入獄，死在獄中。他當過碼頭搬運工人，做過建築的紮鐵，現在是水電工程判頭。他曾帶了妻子和兩個女兒回母校。人變得馴良了，妻子很賢淑，兩個女兒都是中學生了。九一年直選，他爲我助選，通宵上街掛板。他曾對我說：「校長，你有一句話，我是永遠記得的。「希望你即使不能造福社會，也不要爲害社會」。我做到了，而且還記着。」我聽了，感動得答不出話來。

這三個本是最頑劣的學生，都達到了我對他們的期望：老老實實，勤勤懇懇，自食其力，勞而有獲，讓家庭溫飽，做個好市民。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七日

三十二年後的聖誕

〈一個難忘的聖誕節〉見報後，當年一同過聖誕節的六位同學中的一個，給我電話說：那也是他的一個難忘的聖誕節，現在，應該是他們回請我吃聖誕大餐的時候了。我欣然接納，並說：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不必吃聖誕大餐了；假如能接觸其他同學，最好也約他們來。

二十五日的晚上，他們也是六人，都比我早到，恭恭敬敬地坐着等候我。除了那六位同學仍在港的三個外，還有那三個頑劣學生中的兩個——當警察和做水電工程判頭的，最後一個是全班數學成績最好的。他們在五年級是同班同學，升六年級後，因為當時津貼小學只准百分之六十學生參加升中試，那兩個頑劣學生被編入不參加升中試的另一班，才不再同班。

我們邊吃邊談，一下子便過了三個半鐘頭，才依依告別。

大家都唏噓地提及那位不幸病逝的班主任，她也就是給那三個頑劣學生，氣得幾乎哭出來的五年級班主任。在座的兩個頑劣學生，都記得這事，說：在校時覺得她很嚴厲苛刻，畢業後

回校看她，卻覺得她很慈藹，很關心他們。

飯敘的發起人說：他曾和母親，帶了快要入學的妹妹，在春節假期後復課的第一天，來讓我為妹妹「開筆」。我記起來了：我把她抱在膝上，把着她的手，用毛筆寫了「天、人、古、今」四個字。這四個字出自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且筆劃簡單。

那位數學成績最好的，他在上一年升中試數學科的試卷，九十二題答對了九十題。獲派英華書院，但因家貧放棄升學機會。後來讀夜校，升中學而畢業，當政府文員一直至今。

飯後，水電工程判頭的學生，駕車送我回家，問道：我會不會再參選？還是否要他助選？他還記得九一年，曾與教協的陳洪老師，為我通宵上街掛牌。他說陳是個好老師，向他學了好些東西。

算一算，這兩個聖誕節，相隔了整整三十二年。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日

寫揮春，迎新歲

「六四」事件後的每年歲暮，我都在維園年宵攤檔，為支聯會寫揮春籌款。由九四年起，我除在維園外，還到各社區，免費為街坊們寫。今年，在上月底開始，便安排了到二十七個居民點去，每次長者八小時，短者三小時，共計一零七小時，直到本月廿五日（年廿七），才轉到維園。

工作人員曾為我統計，平均寫一張只需時四十秒。這樣，不計在維園，今年我在各社區寫的揮春近萬張。我一筆在手，便不停地寫，除了去廁所，有時連午餐也一手拿着筆，一手拿着麵包。我似乎不感到疲倦，端坐懸肘，平心靜氣，全神貫注，自覺呼吸和脈搏都緩慢下來，有如在練氣功。時間最長的一次，是去年農曆大除夕在維園，由正午十二時一直寫到翌日凌晨三時。

我感到很有意思，市民或街坊把他們對來年最熱切的願望告訴你，讓你為他們寫成揮春，

這實在是一種榮幸。

當然，「龍馬精神」、「萬事勝意」、「心想事成」、「從心所欲」、「出人平安」，這些傳統字句，是最多人要寫的。從一些人要寫的，我或可猜到他們的背境：「學業進步」，家裏有孩子在學；「老少平安」，一家三代同堂；「一團和氣」，家裏時有爭吵；「壽如松柏」，家有老人；「主恩滿溢」，是基督徒……。

在去年和今年，要寫「百無禁忌」的人，越來越多，後來居上而大可與「心想事成」並駕齊驅。這是甚麼緣故呢？我隱約覺得，其中似乎有一種無所畏懼的可貴的精神。

今年，要寫「開工大吉」和「生意興隆」的特別多，大抵是他們已感覺到失業和經濟蕭條的威脅。我最喜歡寫的是：「自由萬歲」、「人權法治」、「我愛民主」、「民主必勝」、「世界和平」等。一位的士司機，要寫「轉轉長途」；一對新婚夫婦，要寫「龍鳳雙胎」；要寫「蜜運成功」的，說是拿來送給朋友；四名會考生，都要寫「成績八優」。

「橫財就手」、「六合當中」等，當初我是不寫的，近幾年也從俗了；有人要寫「財色兼收」，我斷然拒絕。忽然想起，迷信風水的董建華，也該寫一張「百無禁忌」罷？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寫揮春瑣記

寫揮春的一些瑣事，頗值得記下來。

在慈雲山中心商場，一位精神還算矍鑠的老公公，在一男一女的家人陪伴下，來要我寫一個「壽」字。老公公說：他已是九十五歲了。我爲他寫了一個草書大「壽」字，還多寫了一張「九五之尊」的揮春送給他。他連忙說：不敢當！並說了他的姓名，叫我把上下款寫上。

在彩雲邨的一位操台山話的老伯伯，把他要寫的兩個字告訴工作人員，但他們都聽不懂。他說：華叔是聽得懂的。原來他知道我是四邑人，聽得懂台山話。他要寫的是「不跪」兩字，我從來沒有寫過這樣的揮春。看着他一臉正氣，我欣然揮毫。

在黃大仙下邨，一位中年漢子說：他已失業多時，希望我爲他寫帶來好運的揮春。我躊躇了好一會，該寫些甚麼呢？終於寫了「開工大吉」，並對他說：「開工」是已經有了職業了，而且工作順利愉快。

在陶大花園，一位母親說：她的孩子的成績已經很不錯，該寫些甚麼去進一步鼓勵他呢？我寫了「品學兼優」。

有嬰孩的父母，不少要寫「快高長大」。其中有幾位，看來是有點教育水平的，我便說：不如寫「健康成長」罷，因為「健康」是包括了身心兩方面的。他們聽了，都很高興地接納了。一位女士，要我寫一首譯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第一次，寫漏了一個字，我便再寫。她把那張脫漏了字的也要了，說：「錯體價更高！」

年前在維園，一雙熱戀中男女，要我寫「天長地久，在乎擁有」，是改自為人熟悉的廣告語的。翌年，他們又來了，並說已經結了婚。自此，每年都收到他們的聖誕卡。

我的一個舊學生，每年都帶着兒女來維園，要我為每一個孩子寫一張揮春。去年，他只獨自來，說一家已移民海外，最近只自己因簽了一短期合約回港。我寫了「毋忘故國，心繫中華」，給他帶去海外。

這些瑣事，是否頗值得記下來呢？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我的一篇文章習作

歲暮清除抽屜，發現了一篇六九年十一月所寫的文言習作。那時候，晚間在官立文商夜學院進修，讀着二年級。李栩「老師」，以「自述」命題作文，並限定字數不得超過三百。我覺得字數太少了，爲了要使習作有較大的容量，便第一次嘗試以文言去寫作。全篇不計標點，得二百九十九字如下：

「余少小家貧，迭罹失學之痛，幾經困頓，始卒所業。因感身受，乃入師範，以百年樹人爲己志；執鞭至今，已垂十有八載矣。深悟師道之維艱、教學之相長、絃歌之歡樂、名利之幻虛，志彌堅而趣益增，悠悠歲月如一日，未嘗稍息也。性好讀書，於新舊文藝，俱喜涉獵，然不薄今人而愛古人。文尙馬遷之雄深雅健，詩羨長吉之幽遠詭奇，詞慕稼軒之沉鬱慷慨。復嗜臨池，師法魯公，以其爲人節烈，其筆法遒勁，皆足爲典範也。尤愛《爭坐》、《祭侄》二

帖，公餘課後，輒捧讀觀賞，其樂有若遊於名山大川而忘返焉。母早喪，喪母而盡歷蘆花之苦。方弱冠，父又見背。弟妹六人，躬親教養，雖庶出亦一視，報之以德，至於成立。勞碌奔波，青春荏苒，此所以年薄不惑，而猶未遑自謀家室也。或問：無侶無後，能不以為憂乎？君子曰：四壁藏書，胡云無侶；滿門桃李，胡云無後？「仁者不憂」，殆非此之謂也歟！」

評分：八十二。評語：「文筆簡勁而雋永，寫卷端整。」在「……皆足為典範也」、
「……有若遊於名山大川而忘返焉」、
「……仁者不憂」，殆非此之謂也歟」等句之字旁加點，停頓處加「孑圈」，表示批閱者的讚賞。

至於寫卷，是顏體正楷，我用的是黑墨水和萬寶龍彈性很強的軟筆嘴筆，筆劃粗幼分明，很有毛筆筆觸，很多人誤以為是用毛筆寫的。

這是我第一次寫的文言文，此後再沒有寫過，今後恐怕也不會寫，也許是我所寫的唯一的一
文，很慶幸保存了下來。

一九九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李栩厂老師

曾在早期文商肄業的同學，大多都認識李栩厂老師。「厂」亦即「庵」字，但他自署總是用這個「厂」字。因這字與「廠」的簡體字相同，所以同學們給了他「廠長」的綽號。他有一位兄長，叫李彌厂，頗有詩名，也曾在文商任教，但在五十年代已逝世。同學們都傳說，李鴻章是他們兄弟的祖父。

李栩厂老師，執教二年級的「專書選讀」和「文字學」。文商夜間在葛量洪教育學院上課，他年老而有哮喘病，走那一條斜路是要命的；的士司機也往往拒載。我便約了兩位有車的同學，輪流接載他去上課。

一天，他約了我和接載他的兩位同學，去雪園飯店吃午飯。我們知道他生活很清苦，不肯讓他請客。他說：這飯店的廚師娶媳婦，要他為新人排八字，這頓午飯是廚師請的。這是他第一次向我們透露，他是這方面的專家。記得當時我還說笑地，問他可不可以為我算算八字。他語氣突然變得很嚴厲，說：不要相信這些東西！

大抵是七二、七三年相交的冬天，我已畢業離開文商。阿濃兄是文商學治會的負責人，突然來電，說李老師過世了，遺體停放在伊利沙伯醫院，由於他在港沒有一個親人，我們要去認屍。

接着，我們便爲他辦理後事。他在銀行有少許存款，但因突然逝世，無法提取，於是在同學間發動籌募。李杜銘的父親李彥和老師，也在文商任教，他說：栩廠老師在生時，我曾答應完全負責他的殮葬後事，即使我比他先走一步，也會囑咐後人去負責；籌募得的錢，留給他的家人好了。

在清理栩廠老師的遺物時，我們發現了一個大秘密，原來他有兩個住所。一是我們都知道的男青年會，另一個是在大觀酒樓附近的怡紅院公寓。後者，原來是他爲人算命、測字、排八字的地方，掛有「李鐵口」的招牌，從來沒有同學知道。

他的遺物，沒有甚麼貴重的東西，只有張大千送給他的一張畫。

我們與他在國內的家人聯絡多次，都沒有回音。直至文革結束後，他們才來港，把所有的遺物都領了回去。

一九九八年二月三日

《第三帝國的興亡》

一些並非只一味閱讀軟性消閒書籍的人，我極力向他們推薦這一本書。原作有一副題，中文譯本卻沒有標出，否則書的內容就清楚了——《納粹德國史》。所謂「第三帝國的興亡」，就是希特勒的崛起和覆滅，這過程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慘酷和教訓深刻的一頁。

六十年代中，我在港購得此書，書內印有「內部發行」四字。我覺得詫異的有二：其一，為甚麼「內部發行」，而在港又可購得呢？這點，我沒有去深究。其二，為甚麼要限制「內部發行」呢？大抵是，其中對斯大林有所批評。

這書在朋友中輾轉傳閱，失了踪。

去年夏，我在書店發現了九六年出版的新版本，已沒有「內部發行」四字，便立刻買了。去年十二月，往捷克接受人權獎，起行前，翻出了書中有關德奧合併、慕尼黑會議、捷克與波蘭的陷落、德蘇條約等片斷，讀了一遍。

作者威廉·夏伊勒，是一個美國記者。歐戰前，他在德國工作和生活了幾年，目睹希特勒的崛起；戰爭期間，在歐採訪；戰後，又採訪了在紐倫堡對納粹戰犯的審訊。這書最可貴之處，是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例如：私人日記、極度秘密的發言紀錄、會議報告和通訊，甚至還有納粹領導人電話中談話的紀錄；德國外交部打算燒燬，而卻被美軍繳獲的四八五噸秘密檔案；希特勒大本營每天研究討論軍事形勢的五十一次「元首會議」部分速記紀錄；紐倫堡審訊時，作為證據的數十萬件納粹文件……。書中的記述，處處標注出所根據的資料來源。

原作於六零年出版，那時大戰才結束了十五年，在這樣短短時間之後，去撰寫這一段歷史是很不容易的，但作者卻完成了至今尚未有人能超越的巨著。他已於九二年逝世。

我將會從頭再讀一遍這本《第三帝國的興亡》。我想到，也該有一本類似的《蘇聯社會主義帝國的興亡》的歷史書罷？

一九九八年二月六日

一篇畢業告別辭

在直選中，我的助選義工，有不少是我的舊學生。他們大多是聞風而動，互相串連，聯羣自行請纓來參與的。

有一次，十多二十個已經離校十年的學生，組成了一個小組，來為我家訪、派傳單、貼海報、上街掛牌……。在競選期間，沒有時間與他們話舊；選舉結束後，便約了他們回校座談。我問及，他們畢業後，升學、就業、目前生活、同學間的往來等情況。他們告訴我，一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一篇畢業告別辭竟然發生了這麼大的影響。

七九年初，我校由「雞寮」遷往順安邨，校舍擴大了，班級驟然由十八班增至四十八班。因為錄取了大量的插班生，同級學生的程度很參差。於是，我首次在五、六年級，把成績最差的一批（也大多數是較難管教的），集中編在一班，選派一位認真而有耐心的教師去當班主任，不必按其他班的進度，而針對他們的實際程度去教學。這一批學生，都是編在這一班的。

那時候六年級有四班，每班選出一名代表，然後再挑選一名正式代表，在畢業禮上致告別辭。我親自聽了這四名代表的預演。結果，所選出的，就是四班中成績最差的那一班的代表。我是毫無偏見的，只覺得這位代表的講話，沒有陳腔濫調，感情真切，舉出了許多學校生活中值得記念的片斷。

原來這一班同學，立意要在代表的挑選中，為本班爭取榮譽，洗脫一些老師對他們的偏見。他們集體討論告別辭的內容，紛紛舉出學校生活中的深刻印象，老師同學的相處，然後選出人去執筆和發言，經多次修改和排練，排練時又大家提出改進的意見。這可謂經千錘百煉的集體創作。

他們的代表，成為了全體畢業同學的代表，全班大為振奮。這振奮延續至他們離校之後；這一次所取得的榮譽，成為了他們保持着友誼的基礎。他們說：這一篇告別辭，使我們都「生性」了！

一九九八年二月九日

蘇格拉底的生死觀

「千古艱難唯一死」。生命，是人生最寶貴的東西。它屬於人只有一次，人生的一切都附麗其上，失卻了便失卻一切。所以，生死關頭，是最嚴峻的考驗，人性的種種都於其中顯露。當面臨這個關頭的時候，一個人的最本質也就得到測試。

希臘哲人蘇格拉底，以「瀆神違教」之罪被控入獄，不久被判死刑，服毒而逝。在《柏拉圖對話錄》中，載錄有他臨終的辯詞。這時候，他自知不能逃過死罪，卻坦然面對終極，說出了自己的生死觀。

他說：「我們如果從另一角度來思考死亡，就會發覺有絕大理由相信死亡是件好事。死亡可能是以下兩種情形中之一。」

其一是：「倘若你認為死後並無知覺，猶如無夢相擾的安眠，那麼死亡真是無可形容的得

益了。如果某人要把安恬無夢的一夜，同一生中的其他日子相比，看有多少日夜比這一夜更美妙愉快，我想他說不出有多少天。不要說是平民，就是顯赫的帝王也如此。如果這就是死亡的本質，那麼死亡真是一種得益，因為這樣看來，永恆不過是一夜。」

他說的另一種情形是：「是靈魂經歷變化，由這個世界移居到另一個世界，只是遷居到另一個聚居了所有死去的人的世界。」

他認為這樣就更美妙了，他可以在這另一個世界裏，與冥府最正直的法官相遇，與神話中的英雄人物往來，與善奏豎琴的歌手、作出史詩的盲詩人、受冤屈而死的戰士、以木馬屠城的將軍……，交談、討論、請教，認清誰是真正的才智之士，誰只是浪得虛名。他覺得其樂無窮的是，他在這另一個世界裏，能夠像在這個世界裏一樣，去繼續探求事物的真偽。

撇開生死不談，單是他對無夢相擾的安恬的嚮往，對事物真偽的不斷探求，已展示了一個閃着智慧的亮光的紫色的靈魂。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二日

四字成語的趣劇

四字成語，是中文的一個特色。在升中試時代，應考的小六學生，要被塞進滿腦子的四字成語。因為在中文科的試卷中，不論改正錯別字、解釋詞語、重排句子、填充、作句等試題，都與四字成語有關，幾乎涉及全卷過半的內容。要考好這一科，就非要死記硬背四字成語不可。那時候，這些小學生們由於生吞活剝，在日常的談話中，這些四字成語也往往衝口而出，鬧出笑話，令人捧腹。

這是一幕短短的趣劇。

六年級學生在舉行測驗。人有三急，一個學生在測驗中，要老師讓他去廁所。

「爲甚麼小息的時候不去？現在正在測驗，不准去！待下了課小息時才去罷！」

「老師，我實在已經『急不及待』！」

「不准！六年級學生還不知道要在小息去廁所嗎？」

「老師，我『忍無可忍』，再不去廁所，就要『洪水氾濫』，『當衆出醜』了。」

老師還是不爲所動。那學生大叫一聲：「你『恃勢凌人』，我要『破釜沉舟』，『排除萬難』，去解決『燃眉之急』！」說罷，一股風地衝出課室，直奔廁所去了。

當老師帶着這學生來校長室，向我覆述這事時，三人都失笑起來。老師最憤怒的，就是「恃勢凌人」這四個字。

那學生留下來，我對他說：「洪水犯濫」、「恃勢凌人」、「破釜沉舟」、「排除萬難」、「燃眉之急」，這幾個成語你都用錯了。我接着舉出幾個成語的上半截，要他說出下半截來：「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網開」——「一面」；「下不」——「爲例」；「高抬」——「貴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他都答對了。

我對他的懲罰是，要他以用錯了的成語和我舉出的成語，每個成語作句子三句交給我，特別告誡他「恃勢凌人」是貶義詞，不可隨便亂用。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日

《水滸傳》的沒毛大蟲

《水滸傳》裏的反面人物不少，較爲人熟悉的有高衙內、董超薛霸、白衣秀士王倫、西門慶等。近年，在某些場合，我卻往往聯想起另一個夕角的嘴臉，他就是被青面獸楊志宰了的沒毛大蟲牛二。

青面獸楊志落魄江湖，盤纏用盡，只好把家傳的寶刀，在街頭叫賣。忽然看見途人紛紛躲避，一個吃得半醉的黑凜凜的大漢，衝撞過來。這就是有名的破落戶潑皮，綽號沒毛大蟲的牛二。用現在香港的俗語，應該稱之爲「陀地」。

楊志叫價三千貫的寶刀，牛二硬說不值，要楊志說出好處來。楊志直說：「第一件，砍銅剝鐵，刀口不捲；第二件，吹毛得過；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牛二聽罷，仍然糾纏不休，一定要楊志去證明。

牛二向附近舖店討了二十文銅錢，放在橋的欄杆上；楊志捲起衣袖，手起刀落，果然只一刀便把這疊銅錢剝成兩半，惹得圍觀者齊聲喝彩。

牛二又要楊志做第二件，自己拔下一把頭髮給楊志。楊志把頭髮放在刀口，盡力一吹，立即變成兩段，紛紛飄在地上，這又引起一陣喝彩。

牛二還要楊志做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楊志說，殺人是犯法的，不如殺一隻狗給他看。

牛二卻不肯，認為楊志說是殺人而不是殺狗，偏要楊志殺人，假如不這樣做，便要給了他這寶刀。牛二還挑釁說：「你敢殺我？你好男子，就剝我一刀！」接着，揮拳打來。楊志忍無可忍，把他打翻在地，在胸脯搥了兩刀，宰了他。

楊志是名硬漢子，但未如魯智深那樣魯莽，也按不住性子，殺了這一條咄咄迫人、無理取鬧的沒毛大蟲。

春節前的一天，我在樂富地鐵站出口處，為街坊寫揮春。一個看不清楚面目的漢子，在攤檔前，「漢奸」、「走狗」、「賣國賊」，夾雜着「三字經」、「四字經」，不停破口大罵，還說甚麼「身為校長，隨街寫字，斯文掃地」。罵了約十分鐘，一位老婆婆勸他離開，他連她也罵起來。結果在街坊的喝打聲中，灰溜溜地悻悻而去。

這一次，我又聯想起《水滸傳》的沒毛大蟲。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八日

喬石說的兩句話

喬石訪港，說了兩句其他國內要人元老大抵不會說的話：「我註定這一輩子是不好退休的」；「我的命運也不在我的手裏」。他的確很有喬石的特點。

這兩句話，按通常的含義，不難明白，難免引起忖測紛紛。他卸任人大委員長後，是否還擔當其他職務，或別有自己心目中的任務使命？這是怎麼樣的職務、任務使命？他的命運不在他的手裏，是在誰的手裏？誰會有這麼大的能耐，掌握住他的命運？命運不在自己的手裏，是否預計或會有不由自主的難過的日子？……等等。

有論客卻這樣說：作這樣的忖測的人，是完全不了解共產黨人的感情、邏輯和語言的。共產黨人，曾宣誓要終生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既是「終生」，哪有「退休」可言？共產黨人要遵守黨的鐵的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命運是在黨的手裏，而不是自己的手裏的。

對這樣的說法，我想了一想。斯大林在列寧的追悼會上曾說：「我們共產黨人具有特種

的氣質，由特殊材料製成。」即使真的是這樣的異乎尋常的人，是否就真的「不好退休」和「命運不在我的手裏」呢？

共產黨人信奉唯物論和辯證法。不承認人會老會死，就違背了這信奉。再者，精神體力隨着年齡必然逐漸衰退，對此無自知之明，就是自欺欺人。已是燈油將盡，還硬要變棧，這不是「奮鬥」，而是霸住茅則拉不出屎來，反而往往會幹出「損害」的糊塗事。「奮鬥」應該是正面的，在已將老死時，退休讓賢才合此原則，起了正面而非負面的作用。

終生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這是一個理想。掌握着自己的命運的，是這個理想；遵守黨的鐵的紀律，應附從這個理想，而不是為「遵守」而「遵守」，忘卻了本來的「遵守」的原意是甚麼。

所以，說到底，命運還是在自己的手裏的理想。

我毫無贊成喬石退下來之意。喬石的特點，到底是共產黨人的特點。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退休的故事和制度

從喬石訪港說的兩句話，我想起了關於退休的一個故事和一個制度。

香港某天主教女子小學，校長是一位修女。她擔任校長多年，到了退休年齡而離職，但卻沒有離開學校，轉任為工作量較輕的圖書館管理員。過了兩三年，她連圖書館的管理員也不再擔任了，卻去當一名校工，負責看守學校的大門。

每天上課放學，她總坐在學校大門的小亭子裏，與上課放學的學生和接送孩子的家長，打招呼寒暄。她叫得出大部分學生的姓名，認得出誰是某學生的家長。當學生和家長，對她說：「早晨」或「再見」時，她臉上總綻出慈藹燦爛的笑容，像一朵永開不敗的鮮花。

再後來，她連看門的校工也不再幹了，但還不時回校探望舊的同事，尤其是在小息，總到學生叢中去。

這是一個退休的故事。

某日本大企業，僱員衆多。僱員到了既定的年限，可即時退休領取退休金。但如想繼續工作的，每年接受一次精神和體力的測試，按照測試的結果，決定他必須退休，還是調到工作較輕，或上班時間較短的，合乎其精神和體力的職位去，繼續留在企業裏當一名僱員。調職後，薪金當然會比原來的減少，但總比即時領取的退休金為多。調職留任，只領取薪金，退休金要到完全退休時才可領取。

這樣的制度，既合乎人類體質越來越好，到退休年齡雖精神和體力都稍衰退，但總還有一定的工作能力的實況。從經濟上來說，企業可暫時少支出一部分的退休金，而留下了一些薪金降低了但對業務有經驗的人。從管理上來說，因照顧了僱員的晚年生活而增加了他們的歸屬感，而且上下的調動也促進了僱員間平日的溝通和感情。

這是一個退休的制度。

這故事和制度，都是聽來的，可能與具體細節略有出入。你認為，這不是一個很溫馨的故事和一個頗為合理的制度嗎？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大事小事與緩辦急辦

「大事緩辦，小事急辦」，這句話是很多很多年前，從曹聚仁那裏讀來的，但已記不清是哪一本書哪一篇文章了。讀到的時候，看了解釋，覺得很有點道理，的確是可貴的經驗，於是不時引為鑑誡，在工作中很是受用。

事不但有大小，而且有公私之分。我的私事，從來都很簡單，不怎樣須要去「辦」的，所以，受用的主要是在處理公事上。

所謂「大事」，是指一些關鍵性的、影響重大深遠的、往往有「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的效應的事。所謂「緩辦」，並不是慢慢地去做，更不是拖延不做，而是要小心謹慎，多做調查研究，兼聽各方面意見，反覆思考，即使有了決策計劃，還要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不時檢討、修訂、重議原來的決策計劃。所以，「緩」只是表面的現象，實際上是非常「緊張」的。心不急，但行動卻是急的。

由於是「大事」，往往有一巨大的衝擊力和壓迫感，很容易頓時失措起來，反應過敏，表現出表面上的「緊張」，失卻了冷靜，但決策計劃反而忽略要有一個縝密的周詳的過程。

爲了免使「緩辦」而變成了優柔寡斷，錯失時機，落後形勢，陷於被動，在表面上的「緩」之下，應該有一個緊湊的工作日程表。調查研究、兼聽意見、反覆思考、制訂決策計劃、檢討修訂重議，都要有步驟地依時執行完成。由於都已胸有成竹，不但能水來土掩，兵來將擋，好整以暇，指揮若定，事辦出來的效果成績也大多是較好的。

所謂「小事」，大多是一些無關宏旨的瑣碎事務。例如：覆一個電話，回一封信，代人轉達一個口訊，繳付到時的費用，購買某些已將短缺的日常用品，文件入檔……等等。這些小事到手時，由於其小，很容易一放下，轉眼間便忘掉了。因爲未去「急辦」，常常變成了「不辦」。「不辦」的小事，積累起來，便形成了鬆散的工作作風，有時會誤了大事。

「大事緩辦，小事急辦」，很有點辯證的道理。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附
錄

北美籌款之行雜記

鄭家富和我，於三月二十日上午九時，飛抵溫哥華。李柱銘比我們早兩天出發，先去了西雅圖，也於同時飛抵溫哥華，與我們匯合；劉千石卻只在最後一站——多倫多，與我們三人合組成四人幫。

四月六日晚，馬丁飛日內瓦，出席人權委員會會議；我直飛返港，要趕上九日舉行的財政預算案辯論。阿石比我遲一天才回來；阿富仍留在多倫多，九日再到華盛頓，陪同馬丁領取「國家民主基金獎」，並會晤美國各政要，然後才一同返港。

在溫哥華與多倫多之間，以行程先後為序，我們到過以下八個城市籌款：卡加利、洛杉磯、沙加緬度、三藩市、紐約、華盛頓、波士頓、芝加哥。此外，還有三個城市，只去演講而沒有籌款的：加拿大卑詩省首府維多利亞、三藩市灣區的柏克萊和聖荷西。

在十八天內，我們走了十三個城市，可算得是旋風之行。

披星戴月，馬不停蹄

行程的緊迫，可以用四句話、十六個字來形容：披星戴月，日夜兼程；馬不停蹄，分秒必爭。

從三藩市到紐約，是乘夜機，晚上十一時起飛，加上三小時時差，早上六時抵達。一下機便開始一連串活動。從紐約到華盛頓，班機因風雪停飛，改乘火車，早上六時便要趕到火車站。從華盛頓到波士頓，從波士頓到芝加哥，從芝加哥到多倫多，都是乘搭早機，凌晨四時左右，便要趕赴機場。

每到一個城市，活動都安排得密麻麻的：記者招待會，拜訪僑團，出席研討會、演講會、籌款餐會，接受不同傳媒的訪問，參與電台電視的直播節目，等等。馬丁、阿富和我，往往要兵分幾路，各自參與不同的活動。

疲勞達到了頂點，平均每晚大約只有四小時的睡眠。馬丁有一次接受電視訪問，竟在記者發問時，在電視機前睡着了，記者把問題問了三次，他才醒過來。他本就有一坐下來就可以睡着的本領，阿富和我在這次旅程，也練就了這本領。只有五分鐘的空暇，便可以坐着睡一睡。

我離港時，感冒還沒有痊癒。到了溫哥華，第一天下午，演講時喝了冰水；病情立即加劇，喉嚨沙啞了，說不出話來。幸好帶備了藥品，連忙服食，竟能漸漸好了。馬丁說我的腎上腺特別發達，一忙起來，抖擻精神，便能驅除百病。

我已直趨古稀之齡，在這次旅程中，仍能經得起考驗，不負民主黨所託，完成了任務，自己也感到慶幸。我還可以和民主黨、支聯會年輕的弟兄姊妹們，一起戰鬥到勝利的一天罷？

老中青的三人組合

這次北美籌款之行，除了馬丁和我之外，應挑選誰同行呢？鄭家富是由我點名的，我不能不自評「慧眼識英雄」，找到了最佳人選，組成了最佳的三人組合。

馬丁的英語，說得漂亮極了。他極懂得西方人士的心理，演講時條分縷析，而且富有幽默感。我說廣東話和國語，講話較嚴肅、帶激情和有濃厚中國色彩。阿富亦莊亦諧，可用英語和廣東話為我們作補充。尤其是在主持拍賣籌款時，他能放下身段，使用逗笑的「屈」得就「屈」的渾身解數，屢創奇蹟，不斷突破拍賣籌款數字。我不知道他還有一副好喉嚨，擅唱張學友的歌曲。每次唱卡拉OK籌款時，他總叫聽眾不要閉上眼睛，否則便會誤以為張學友到

了現場。

我們三人，是老中青的三結合。阿富自我介紹時說，我比他年長三十歲，馬丁比他年長二十歲，他是民主黨年青一代的代表，他此次隨行，是要讓海外僑胞，知道民主黨是有年青的一代接棒的。他年輕力壯，可以負責搬運行李；尤其是我，因為有腰患，非有他的幫忙不可。

我們除了個人的行李外，還有三大箱帶到各城市去的拍賣物品，重甸甸的，只有他才能搬得動。我還有十九幅已裝裝好的書法，網成一綫要帶到各城市拍賣。這些書法不能寄輪，以防壓壞，必須隨身攜帶。

馬丁笑阿富說：你托住華叔「碌嘢」，走遍整個北美。這十九幅書法，都拍賣得很好的價錢，成爲所籌得款項的一個很重要來源。這其中，有阿富的汗水，單就此事，就應大大記他一功。

李、鄧、司徒的講話

在旅途中，我們三人作過記不清那麼多次的講話，內容總不免有些是重複的，一些內容多次被講述。

馬丁常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紐倫堡審判戰犯的聆訊中，一名德國律師的作供。

這位律師說：當希特勒迫害共產黨人時，他不作聲，因為他不是共產黨人；迫害工會人士時，他不作聲，因為他不是工會人士；迫害猶太人時，他不作聲，因為他不是猶太人；迫害天主教徒時，他不作聲，因為他是基督教徒。最後，當他自己受到迫害時，也沒有人為他說話了。

他還說到：在希特勒上台前，德國有不少正直的法官。但納粹黨執政後，制訂惡法，不執行惡法的法官被處決，其他的便成為執行惡法的幫兇。他以此說明，立法與司法的關係，司法不能完全脫離立法而獨立公正。

阿富多次說到，他在律師行見過一位由隨從手提大批現金美鈔，來買樓的大陸人士。這人買屋，只坐車去兜一兜樓盤的所在地，不用下車，便一口氣買了多所豪宅。

他還說，是一個李姓的議員刺激了他從政的，但這人不是李柱銘。他在熒光幕看見那人左搖右擺，擦鞋轉軟的嘴臉，不甘心自己和下一代的命運被這樣的人操縱，於是毅然參選從政。

我較喜歡引經據典。我多次引用兩位美國獨立運動的傑出人士——富蘭克林和湯姆士·潘恩的對話。富蘭克林說：「何處有自由，何處是我家。」潘恩說：「何處無自由，何處是我

在。」

他們取向不同，前者是投奔自由，後者是爭取自由；但理想是一致的——自由。移居海外的僑胞，他們走的是富蘭克林的道路；我們民主黨人，不撤退，要留在香港，走的是潘恩的道路。海外僑胞和我們的理想，也是一致的。

我還談到，這次來北美籌款，是爲了儲糧過冬，不致在嚴冬餓死。香港的嚴冬，快要來到了。說到這裏，我便引用英國詩人雪萊的一句詩：「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冬天無論怎樣寒冷悠長，但冬天不會是永恆的，春天一定會到來！

我曾因感觸而下淚，記者曾問我爲甚麼這樣激動。我以艾青的詩句回答他們：「爲甚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爲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從「借肚生子」到「墮胎」

在各城市舉行的研討中，阿濃和孫國棟夫人的發言，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阿濃是香港的知名專欄作家，已移居溫哥華多年。從他口中，我才知道最近香港《明報》副刊改版，多名作家如羅孚、張無忌、古德明、林超榮等的專欄已被停止的事。

阿濃在會場中站立起來，慷慨陳詞。他說：有人以這些作家的寫作水準下降為理由，去封殺他們的專欄。這些作家，有些已在《明報》寫了十多年稿，為甚麼最近才發覺其水準下降呢？請看看取代他們的新專欄，是否水準都比他們好呢？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敢言，尤其是最近批評了鄧小平和董建華。以前，我們採取「借肚生仔」的策略，現在行不通了，因為有人要「墮胎」。他建議民主黨要辦自己的報紙，不少作家會為這份報紙義務寫稿。

「借肚生仔」這句話，是我最先提出來的。七三年文憑教師事件中，教師被傳媒圍剿，事後有人建議辦自己的喉舌。我認為這是很吃力的事，倒不如積極利用中立的報章，投稿去發表。針對這句話，阿濃現在提出了「墮胎」的危機。

對他的建議，當時我們只能回應，回港後去積極考慮。

孫國棟教授退休後，定居於加州的沙加緬度。在沙加緬度舉行的私人宴會，在三藩市舉行的研討和籌款餐會，他和夫人都來參加。

他有眼疾，不能駕車前來參加活動，是須勞煩他人接送的。他們的蒞臨，很使我感動。

在三藩市的研討中，一名會眾說：臨立會已既成事實，民主黨為甚還要這樣「噉氣」和「勞氣」去反對呢？

這話剛完，只見白髮蒼蒼的孫夫人，顛巍巍地站起來，激憤地說：清人入關三百多年，是既成事實，孫中山先生爲甚麼要鬧革命？台灣割讓五十年，也是既成事實，爲甚麼要光復？抗日戰爭，日寇佔我半壁河山，也是既成事實，爲甚麼我們還要抗戰到底？這不是「噉氣」和「勞氣」，而是有沒有正氣、骨氣和勇氣的問題！對不合理的既成事實，難道我們只能是忍氣吞聲嗎？

她的話，引起了長久的熱烈的掌聲。

表演節目各有特色

在各城市籌款餐會上，除了拍賣物品籌款外，我們三人都各自有籌款的表演節目。

阿富打頭陣，唱張學友的《你是我今生的唯一傳奇》。在卡城，他使出怪招，竟能一曲籌得一萬多元加幣。他有一位在卡城的蔡幼同學，綽號「馬騮仔」，是一個寶石商，是一個很精靈趣怪的年青人。阿富要他上台合唱一曲，聲明要籌得一萬元。「馬騮仔」上台後，便逐個點在卡城的朋友也上台合唱，每個上台的人都捐六百元；再由已經上台的朋友去點別的朋友，一定要每人六百元六百元地湊足一萬元，結果是超額完成了。

馬丁的表演壓軸，他唱的是《Amazing Grace》。他聲明，他是在洗澡時唱這歌的，必須有花灑聲伴着才能唱得出。於是，阿富只好也上台，馬丁唱歌時，在旁發出「沙沙」花灑之聲。

我的表演是講故事，講的是一個頗有意思的童話，是我一九八七年在北京草委會宴會上講過的。高潮在童話的結尾，總引起陣陣的掌聲和哄笑。我給這童話的名稱是《老國王的最後抉擇》，如有機會再寫出來給讀者們讀一讀。

在拍賣物品，價錢要再作大突破時，阿富總說一個笑話，稍將氣氛和緩一下。他說的是，某立法局議員在發言時，把助理為他起草的發言稿中所提醒他的——「飲杯水先」的附註也讀了出來，並且在立法局的會議記錄上也寫下了。他這一招，大多收到奇效，價錢因而再上一層樓。

我也有一個笑話。某日凌晨，我回校上學去，途中被一個警察攔截查身分證。查過了，我問他：你不認得我嗎？他說：怎會不認得！不過，這麼早就碰到你，不知你是真的還是假的罷了。原來是真的。

我們這兩個笑話，都是真人真事。

李錄唱《血染的風采》

李錄是流亡海外民運學生中，學有所成的一個。考取得博士學位後，他從紐約移居洛杉磯，並在一所律師行任職。他來參加了我們的籌款餐會。

會上，拿出了兩幅我的書法來拍賣，第二幅是用四尺宣紙寫的一個大「壽」字。李錄出價競投，最後剩下他和一位僑胞出價。他喊出最後一個高價，是三千美元。這時候，那位僑胞說，他是買來送給正坐在他旁邊的母親的，並說，他提出的最後一個價錢是三千三百八十八美元。李錄聽了，就再沒有出價。他對工作人員說，他不願奪人所好而要成人之美，他雖然投不到這個「壽」字，但也捐出三千三百八十八元給民主黨，並即時填寫了支票。這幅字，實際上籌得了六千七百七十六元。

我帶去拍賣的書法，共十九張。這個「壽」字並不是賣得最高價錢的，拍賣得最貴的，是十九張最後的一張，在多倫多賣出，寫的是集聶紺弩的詩句——「手提肝膽輪函血，一笑心輕白虎堂」。競投這幅字的，是一位鄭老先生。他出價八千元加幣後，主持拍賣的鄭至慧小姐說，希望他能加價至一萬元，如果他願意出這價錢，席間每一個人都拿出廿元來。結果，鄭老先生答應了，其他人都每人捐出廿元，使這幅字籌得二萬二千多元加幣。

在洛杉磯籌款餐會將結束時，李錄向眾要求，上台和大家一起高歌一曲（血染的風采）。我對他說：想不到在這裏，和你一起高歌這首天安門廣場上的歌曲。

永記義工們的熱誠

我們每到一個城市，都有當地的義工為我們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如聯絡傳媒、籌組演講會、推銷餐券、安排拜訪僑團、安排車輛接送和我們住宿的地方，等等。他們不少人，是請了多天假的。我將永記他們的熱誠，他們的熱誠也可以說，就是對香港這第二故鄉的深情。

溫哥華是第一站，打響頭炮是很重要的。他們把我們運去的物品，再加以包裝，以便賣得更好價錢。例如：把尊子畫的民主黨十九位立法局議員的漫畫肖像，每套都用相簿裝上；我寫的印刷的四套書法（龔自珍詩句：「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林則徐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秋瑾詩句：「一腔熱血動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魯迅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都裝上鏡框；李柱銘的競選海報，加配袂裝。他們這辦法很有效，其他城市也仿效了。

每一個城市活動結束後，立即把情況和經驗，用 E-Mail 傳到其他城市，起了交流和鼓舞的作用。波士頓特派專人乘飛機專程到紐約，觀察和汲取經驗，趕回去改善自己的籌備工作。

最後高潮在多倫多

在沙加緬度，爲了節省費用去籌得更多錢，他們到多家餐館去募捐得餐會的全部食物，餐會以自助餐形式進行。在紐約，有人特地煲了老火靚湯給我們喝。在柏克萊，吳瑞卿女士準備了器材，來爲我們作即時傳譯。在三藩市和波士頓，他們安排和陪同我們去宗親會拜祖。在卡加利，餐會結束後，已是深夜，他們還和我們座談，檢討工作。他們說，我們的籌款活動，加強了當地華人的聯繫和團結，使以後能更好地關懷和支持香港。多倫多的義工更人強馬壯，組織嚴密，會場工作人員都配備對講機，互相聯絡，維持秩序。

在多倫多的〈加港心連心〉演講會，是此行的最後一項活動，也是此行的最高潮。演講會收入場費十五元加幣，會場設八百個座位，但卻有一千一百多人來參加，不但座無虛席，兩旁甬道和門外也站滿了人。講台兩旁，布置了兩個卡拉OK的大銀幕。

一開始是播放大銀幕出現影像的歌曲〈獅子山下〉。接着是我朗誦艾青的詩〈我愛這土地〉，也有影像配合。再接着是李柱銘、我、劉千石和鄭家富的簡短的演講。演講之後，是會衆提問和發表意見，但提問的少，發表意見的多。他們發表的，都是熱情鼓勵我們的話，有人說，假如回歸後我不再離開香港，他們一定會回來探望我。

演講會結束前，我們四人高歌《友誼之光》，以表示對僑胞的感謝；會眾高歌《東方之珠》，以表示對香港的懷念和對我們的鼓勵。這兩首歌曲，都被建議全體一同重唱。在重唱的歌聲中，籌備工作人員的代表溫偉耀、黃志華、李蘭菊等人，上台和我們握手擁抱道別。全場的人都眼裏飽含熱淚，許久許久不願離開會場，滿帶依依不捨之情。

「說有萬里山，隔阻兩地遙，雖不見面，心中也知曉，友誼改不了！」這是《友誼之光》最後一段歌詞，這時我才深深感受到它的感染力。此刻，那歌聲仍縈繞我的耳邊。

演講會一結束，馬丁便趕往機場，飛往日內瓦；我和在多倫多的哥哥、妹妹以及他們的家共進晚餐，然後即飛返香港。回港後接到消息，單是多倫多所籌得的款項，已超過了二十萬元加幣。

跟踪、辱罵和噪音

在第一站溫哥華的第一天，接送我們的義工，就告訴我們：出入的車輛，一直被跟踪。其後，再告訴我們：在記者招待會、演講會和籌款餐會，都有生面人錄音和拍照。一些僑團中人，也接到勸告或恐嚇，不要參加我們的活動。我們聽了，淡然置之。這樣的勸告和恐嚇，在

其他的城市也有。

抵達三藩市的上午，先到花園角去向民主女神像獻花。那裏已聚了十多個老人，把我們團團圍着，「漢奸」、「走狗」的辱罵中，夾雜着更多粗言穢語。鄭家富說笑地說，使他在多倫多的媽媽，不停地眼眉跳。其實，這些已是美國公民的老人，他們憑甚麼罵我們是漢奸；他們已經不是中國人了，罵別人為「漢奸」，也不應由他們來罵罷？

下午在假日酒店舉行研討會，我們到達時，有七八個人在門外，拉起同樣辱罵的橫額示威。演講會開了一半，有人說門外人數增加到三四十個。五時散會，我們離開酒店時，卻一個也看不見了。晚上，在舉行籌款餐會的酒家門外，也有孤零零的一個老人，用帶着鄉音的普通話不停地大叫「漢奸」、「走狗」、「丟臉」、「無恥」。我問那是甚麼鄉音，有人說是台灣口音，我聽了真正的有點莫名其妙。

我們在溫哥華、三藩市、紐約、多倫多都接到電台的邀請，去做直播節目。所接聽到的噪音並不多，不到十分之一，比在香港接聽到的還要少得多。在紐約接到一個電話，為那些說粗言穢語的老人辯護，說他們文化水平不高，粗言穢語也是一種感情的表達。接着有一位老婦人打電話來，說自己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斥罵剛才來電的聽眾，「我叫佢去食屎」，並說願意送

他一張機票回大陸去。我和阿宮聽了，笑得彎起腰來。在多倫多，有一位說我們來籌款，但又住五星級酒店歎世界。我對他說，意見可以自由，事實不容歪曲，我們昨晚是睡地板的，我們住過哪一間五星級酒店呢？談到香港修訂公安條例，一位聽眾說，在加拿大也是申請經批准才可以遊行，但即時被一位當地執業律師指出，他的話不符事實。

報章報道，在多倫多城市論壇式的活動中，有聽眾打起架來。我們在現場，看不見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返港後接到那邊的消息說，不是因爭論而打架，而是在散會後，因為爭一件我們簽了名的紀念品而吵起來的。

永遠的記念和感謝

此行的十八天，是我此生難忘的一段經歷。我將會永遠記念和感謝，在此行中見過和未曾見過的每一位海外的朋友。在未來艱苦的日子中，回想起這段十八天的日子，遙望太平洋彼岸的眾弟兄姊妹們，我將會戰鬥得更堅定、更勇敢、更有信心！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一及二十二日

老國王的最後抉擇

——在「北美」籌款之行所說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老國王。他是一個好國王，他愛護老百姓，老百姓擁戴他。但他有一件憾事，無兒無女，膝下猶虛。他自己擔憂，老百姓也擔憂：將來誰來繼承他做國王呢？繼承他的人，是否也是一個好國王呢？

國王祈禱，老百姓也爲他祈禱：上帝呀！請賜給我們的國家一個好國王！祈禱很有靈效。不久，皇后懷孕了。

皇后臨盆的那一天，國王很緊張，與大臣們在皇后的房門前等候消息：老百姓們也很緊張，在皇宮門外等候消息。他們在等着等着，忽然聽到一陣很響亮很響亮的嬰孩的哭聲。聲音那麼響亮，一定是一個很強壯的嬰孩了，大家都很高興。

不久，皇后的房門打開，一個宮女抱着一個嬰孩走出來。

國王連忙趨前，問道：「是不是生了一個男孩子？」

宮女答道：「陛下，不是。」

國王的心跳了一跳，立即再問：「是不是生了一個女孩子？」

宮女答道：「陛下，不是。」

國王吃了一大驚，不是男孩子，又不是女孩子，難道生了一隻小貓或小狗？這時候，宮女說：「恭喜陛下！皇后不是生了一個男孩子，也不是生了一個女孩子，她是生了三個男孩子呀！」

接着，國王還看見兩個宮女，都各手抱着嬰兒，從皇后的房裏走出來。國王高興得不得了，接過第一個嬰孩，這是一個肥肥胖胖的、臉兒紅紅白白的、很可愛的嬰孩。他看過了，把第一個嬰孩，傳給身邊的大臣們看；再接過第二、第三個嬰孩來看，他們同樣是那麼可愛。國王又把第二、第三個嬰孩，傳給身邊的大臣們看。三個嬰孩，在大臣們的手上，傳來傳去。

國王發覺做錯了一件無可挽救的大事了！傳來傳去的三個嬰孩，已再分不出誰是大哥、二哥和弟弟了！

國王沒有辦法，只好不分大小，同樣盡心盡力地去養育他們。

國王越來越老了，不能不在這三個王子中，去選出一個來做新的國王了。但這三個王子，

不知誰是大哥，又各有長處，應該怎樣去抉擇呢？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大臣們向國王建議：深山裏有一位魔術師，專門替人解決難題，把他請來罷！

國王叫人帶着許多金銀珠寶，到深山去，把魔術師請了來。

魔術師聽了國王的難題，從袋裏拿出三瓶水來，說：「這是神仙水。一個人喝了一口，他的長處就增長十倍；喝了兩口，就增長一百倍……。你把這三瓶神仙水，給三位王子喝了，叫他們到皇宮外去，做一件事回來告訴你。你聽了他們所做的事，就知道應該選誰做你的承繼人了。」

國王遵照魔術師的話，把三個王子叫了來，各給他們一瓶神仙水，然後叫他們到外面去做一件事。

第一個王子，是一個孔武有力、能征慣戰的勇士。他把神仙水一口喝盡，走出皇宮。皇宮外是一片大森林。他把森林的樹，全都連根拔起；他又把地上的大石，一塊一塊地堆起來，堆成一座聳入雲霄的石塔。

他說：「我要鄰近國家的人，都看見這座高高的石塔。讓他們知道，我們國家的新國王，是一個無敵的國王，再不敢來侵略我們。」

第二個王子，是一個聰明的、勤奮的學者。他把神仙水一口喝盡，走出皇宮。他命令士兵，殺很多很多的鵝，把鵝毛拔了用來造筆；再拿很多很多的紙張來。他用鵝毛筆和紙張來著書立說，解決世界上的各個難題。

他計算出，天上有多少顆星星，地上有多少顆砂粒，水裏有多少條魚——還計算出多少條是雄的，多少條是雌的。

他說：「你們看！我是一個多麼有智慧、有學問的人。我做了國王，憑着我的智慧和學問，一定能管理好國事，使國家富強！」

第三個王子，有一顆善心，對人和藹可親。他拿起那瓶神仙水，只喝了一口，走出皇宮。他看見拔倒了的樹、堆起了的高高的石塔、滿地殺了的鵝和用過的紙張。

他對士兵說：「你們給我通知全國的老百姓，今晚都來這裏，舉行一個燒烤聯歡大會。他們用拔倒了的樹來生火，燒烤地上殺了的鵝；千萬要囑咐他們，一定要把他們的小孩子都帶來，地上用過了的紙張，正好給小孩子們摺小鳥、小船、小屋……。這裏，要闢為一個大公園。以後，每年今天，這裏都舉行全國的燒烤聯歡大會。」

一個舉國騰歡的燒烤聯歡大會，就在這一晚舉行了。

國王細心地聽了三個王子講述，他們做過的事。他想了很久很久，作出了抉擇。他走出皇宮，要向老百姓宣布，他選擇了哪一個王子做他的承繼人。他走到半路，心裏忽然生起一點好奇，又走了回來，問第三個王子：「你爲甚麼不把整瓶神仙水都喝了，只喝一口呢？」

第三個王子答道：「我要把剩下的神仙水保存着，以備不時之需。假如父王選了我做新的國王，將來管治國家，一定會遇到很多難題。那時候，我便喝一口神仙水，增長我的長處，好幫助我把難題解決。」

國王聽了他的話，不停地點頭，心裏更肯定原來的抉擇。於是，他又走出皇宮，要向老百姓宣布，誰是他們的新國王。他走到半路，心裏又忽然生出另一點好奇——假如我的長處增長了十倍，我會不會改變我現在的抉擇呢？

他又再走回來，向第三個王子說：「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神仙水，給我喝一口呢？」

第三個王子把那瓶神仙水給了國王，國王喝了一口。國王原來的抉擇有沒有改變呢？他改變了原來的抉擇！

他走出皇宮，對老百姓們說：

「從現在開始，我們的國家，不再由這一代的領導人，爲你們決定下一代的領導人了。明

天，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便舉行，由你們投票去選舉你們的新國王！從此以後，都是如此，以一人一票的直接選擇，由你們來抉擇國家的新領導人！」

後記

在北美各城市，每次講完這個故事，都響起熱烈的掌聲。接着我說：我第一次說這個故事，是十一年前（一九八六年），在北京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宴會上，那時候，故事說完了，席上鴉雀無聲，沒有一個人鼓掌。這話又引起了籌款餐會上一陣哄笑和掌聲。接着，我又說：草委會的宴會，李柱銘也在場，事後，我問他為甚麼不鼓掌。他說：你用普通話講，我不懂普通話，聽不懂你在說甚麼，怎會鼓掌呢？僑胞們聽了，又是一陣哄笑和掌聲。接着，我又說：在北京說完了這故事，我回到席上的座位。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國內委員，輕輕地對我說：你的故事，是有骨的。我輕輕地回答他：假如喉嚨夠大，是不會覺得有骨的！僑胞於是又送給我一陣最後的最長的哄笑和掌聲。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我所認識的彭定康

「人一走，茶就涼。」在此彭定康將走未走之際，我端出的，不是一杯已經涼了的茶，而是一碗不熱、不凍、微暖的涼茶——濃黑的有苦澀味的「王老吉」。他到任伊始，即在旺角街頭喝過一碗，有始有終，在這快要離開的時候，再喝一碗，相信也不會介意的罷？這一碗「王老吉」，如果其他人不嫌其苦澀，也歡迎來喝一口的，它有消暑、散熱、去濕的輕微的藥效。

九二年初，英倫宣布，不久即將任滿的衛奕信，不再續任。很明顯，他是被「炒」的。誰來接任呢？當時忖測紛紜，莫衷一是，但誰也想不到，接任者是彭定康。

不久，英國舉行大選。在民意調查中，保守黨遠遠落後於工黨。彭定康是當時保守黨的主席，領導整個選戰，竟力挽狂瀾，使保守黨在劣勢中取得勝利，繼續執政五年。有誰想得到，領導保守黨在選戰中取得勝利的彭定康，在自己的選區，竟然落敗了？

試想一想，如果他沒有落選，論功行賞，必然會成爲內閣的重要一員，他還會被委任爲港

督去接替衛奕信嗎？

歷史有其必然，也有其異數。英倫要改變對中和在港政策，於是衛奕信被「炒」，這是歷史的必然；彭定康落選，被委任來港，接替衛奕信，這是歷史的異數。假如彭不是落選，誰將會是這末代港督呢？我不知道。來港的不是彭，這五年的香港歷史會不會改寫呢？我認為不會，因為歷史仍有其必然的。

九二年十月，彭定康發表其到任後的第一個〈施政報告〉，提出了轟動一時的「政改方案」。

一位不很熟的專欄作者，約我吃晚飯，問我：衛奕信為甚麼被炒？彭的「政改方案」，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我猜想他是在扮演着蔣幹的角色，但卻沒有藉此巧施「連環計」，很坦率地說出我的看法。

有時，人變換了，政策也因而變換；有時，因為政策變換了，執行政策的人，也就不能不變換。彭接替衛，是後者而不是前者。看來，英的對中和在港政策，將會變換。彭是保守黨的頂級人馬，是馬卓安的親密戰友，是執行新政策的最強人選。英變換政策的原因有二：一、是

汲取了〈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以來的經驗教訓，一味忍讓將不是出路；二、是「六四事件」中，港人的政治覺醒和民主訴求都有極大的提高，英不能對此視若無睹，置若罔聞。

最近，周南再沒有罵彭為「千古罪人」，認為他不是「罪魁」，而是英改變了政策。這到底是後知後覺，還是為了配合回歸而緩和矛盾的權宜的策略呢？

兩次在海外的估計

第一次，是九二年的暑假，我剛在洛杉磯。透過當地記者的採訪，我才知道，到任後不久的彭定康，將會重組行政局。當時，有一些人是兼任行政、立法兩局的議員的。記者詢問：改組後，是否仍有兼任兩局的議員，以作為兩局溝通的橋樑？

我的估計是：九一年有了直選後，政黨政治急劇發展，為了政府不致捲入政黨政治的紛爭，行政局不宜再有政黨背景的成員；要剔除這樣的成員，兩局必須徹底分家。此後，兩局的溝通，可另闢渠道，例如司級官員與立法局議員的接觸。但有一難題，就是當時兼任立法局議員的行政局議員任期未滿，賴着不走，彭也很麻煩。

結果是鄧蓮如立了一大功，帶頭並建議全體行政局議員都辭職，由彭再行委任。她為彭解

決了這個難題。有人自以爲聰明，主動辭去了被委任的立法局議員，以爲以此可逼使彭再委任其爲行政局議員，但卻「賠了夫人又折兵」，變成兩局皆空，因而對彭深惡痛絕。

第二次，是九三年的復活節假期，我剛巧在三藩市。我也是在海外聽到消息的：中英重開關於政制的談判。在柏克萊的加州大學講演，我就以《中英新的政制談判會否有結果》爲題。

「灑水之戰」的覆轍

我的結論是否定的。我認爲：中英雙方不是勢均力敵的不平衡的談判對手，中方已佔盡上風，得勢不饒人，必會步步進逼，決不會有尺寸之讓。至於英方，只能作些微的讓步，假如作較大的退讓，就會變成了「灑水之戰」的秦王苻堅，兵敗如山倒，一潰千里，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連最後幾年的管治也維持不了。在「灑水之戰」中，秦王苻堅本擁有強勢，尙且如此，處於劣勢的英方，就更不堪設想了。彭定康有足夠的政治智慧，決不會重蹈「灑水之戰」的覆轍而出現「肥彭之戰」。因此，談判是一定不會有結果的。

其後，彭曾對其「政改方案」，作過些微的讓步的修訂，卻被中方斷然完全拒絕。十七輪的談判，毫無結果而破裂。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被指為「三違反」，被罵為「千古罪人」。這是他與中方交惡的起點和最重要原因，也是中方撕毀在《基本法》附件中所曾承諾的「直通車」的藉口。假如彭不提出「政改方案」，按照中方的意見去進行九四／九五年的三級選舉，「直通車」是不是就不會被毀呢？是的。那麼，中方的意見又是怎麼樣的呢？十七輪毫無結果的中英政制談判，未有透露過中方的意見。但是，我們看看現在特首辦所提的，關於修改選舉法的方案，就可知道其八九，因為這顯然是已得到中方的首肯。

「直通車」為何被毀？

立法會：直選是多議席單票制，或比例代表制（據聞後者似看高一線）；選舉委員會由八百人組成，雖然人數倍增，但與產生特首和臨立會的推選委員會一樣，將會有一個很安全的控制系數；新九組將改為類似舊廿一組，由工商界佔盡優勢的組別取代；舊廿一組，縮減投票人數，還原九一年的方法。

兩個市政局和區議會：增加四分之一的委任議席。

這樣的選舉法下，民主派（包括民主黨、前線和獨立民主人士），最多只能取得十至十五

席，不多於立法會六十席的四分之一。假如九五年就採取這樣的選舉制度，結果也會是如此的。這樣的一個有着很安全的控制系數的立法局，當然就可以「直通」了。增加了委任議席，既已達到了控制的目的，兩個市政局和區議會的其他現任議員，不是就可以「直通」了嗎？

所以，有沒有「直通車」，要看這「直通車」有沒有很安全的控制系數。我相信，彭定康是看透這一點的，這樣的「直通車」不要也罷。正如他在他最後的《施政報告》中，引用傑克·倫敦的信條所說：「寧化飛灰，不作浮塵。寧投熊熊烈火，光盡而滅；不伴寂寂朽木，默然同腐。寧為耀目流星，迸發萬丈光芒；不羨永恆星體，悠悠沉睡終古。」所以，他的「政改方案」和由此而產生的立法局，即使只有兩年的生命，他也在所不惜。

答問記錄可作教本

在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歷史中，彭定康是唯一的每月到立法局舉行答問大會、接受質詢的總督，可謂空前絕後。假如把未來的特首，等同歷史上的總督，是否也是「絕後」的呢？我們等着瞧罷！

答問，是對政治人物相當嚴峻的政治智慧、質素、技巧的考驗。彭定康，在這方面是一個

罕見的高手。假如有人，把他歷次答問大會的記錄，結集出版，應該是從政者很好的教本。

他的回答，充滿智慧、機鋒處處、分寸恰好，時而果斷時而寬容、富有文采和幽默感。儘管你不同意其內容，也難於不折服。

六月十九日，舉行了他最後的一次答問大會，記憶猶新，就拿出其中的兩個例子來說說。何承天問：試用兩句簡單的話，來評價香港百多年的殖民地歷史。他答道：這是一個驚人的中國人的成功故事；這是一個具有英國特色的成功故事。這樣的評價，不但概括和符合事實；而且，一方面照顧了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又維護了英國人的尊嚴。

梁智鴻問：假如他五年前當上英國首相，他會為香港做些甚麼？他答道：我會委任自己做港督。這樣回答，不但幽默，四兩撥千斤；而且暗示了，他是最佳的港督人選，他是對自己這五年來的工作感到自豪的。

求證「病鳥」

他曾用「病鸚鵡」，去形容發表某種言論的人。不久後，在某次答問大會上，我問他：鸚鵡是鳥，病鸚鵡就是病鳥。在中國文學名著《水滸傳》中，魯智深常說：「口中淡出鳥來。」

你知道這句話中的「鳥」字，是甚麼意思嗎？

他不懂中文，更沒有讀過《水滸傳》，當然不會知道魯智深所說的「鳥」字是甚麼東西。他很靈敏察覺到，其中必有古怪，於是答道：在英語中，「鳥」字也有很多含意，有時是不雅的。

事隔一年有多，五月十六日，民主黨在鯉魚門設「最後的晚餐」，向他告別。在席間，他對我說，在我提出上述的問題後，他回去向下屬查詢，終於知道了魯智深的「鳥」的真正含意。他和我相視大笑。即使是這麼小的問題，他也求知心切而不輕輕放過，而且記着，有機會便去交代。

九四年六月八日，我在立法局提出譴責他的動議，並獲得通過。翌日，就是答問大會。我很遲才舉手，輪到我發問時，答問時間已滿，主席黃宏發說：因時間所限，不能讓你問了。彭特意請求黃把時間延長，容許我問最後的問題。他大抵以為我會就譴責動議獲得通過而發問的，不管他是否想藉此反擊，但總算有量度。誰知我問的，竟是坪石邨改裝電梯的事。這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一問，引起哄堂大笑，其中也有他響亮的笑聲。

贈以「千古醉人」題字

民主黨同人，叫我寫一幅字，作為禮物，在「最後的晚餐」的告別宴上，送給彭定康。

於是，我寫了一張小橫幅，上有「千古醉人」四個大字。

席間，我向他展示了這張小橫幅後，透過馬丁的翻譯，解釋這四個字的含意。

我首先說：「千古醉人」的「醉」字，與「千古罪人」的「罪」字，雖然音近，但卻是不同的字，字義也大異。

我接着說：「千古」的含意很多，可以解作「永恆的」，或「歷史的」，或「過去了的」，甚至是「死掉了」。

我再解釋：「醉人」的含意也很多，可以解作「喝醉了的人」，或「使人陶醉」，或「使人麻醉」，甚至是「糊糊塗塗的人」。

我最後說：「千古醉人」這四個字，他可以用我的各個解釋，去作自由組合，找出他自己喜歡的含意。

他聽了，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席間，謝永齡拿出民主黨十九位立法局議員的肖像卡通，請他簽名。他能清楚分辨出卡通

中的每一個人。他欣然揮筆，還不假思索，在每張上題了說話，這些說話，對每一位民主黨的立法局議員，都是帶有針對性的。

可惜我已經不能全記得他所題的說話了。我想，假如能將這十九張肖像，連同他的題字，刊登出來，一定會受到很多讀者的歡迎。

畢加索的藍色時代

彭定康不似他的前任尤德和衛奕信，能聽講普通話，而我的英語又太蹩腳，所以，五年來，我始終未曾與他作過直接的對話。即使是民主黨的代表與他會晤，我也只參加過一次，聽而不講。彼此見面，握握手，寒暄一兩句便算了。

在他發表了最後的《施政報告》的晚上，他和我同上無線電視的辯論直播節目。因為有即時傳譯，而且坐在一起，這是我唯一的與他有較近距離的交談。

主持人要我對他的《施政報告》評分。我說：對畢加索的作品，是很難評分的，有人連看也看不懂，有人卻推崇備至。他立即答道：假如他是畢加索的話，這《施政報告》是畢加索藍色時代的作品。這反映出他不但有急才和幽默感，而且頗為淵博。

節目結束後，我對他說：這《施政報告》最後所用的傑克·倫敦的信條，在原文中是有主語「我」的，但在中文譯本中卻隱去了這主語。「在我看來，香港一直在生活中實踐作家傑克·倫敦的信條。」與這句話對應，隱去了主語，就比原文更為恰當。他說：他不知道，中文譯本是怎樣的。

董橋對彭的評價

董橋先生，在他的專欄《英華沉浮錄》中，曾對彭定康作過這樣的評價：

「彭定康是西方典型的政客，冷酷果斷，信心十足，能言善辯，而且博覽羣書，文史修養深厚，順口引經據典，永遠不在人家面前流露絲毫的猶疑神情，明明是空泛的內容都會包裝成燦爛的言詞。」

對這樣的評價，我基本上是同意的。但只補充一點，以五年來的表現看，他還算是一個有原則的政客，儘管你不同意他的原則。

別了，彭定康先生！祝你的家和那兩頭小狗：健康和快樂！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九及三十日

必須澄清的一面之詞

——答某女權組織和先驅社

七月十日，《明報·世紀》版，刊登了劉健威先生的〈七一民運遊行鬧劇〉。該文的所謂「鬧劇」，是指某女權組織和先驅社等人，對大會的刻意干擾。

當日，遊行隊伍三千餘人，由銅鑼灣百樂戲院側的集合地點，步行至前布政司署門外的廣場。

我代表支聯會宣讀大會的宣言時，只讀了兩句，便發覺在羣衆聚集的最後處，有人在那裏用擴音器播放歌曲，並敲鑼打鼓。我停了一停，勸請播放歌曲和鑼鼓聲，可否暫停一會。但無效，我只好在這些噪音的干擾中，把大會宣言讀完。接着，遊行宣布結束。

我因要接受傳媒的採訪，其後，又與義工收拾遊行的用具，沒有去查問，剛才發出噪音干擾大會的是甚麼人？更沒有去查問，他們爲甚麼這樣做？

不盡不實的一面之詞

（七）文的作者劉健威先生，他由頭至尾參加了遊行。他從一個第三者和旁觀者的角度，把當時所目擊耳聞的寫了下來：

「當司徒華先生在旗袍下開始演講時，聚在不遠的十來個青年一邊敲鼓，一邊用播音器唱起〈國際歌〉來，在多次勸喻下仍不停止，顯然刻意干擾大會進行。」

——他們的行為吸引了記者的注意，紛紛跑過去拍照；一些羣衆也走過去指責他們搗亂。」

——在衆人的責問下，一位女子說，她是一個女權組織的成員，原打算以百樂戲院側作起點遊行，但支聯會用了同樣的地點，她們要求合辦，被支聯會拒絕了；她們再提出要在大會中談婦女問題，也被支聯會一位領導否定了。而另一位屬先驅社的成員則說，他們在支聯會的會議中提出大會該讓民衆發言，而不應只有領導們的聲音，但提案遭否決。所以他們才有這次行動——因為大會應有多元的聲音。」

劉健威先生把他聽到的某女權組織和先驅社的話，如實地寫了下來。但他聽到的是一面之詞，所以，寫下來的也就必然是一面之詞。責任不在劉健威先生，因為他不知道全部的事實；責任只在，那些只說不盡不實的一面之詞的人。

作為支聯會的主席，我必須代表支聯會，對這些不盡不實的一面之詞，加以澄清，讓市民和讀者，知道事實的真相。也許，有人認為我說的也是一面之詞，即使如此，這一面和那一面加起來，事實總比較全面；而且，我很歡迎其他人對我所說的，也用事實來澄清。

那女權組織，因為我不知道其名稱，所以只好稱之為某女權組織。

就那女權組織的成員所說，我要問：她們原打算也以百樂戲院側作遊行起點，是在甚麼時候才有這樣的打算的呢？她們要求合辦，是甚麼時候向誰人提出這樣的要求的呢？被支聯會拒絕了，拒絕他們的是誰？她們要在大會中談婦女問題，也被支聯會一位領導否定了，這位領導是誰？

先去回答某女權組織

我是支聯會的主席，甚至在報上讀到劉健威先生的文章後，才知道該組織成員所說的一切。假如支聯會接到這種種要求，倘若時間能趕及，必會在會議中提出來討論；如果趕不及，也在常委中通傳，以多數人的意向，來作出決定。但我從未知道，有人提出過這種種的要求。

衆所周知，支聯會原定以維園的涼亭，作為遊行的起點的。被市政局否決後，再與警方磋

商，雙方達成協議，才將地點改爲百樂戲院側。這地點，從來未曾作過任何遊行的起點，該女權組織爲甚麼也選用同樣的地點呢？支聯會在六月廿四日中午的記者會上，才宣布了這個遊行起點。她們是在我們之前還是之後，才打算選用同樣的起點的呢？假如是之前，我們知道了，必會另選地方，假如是之後，爲甚麼她們不去選其他地點？是不是旨在要把支聯會的遊行與她們舉辦的二合爲一，藉我們的遊行來宣傳與支聯會不同的，自己的遊行主題呢？

支聯會的集會和遊行，從來未曾與其他的團體合辦過。原因：（一）我們的集會與遊行，主題鮮明，與其他團體的未必相同。（二）我們歡迎所有團體來參加，而不是合辦。（三）我們的屬會有二百一十多個，任何時候歡迎任何團體加入，加入了便成爲支聯會一員，也就是活動主辦者一員。（四）這個團體要求合辦，要談婦女問題；那個團體要求合辦，要談房屋問題；還有其他團體，要談老人、外勞、新移民……等等，那麼，支聯會活動，豈不是成了大拼盤？

即使該女權組織，事前確曾向我們提出種種要求，我們就要照單全收去接納嗎？不接納我們所不能接納的要求，就要去干擾、衝擊嗎？這是講道理的嗎？

再去回答先驅社等人

先驅社並沒有要求在這次遊行中，該讓民衆發言。他們只會對六四燭光集會，提出過這樣的要求，但在全體會議中，被數以倍計的絕大多數否決了。全體會議是支聯會的最高權力機關，所作出的議決，要不要遵守呢？

討論時，會衆指出，因為燭光集會翌日不是假期，必須要在晚上十時左右結束，不宜拖得太長；而且，這不是一個研討會，要保持大會嚴肅哀悼的氣氛，發言只設致悼辭、祈禱和讚宣言。爲了滿足民衆發言，我們在集會的前後設有論壇，時間充分，發言者都可暢所欲言。先驅社的提案，是在充分討論後被否決的。

去年的六四燭光集會，先驅社同樣的提案，也以同樣的理由，被否決了。但後來在當晚，強行上台發言，主持者也容忍了，讓其代表發言。事後，在檢討工作時，會衆指責先驅社不遵守議決。林致良說：你們的決定是不正確的，所以我們便不遵守！

我問他：你也參加過區議會選舉，落選了，你能不能指選民的選擇不正確，強行衝入區議會發言，參與表決，甚至自封爲區議員呢？他無言以對。

過去，我們也曾有一些集會和遊行，安排過讓民衆自由發言的。但這些都要看具體情況，經過全體會議或常委會議討論，作出決定而安排。

再說一次：七一的遊行，先驅社並沒有讓民衆發言的提案。林致良說的，不是事實。

最後要說，並不是「只有領導們的聲音」。講話和宣言，都是經過常委們過目、修訂、同意的，如有不妥，事後全體會議會作檢討，那是支聯會整體的聲音。

爲甚麼這些團體，總是這樣屢勸不改地，去不斷干擾衝擊支聯會的活動呢？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對權力的無限戀棧？

——答劉健威先生

很感謝劉健威先生，寫了那一篇〈七一民運遊行鬧劇〉。他以旁觀的第三者的角度，寫出了一些人干擾支聯會當日遊行的實況。其實，這樣的干擾歷來就有，層出不窮，我們已多見不怪，也很少向市民解釋。這次，他寫了出來，讓這次和過去的一些事件大白。我很感謝他，相信不少支聯會的工作人員也會感謝他的。

中立的客觀的報道

過去，每每發生這樣的干擾時，支聯會的工作人員們，總不讓我走近去，去查問，去了解。我心領他們的好意，但因面對事件總缺乏具體了解或所謂感性認識。我知道劉健威先生是中立的、客觀的。他的報道，使我眼界大開。他說：

「一些羣衆也走過去指責他們搗亂。」

「一位七八十歲、很溫文的老太太拿起他們的擴音器說：你們真沒羞恥。」

「當憤怒的中年人責罵那羣青年，那光頭青年迎上前去，更大聲的向着他唱歌挑釁。我拉住了那位中年人，我看到光頭青年的意圖——他顯然想把語言暴力推向身體暴力，撩逗中年人出手。當時有許多記者在場，只要中年人一動手，光頭青年便塑造了「被壓迫」、「受害者」的「另類」形象，也同時印證了以支聯會為首的羣衆「集體暴力」。」

「對於一位年長的批評者，另一位同伴說：他不過是「維園阿伯」，別管他。羞辱及於羣衆。」

假如是我目擊這些事實，寫了出來，也許會有人認為我是誣衊。我真想不到，一些整天把「民衆」兩字掛在嘴上的人，竟是如此對待民衆的。

在文章中，劉健威先生還說了這樣的一段話：

「我認同先驅社的看法——支聯會應該在不同的集會中容納多元的聲音，而不是老由幾位領導讀讀宣言、領呼口號——這也是對權力的無限戀棧。一個反對一黨專政的團體，發言權、代表權、領導權永遠集中在幾個人身上，這未嘗不充滿諷刺意味。到了今天，該是支聯會自我反省和更新的時候。」

我是一個不時自我反省的人，並不時以此更新與自己有關的工作。讀了這一段文字，我更自我反省了很久，並將會與支聯會同人一同去自我反省，去更新我們的工作。現在，我先說說讀後的感受，去回答劉健威先生。

有何權力可變棧的？

先回答：「在不同的集會中容納多元的聲音」。我們過去一直都這樣做，「不同的集會」，但不是所有的集會；這完全由不同情況，並經集體討論而決定。這一點，我已在《必須澄清的一面之詞》一文中，作了較詳細的闡述，不再贅。

至於「對權力的無限變棧」，在自我反省中，我很想了一想這個問題：

支聯會有些甚麼權力？這些權力有甚麼可變棧的？即使想去變棧，是不是就能夠變棧？支聯會是有甚麼權力的。每年改選一次常務委員會，由全體成員團體，一會一票不記名選出，候選人須有政綱和接受質詢。每月舉行常委會一次，每兩月舉行全體會議一次，每次會議都有財政報告和各部工作報告。財政開支，不但事前須在會議上通過，事後還要在會議上核實。幾十年來，我參與過不少團體的工作，支聯會可算是最具民主機制的一個。本來就沒有甚麼權

力，即使有一點點，也是屬於那民主的機制的。

我不以為講幾分鐘話、讀讀宣言、領呼口號，是甚麼權力，更不是甚麼要去無限變棧的權力。假如是對權力無限變棧的話，早就爬進臨時立法會去了！何況，講話、讀宣言、領呼口號，在不同集會中，也由不同的人負責；較重要的內容和執行，都經集體討論決定。這只是分工後的一個工作崗位，決不是甚麼權力。

常務委員會，是支聯會的領導機構，上文已說過，每年改選一次。即使你想去變棧，但成員團體不投你的票，你就落選，難道你可以不承認選舉，硬要衝進常委會去當常委嗎？

有敏銳深刻的觀察力

支聯會沒有甚麼權力，沒有甚麼權力可變棧的，即使想變棧也未必能夠變棧，更談不上甚麼無限的變棧了。

支聯會有的只是：信念的堅持，責任的承擔，考驗的直視，艱險的面對。尤其是回歸後，更是信念的不移堅持，責任的沉重承擔，考驗的嚴峻直視，艱險的勇敢面對。並不是甚麼對權力的無限變棧！

劉健威先生雖然是局外人，只作過片刻的旁觀的第三者，但不愧是一個具有敏銳深刻的觀察力的人。他在文章裏的好些話，是觸及了事件和問題的本質的。他說：

「簡單的「權力中心」和「另類、多元」的二元對立。那羣青年開始就將自己放在一個有利的位置上——他們代表了「另類、多元」，然後利用遊行集會作為傾覆「中心權力」（支聯會）的戰場。」

「作為參與者來說，看到的是小權力中心向一個大權力中心的奪權運動（發言權、「另類」位置的提升和傳媒的焦點）；傾覆權力，不是為了打散權力，只是一個中心向另一個中心的轉移。」

我不以為支聯會有甚麼權力，有的只是堅持、承擔、直視和面對。也許有人認為是有權力的，更有所謂「權力中心」，所以才去「傾覆」、「轉移」罷？這些人有沒有想到堅持、承擔、直視和面對呢？而有的只是對自己幻想中的東西的覬覦呢？

我希望劉健威先生和其他的朋友，也從我這個角度去想一想。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誰要誰讓路

從井裏打出兩桶水，趕着挑回家裏煮飯、洗衣、洗碗碟。有人走來，說要與你「合辦」，把幾瓶葡萄酒倒進桶裏，一起挑回去。假如你拒絕，她就說你看小她，要她讓路，把她邊緣化，使她無立足之地。這是甚麼道理甚麼邏輯呢？

學校舉行運動會，有人來要求「合辦」，要在會上談婦女問題；教會舉行祈禱會，有人來要求「合辦」，要在會上談同性戀；居民開會反對加租，有人來要求「合辦」，要在會上談「非法入境兒童」。假如學校、教會和居民拒絕了，就說你看小了這些問題，要這些問題讓路，把這些問題邊緣化，使這些問題無立足之地。這是甚麼道理甚麼邏輯呢？

阿藹在七月十三日《明報》的《遊牧視野》一欄，所發表的《女人要讓路？》說：七月一日支聯會拒絕「另類回歸聯席」要求合辦遊行，就是「女性在回歸這時節，被邊緣化得無立足之地」。

不「合辦」遊行，就「被邊緣化得無立足之地」，你是靠支聯會的遊行來立足的嗎？假如支聯會不舉行遊行，想和你「合辦」也無從，你怎麼辦？你是不是還是說，「被邊緣化得無立足之地」？

七月一日，有二十四小時；香港雖小，還有很多街道。為甚麼一定要與支聯會合辦遊行？獨自舉行，不是可發出更響亮清晰的聲音，去談婦女問題嗎？

阿藹說：「另類回歸聯席要求支聯會合辦遊行」；但劉健威在〈七一民運遊行鬧劇〉一文，卻說是一「女權組織」。到底是「另類回歸聯席」，還是一「女權組織」要求合辦遊行的呢？教協、職工盟，還有許多支聯會的成員，也參加了「另類回歸聯席」的，他們都要求合辦嗎？不要順手牽羊，假「另類回歸聯席」之名！

到底是誰要誰讓路？

劉健威說：「塑造了「被壓迫」、「受害者」的「另類」形象」，「將自己放在有利的位置上——他們代表了「另類、多元」，然後利用遊行集會作為傾覆「中心權力」（支聯會）的戰場」。他雖然說得太嚴重，但說出了一些端倪。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中學畢業後的我

這時候，不少中學或大學畢業的同學，正徬徨於找工作罷？來談一談，四十六年前——五一年，我在皇仁書院畢業後，怎樣去抉擇前途的經歷，以供同學們參考。

我認為事業和職業，可以是一回事，也可以是兩回事。事業，是理想的實踐；職業，是解決吃飯問題。上策，是事業也是職業，兩者結合為一；中策，只是職業，但並不違背自己的理想，且有一點業餘空暇，可去從事自己的事業；下策，先解決吃飯問題，底線是不做壞事，以後再伺機去尋求上策或中策，理想和事業暫且攔在一邊。

即使那時還很年輕，我倒是現實的，並不浪漫蒂克。

我認為吃飯很重要，雖然吃飯不是為了活着，活着不是為了吃飯；但沒有飯吃，就不能活着，不能活着還有甚麼理想和事業可言呢？

魯迅說過一句這樣的話（大意）：生活下去，一切才可附麗。生活，首先是要生存和活著。

這一句話，給我很大的影響。

當然，我更記得他另一句話（也是大意）：生存，不是苟活；溫飽，不是奢侈；發展，不是放肆。

按上述的原則，我定下了具體計劃。上策：入工專再進修兩年，考取航海電報生的資格，當海員去。因為我認為航海可周遊各地，增長見聞；而且船上環境清靜，正好讀書和寫作。兩者，都可以為做一個作家作準備。中策：入師範，做個教師，假期不少，也可以讀書和寫作的。下策：當公務員，做文員，這不是去做壞事，雖然不太有出息。

那時，父親已患了不治之病——肝癌。讀工專，需時兩年，且要交學費，家境已不容許。入師範，我選了一年制的葛師，而不是兩年制的羅師，不需交學費，而且每月可領得津貼。這樣，雖然當初對教育沒有甚麼認識和興趣，但入行後，發覺也是很有意義的工作，一做便做了整整四十年，成爲了我一生唯一的職業，帶有事業意味的職業。

雖已事隔近半個世紀，但仍有一些價值，以供同學們參考的罷？

一九九七年八月八日

扣帽子與送帽子

八月三日《明報·世紀》版，刊出了李小薇的〈別再扣帽子了！——我的總答辯〉。這是她（他）與黑鳥的爭論，我不應該也不願意加入混戰。編輯卻把文中這樣的無關宏旨的一小段，抽了出來，作為提要，以黑體排印在最前：「當晚將《國殤之柱》運入港大平台後，我可能是其中一個較早向支聯會領導主張馬上把柱豎立的人，但大家反而同意由它橫放，讓港大學生會跟校方商量再算。這算不算是將鬥爭命運交給對手，算不算是『投降主義』？」既然點了支聯會的名，我不能不說幾句話。

編輯為何這樣做，我不知道。李小薇一面大聲疾呼：「別再扣帽子了！」但另一面，卻輕輕地把「投降主義」的帽子送了給支聯會。支聯會被扣上的帽子已多得很多，但並未因而被壓得折了腰，再多送來一頂，毫不介意。不過，對不是敵人的朋友，還是應該和願意說幾句話的。

團體之間，相處、共事、合作的一個原則，是彼此尊重。《國殤之柱》在港大校園豎立，支聯會只有一個決定：支聯會接納了港大學生會的要求，把它送到港大校園裏去豎立，但豎在

何處、何時豎立、如何豎立，等等，全由港大學生會作主。我們的義工，只作技術上的支援，要完全服從港大學生會的決定和指揮。一句說話：由他們「揸口」。那一晚，我們的義工，是遵從了這一個決定的。

我不認識李小微和黑島，更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港大學生會裏的人，他們在當晚的事件中扮演怎麼樣的角兒？他們認不認爲，當晚的事件是應由港大學生會的人，去作決定和指揮的呢？過後，過多的指手劃腳，評頭品足，議論縱橫，難明的理論一套一套，這樣，對年輕的港大同學是公道和恰當的嗎？請愛護他們，保護他們！他們已經做得很不錯的了。

站在大江東去的岸邊，浪花更大也只不過濺濕了鞋子褲腳，卻以鑑評家的目光，去看在驚濤駭浪中搏鬥的弄潮兒們。指指點點，說說這個身手不夠矯健，那個姿勢尙欠美妙。這樣，不但輕鬆，而又可置自己於高明之上，這豈不是太便宜了嗎？請試一試，投身到那大江東去的驚濤駭浪中去！

「投降主義」、「左傾盲動主義」、「右傾機會主義」、中共黨史，等等，太嚇人了！扣帽子和送帽子，都是要別人戴帽子。對李小微送來的「投降主義」，支聯會敬謝不敏——「有咁大個頭，唔戴咁大頂帽」也。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三日

《國歌》應該是莊嚴的

——香港電台「九十年代」之《香港家書》

我認識的和不太認識的朋友們：

原是《義勇軍進行曲》的《國歌》，坦率地說，我是很喜愛的，帶着莊嚴感情的喜愛。

六十年前，我進入小學，老師就教會我唱這首《義勇軍進行曲》。我一直常常唱，被定為《國歌》後，反而少唱。因為我認為《國歌》是莊嚴的，不能隨便唱，例如沐浴時。唱時要直立不動。我不但喜愛這首歌曲的韻律，更喜愛它的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一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進！進！進！」唱着叫人熱血沸騰，為民族的苦難而奮起。相信，在世界上只有法國的《國歌》——《馬賽曲》可以媲美。

過去唱，節拍是稍快的，唱起來有迫切之感，與歌詞和韻律的感情相配合。定為《國歌》

後，奏樂的節拍放慢了，顯得凝重，我反而覺得與歌詞和韻律有點疏離。所以，我總愛唱得稍快。

在電影院，放映國產片之前，是否要播放〈國歌〉呢？我是反對的。

我已經說過，〈國歌〉是莊嚴的。電影院是娛樂場所，不論看甚麼片都是一種娛樂。把播放〈國歌〉這麼莊嚴的一回事，和娛樂相混淆，簡直是一種褻瀆。爲了維護〈國歌〉的莊嚴，國人聽到時，都應該起立肅靜。假如在電影院放映國產片之前，播放〈國歌〉，是否要已進場的觀眾全部起立肅靜，帶位員全都停止工作，暫時禁止觀眾進場呢？否則，人來人往，萬頭竄動，有立有坐，喧聲四起，這成甚麼體統，這不是反而侮辱了〈國歌〉嗎？

主張播放的人，也許認爲這是一種愛國教育。這些人，實在是中了太深的形式主義的毒了。民族感情和愛國精神，不是這樣培養出來的。搞這樣的形式主義，是不成體統的愛國教育，是一種褻瀆和侮辱！爲了維護〈國歌〉的莊嚴，我不但反對在電影院放映國產片前播放〈國歌〉，而且認爲，應該禁止在不適宜的場合，隨便亂播放〈國歌〉。

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

誰才想做武林盟主？

——劉適強的「魯冠周戴」

劉適強在八月十九日的〈信報〉，他的專欄〈大陸與港〉中「落筆打三更」，第一句就這樣寫道：「周恩來有一句名言：『於無聲處聽驚雷。』」

觸目愕然！這七個字的作者的確姓周，但名字不是恩來，而是樹人，更爲人熟悉的是他的筆名——魯迅。魯迅的「無題」七絕，全詩如下：「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茫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

劉既然稱之爲「名言」，那麼，就不是僻句了。這句詩的確不僻。六一年，以黑田壽男爲團長的日中友好協會訪華，毛澤東曾題了這首詩贈給他們，因而傳誦一時。四人幫倒台後，有一劇作，以「四五事件」爲背景和題材，可算是最早的傷痕文學，也以這句詩爲劇名，頗爲轟動。

劉寫了十多年專欄，大抵不會從來沒有翻過〈魯迅全集〉，甚至沒有讀過別人引用這句詩

的文字，爲甚麼竟然「魯冠周戴」，擺了這樣的「烏龍」呢？從他那篇專欄文章的內容來看，刊出後又一直沒有更正，那是不容以「筆誤」兩字去推卸的。

想戴又不敢戴的紙冠

我對這個「烏龍」，想了一想。

大抵劉的腦子中，有這句詩，又模模糊糊的記得是出自一位名人的。周恩來是名人，於是就憑着感覺，把周當作作者。周早年也寫過詩，但很少流傳，劉對此是懵然的罷？由這個烏龍，我想到與自己有關的事。

劉的心裏還有另一頂帽子，他想自己去戴，卻又不敢公開去戴，於是就憑着感覺，去栽在別人的頭上，然後又去罵別人想戴這頂帽子。罵了別人，罵掉了別人，這樣，帽子穩留在自己的心裏，可暗自陶然享受一番。他就是這樣模模糊糊地，把「武林盟主」這頂紙冠，硬生生地栽在我的頭上。「魯冠周戴」事小，但把自己想戴的帽子戴在別人頭上，而又去罵，並不是小事。

十年前，他在《商報》的小專欄，給我戴上「武林盟主」的紙冠。當時，我已極感厭惡：

最近，在《三言堂》才公開將其原頂奉還。再說一遍：我對這紙冠，厭惡到極！他接着在《信報》說我那篇不到七百字的短文，是「內心世界大展露」。我問他，我到底大展露了甚麼？他才坦白地說，我想做「武林盟主」。念念不忘「武林盟主」！

「民主回歸」也有版權？

我為甚麼說，劉遵強心裏有「武林盟主」這頂紙冠，自己想戴而又不肯公開去戴呢？

他在剛回歸後出版的《亞洲週刊》，以《潮漲潮落，老兵不死》為題撰文。文中，他是「老兵」自居的。「老兵」者，老前輩的戰士也。他到底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打了多久、打過怎麼樣的仗呢？他若自稱為「老小商人」還可以，以「老兵」自居，而年紀卻並不老，不是在擺老資格，以老前輩來自我陶醉呢？他提到，在匯點成立時，因為一輩分稍高一，所以被選為主席。在他心裏，就顯然有輩分這一回事，有論資排輩的計較。我不知道，這是怎麼樣的輩分，他比匯點其他成員的輩分高了多少？

他說：「『民主回歸』是魯凡之（周魯逸）兄版權所有，我已多次闡明。」原來「民主回歸」是有版權的，那麼是否要抽版稅呢？

上述的種種——老兵、輩分、版權等等，就是「武林盟主」這一頂紙冠，在潛意識中為自己戴上了而作祟的反映。

匯點家事和兩人恩怨

劉適強在《亞洲週刊》撰文，指控張炳良「出賣匯點內部文獻」，其後又說這是「匯點的家事，我和張炳良之間的恩怨過節」，我抱不平是太過分了。

假如劉視此為匯點家事和兩人之間的恩怨過節，為甚麼卻在傳媒公開指控呢？而且這是捏造的指控。為甚麼不關起門來，在「家」裏兩人談個清楚呢？你既然在傳媒公開指控，而且是捏造的指控，難道別人卻沒有權利去置喙嗎？傳媒不是給所有人去看的嗎？或是只許看，不許評論的呢？

張作了澄清，劉不作反應，還他人一個清白，竟歸咎於記者不去訪問他。我只在《三言堂》寫了兩篇不到七百字的短文，也沒有記者去訪問他，他卻用了四倍的文字去反應。他不是《信報》有一個專欄嗎？何須記者去訪問！

自己在傳媒對他人作不符合事實的公開指控，就不視之為「家事」和兩人之間的「恩怨過

節」，當別人有所不值時，又以「家事」和「恩怨過節」，想去堵住別人的口。這大抵是有點理虧心虛、膽怯了罷？

他必須澄清：是否「出賣」？賣得多少錢？錢放進了誰的口袋裏？他若不澄清，又不去廉署告發，就必須公開收回說過的話！

原來是布下了的陷阱

關於那次他約我的會晤，他這樣寫道：「因為我太知道司徒華翻臉不認的惡習，所以才帶了個證人在場，以上事實是司徒華不能抵賴的。」

他自己明明說是帶了證人來，但卻又大罵我指他帶來的人是「人證」。「證人」和「人證」，到底有甚麼分別？

他「太知道」我「翻臉不認的惡習」，既然是「太知道」，請舉出事例來！我只對個別的人「翻臉不認」——那些為己私利、鮮知廉恥、出賣原則、誣告朋友、不時「轉軌」的人！不再認他們是朋友！

對他列舉的，我抵賴了甚麼呢？一、我否認與他有守密的承諾；二、會晤不是四十分鐘

（在立法局會議中抽空出來，又要趕回去投票，決不能是這樣長的時間）：三、他說不是游說我入臨立會，那麼，他又說不出來與我談甚麼；四、是不歡而散，而不是依依不捨。這些值得抵賴嗎？要有證人在旁嗎？

我答應了他退出支聯會和民主黨嗎？我向他自薦要參加臨立會嗎？我向他聲明支持陳財喜參加臨立會嗎？我是不是把這些都抵賴了呢？他既然「太知道」我「翻臉不認的惡習」，但又來約見，並且帶了證人，動機和目的是甚麼呢？這是一個布下了的陷阱，大抵是想捉我的破綻和痛腳，可謂來者不善。「男兒臉刻黃金印，一笑心輕白虎堂」。額上已被刺上「顛覆分子」，火海刀山都不放在心上，這樣的陷阱是捉不到我甚麼的，只暴露了某些人醜惡的機心。

聰明人和傻子 and 奴才

魯迅在《野草》的《聰明人和傻子 and 奴才》，批判了聰明人的偽善、傻子的盲動和奴才的奴性。

奴才受主人虐待。他向聰明人訴苦，聰明人表示同情，似乎下淚，說：「我想，你總會好起來……」

奴才又向傻子訴苦。傻子立即去他的房子，要在牆上開個窗，改善他的居住環境。奴才在地上打滾，叫來一羣奴才，把傻子趕走。主人誇獎這個奴才不錯。奴才感謝聰明人，因為聰明人有先見之明，說過他「總會好起來」，現在他得到主人誇獎了。

近年來，我發現一些人，時而扮演聰明人，時而扮演傻子（理論上的傻子，只說而不做，其實是並不傻的），時而扮演奴才。他們到底是甚麼呢？

他們不是聰明人、傻子或奴才，而是商販。商販是做生意謀利的，時刻窺測市場趨勢，揣摩甚麼貨色暢銷、滯銷，於是去出貨、入貨，把甚麼拿出來兜售，甚麼放進貨倉底。所以，時而扮演聰明人，兜售偽善的同情；時而扮演傻子，兜售盲動的理論；時而扮演奴才，兜售奴性的馴服。總之，甚麼貨色都有，甚麼可以賺錢，便賣甚麼；甚麼要賠本，便擱置、拋棄、踐踏甚麼。

「商販」也就是「小商人」。人大和政協快要換屆了，這也是一個市場，大有人在窺測這個市場的趨勢。祝他們「一本萬利」！「橫財就手」！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太抬舉了陳財喜

——兼答魯凡之

陳財喜在《明報》的《世紀》版，大呼：「我沒有被策反！」接着說：「司徒華提及劉適強「策反」我參加臨時立法會，那真是抬舉了劉適強，不是說劉適強沒有這個能力，只是說要「策反」的話，為甚麼不在匯點與港同盟合併之時，而要等臨時立法會成立呢？」

「牛唔飲水，點搵得牛頭低？」我忘記了這句俗話，其實並沒有「抬舉」了劉適強，反而是太「抬舉」了陳財喜。原來他是自動獻身的，是一頭早已渴望「飲水」的「牛」，劉適強只不過是個穿針引線的王婆的角色而已。

失覺！「抬舉」錯了！不過，我本來就沒有「抬舉」誰的意思；別人說是「抬舉」，就讓他說好了。

「不是說劉適強沒有這個能力」。原來他有「策反」的能力，只不過是不必使用而已；既然是自動獻身，渴望「飲水」，當然不必了。

不是溝通而只是勾搭

「爲甚麼不在匯點與港同盟合併之時？」陳財喜裝傻扮懵，問得太愚蠢了。

匯點與港同盟合併組成民主黨時，你不參加民主黨，完全可以作這樣的抉擇，何須「策反」？你參加了民主黨，不用吹灰之力，在民主黨的支持下，經區議會間選進入了市政局。假如你不參加民主黨，能夠成爲市政局的議員嗎？你是很懂得行情的，臨立會成立了，在自己的價位最高時去拋售自己，獲得最高的利潤。「名師出高徒」，你繼承了「小商人」做買賣的竅門。

在宣布了參選臨立會的記者招待會上，你還說要留在民主黨，死賴着不走，直至被公開開除爲止。在這一時刻，你還在盡量利用自己的剩餘價值，的確是買賣高手。

你還說：「民主黨公開也主張與中國溝通對話，這在其政綱中也有寫明。」民主黨的確有這樣的主張，但這主張不是說由陳財喜代表民主黨，去參加臨立會與中國溝通對話。民主黨曾有公開、堅定、鮮明的決議：不參與臨立會。在這問題的整個討論過程中，你沒有哼過一聲，沒有任何不同意見，卻突然破門而出，宣布參選臨立會。稍了解香港政情的人心裏都清楚，假如沒有那一個穿針引線的王婆，你假借着民主黨員的招牌，找得到足夠的提名人嗎？能夠「當

選」嗎？那頭渴望「飲水」的牛，能有「水」飲嗎？所以，你不是去「溝通」，而只是自動獻身去「勾搭」而已。

魯凡之自封的「四大罪狀」

魯凡之說：「八八直選之爭時，司徒華曾向張家敏數我四大罪狀。」

我沒有劉道強那種機心和闊氣，帶了證人然後和張家敏說話；更不可能在張家敏向魯凡之轉述時，有我的證人在旁。「四大罪狀」是魯凡之自封的，我會提出的批評有三點，而不是四。

第一，關於八二年在維園舉行的，「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篡改侵華史實」的九一八集會。這個集會由幾個團體主辦，邀請甚麼人在大會上發言，是由這幾個團體組成的籌委會決定的。當時通過邀請的外界發言人是：胡菊人、陳耀南、鄭耀棠和兩個在中大的日本留學生。有人提出魯凡之，但被否決了。

在集會前夕，松坂屋發生了炸彈案，警方大為緊張，索取了大會發言者的名單，並聲明不得臨時改變。知道了有日本留學生在大會上發言，警方恐怕羣情洶湧，殃及無辜，安排了這兩

位日本留學生一早進場，坐在後台，並有便衣貼身保護。

魯凡之在大會發言，早已被籌委會否決了。但到了當天集會，仍有人喋喋不休，纏着我要讓魯凡之發言。我說我個人不能改變籌委會的決定，而且詳細地解釋了當時的情況以及與警方的協議。我只奇怪，爲甚麼去斤斤計較自己有沒有被邀請發言呢？到底是誰「霸氣」？

躲在記者招待會幕後

第二，魯凡之組織一些人專同學，去支持劉山青。這是我知道的，因爲他們曾多次借過教協會所舉行會議。

一天，大專同學在理工就此事舉行記者招待會，我去了列席。會後，到火車總站的餐室，去吃過了時間的午餐，碰見了魯凡之在那裏。我問他爲甚麼不參加剛才的記者招待會？他說：他要躲在幕後，現正在等待記者招待會結束，同學們來向他匯報情況。

後來，我曾對張家敏說：讓經驗不多的同學去打頭陣，而自己卻躲在幕後，這是不大好的。尤其是對較敏感的政治問題，搞手（主要的負責人）應該站在第一線，身先士卒承擔風險。

我只就此事提出過上述的批評，並沒有說過魯凡之曾「支持劉山青」，而「後來又不支持」。這個批評，純是就工作方法和作風去提出的。

政改方案不應是「海鮮」

第三，那一年，區議會的選舉中，民主派的成績很不錯。祝捷會在窩打老道的安素堂舉行，我應邀出席。

會上不少人意氣風發，說出不少豪言壯語，提出在八八年要有百分之百的直選立法局議席。甚至在有人在發言中引用毛詩：「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我聽了，很覺得大有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的味道，於是就此接着發言。

我說：政改方案，不是海鮮，不能天天時價不同。選舉成績不錯，就去修改，提高要求；那麼，假如成績不好，是否也去修改，降低要求呢？何況，高山大會剛好舉行了不久，民主派在大會上一致通過的一九零方案，只列明了要求在八八年的直選佔百分之五十。現在，忽然提出與已通過的方案不同的建議，不但在民主派內部製造分歧，而且也會給市民搖擺不定的印象。所以，我是反對這樣的建議的，如要修改，必須在民主派內部重新討論，再舉行類似高山

大會的會議去修改。

我上述的意見，不是單針對魯凡之的，還有其他參加該祝捷會的人。

至於魯所謂第四項「罪狀」，是「八八、九一直選之爭」，大抵是與我上述的第三點批評糾纏在一起。

再說一遍：「四大罪狀」不是我說的，是魯自封的。那時，我和張家敏的關係還不錯，也清楚張與魯的關係，我的批評是善意的。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